

主 编：方烈文
编 委：邓 特 王著威
庄礼崇 陈荆淮（执行）
林学锦
编 辑：蔡秋明 林华生 周 敏
封面设计：陈新渝

汕头文史

第十六辑

政协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粤印准字第1453号

汕头新华印刷厂 工本费15元

第十六辑

汕头文史

SHAN TOU
WEN 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委员会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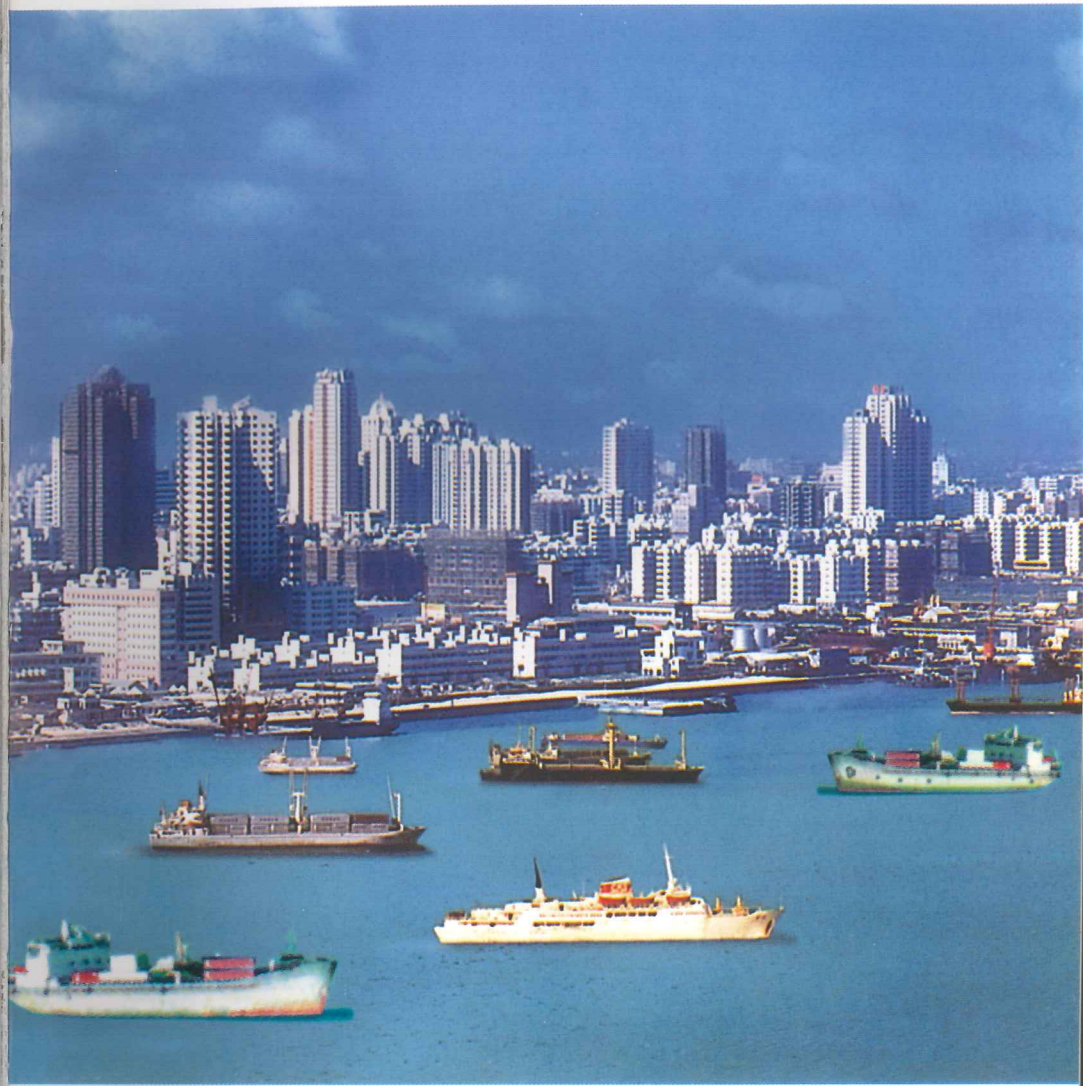
第十六辑

汕頭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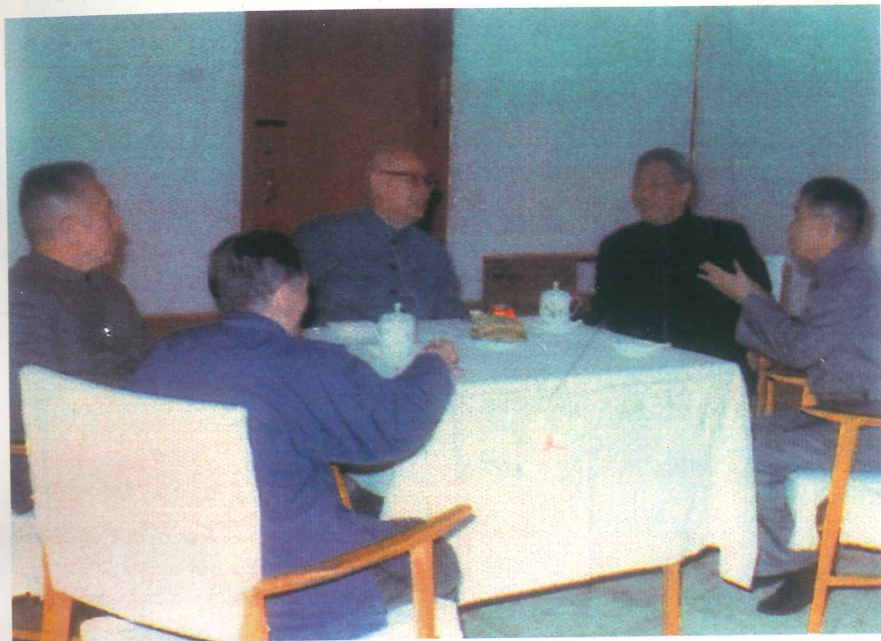


汕头经济特区





199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十周年时，江泽民总书记与吴南生在一起。



1979年3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与吴南生（右一）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广东先走一步，倡办特区”的工作思路。



吴南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合影。



1990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汕头市委书记林兴胜、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吴波陪同下视察汕头经济特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广东省省长卢瑞华，汕头市委书记许德立，市长周日方的陪同下，于1997年2月9日至10日在汕头市视察工作。

1985年1月，万里同志视察汕头经济特区。图为万里在听取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刘峰介绍特区建设规划。



1988年2月，习仲勋同志视察汕头经济特区，图为习仲勋同志在听取汕头经济特区党委副书记陈树藩汇报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到汕头大学考察，听取李嘉诚先生及学校领导的介绍。



李嘉诚先生与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庄礼祥、汕头大学党委书记黄赞发一起商谈“汕大”发展大计。

目 录

回眸：一九七九·中国特区

——原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第一任

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访谈录…………… 杨 剑(1)

注重效益 稳步发展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刘 峰(11)

汕头经济特区十年历程…………… 吴 波(19)

汕头经济特区创办头十年精神文明

建设回顾…………… 陈序藩(32)

辉煌人生路 精忠报国情

——李嘉诚先生在 1978 - 1998 年

…………… 陈衍俊(42)

丹心系桑梓 青史留芳名

——记林百欣先生暨夫人林余宝珠女士

…………… 袁伟强(63)

汕头市全面落实市区城镇侨房 政策纪实	王炎荣(72)
和平重建时期的金边城潮人和 柬埔寨潮州会馆	陈景明(79)
潮汕人民支援北伐战争纪事	秦梓高(85)
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领事考	房建昌(89)
从夏衍追忆南强书局的一封信谈起	陈梦熊(109)
汕头港引航话旧	沈饶生(118)
汕头的天主教区和外来基督教 新教述略	房建昌(124)
1945年以前日本人在汕头情况记述	房建昌(130)
记汕头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秦梓高(168)
试谈民国时期普宁货币的沿变	黄振坤(173)
征集汕头岩石风景区摩崖石刻 墨宝纪实	刘麒子(184)
先父姚华萼生平追忆	姚祥智(191)
吴颖传略	尔 迟(209)

回眸：一九七九，中国特区

——原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
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访谈录

杨 剑

吴南生，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任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起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最近，吴老在汕头、广州等地就广东的改革开放、广东经济特区的创立等问题，与记者进行了多次交谈。

中国，从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当又一次变革席卷华夏大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着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1979年春天，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精神

枷锁刚刚解除,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感受着茫然无措——百业待兴,困难重重。人们憧憬着,期待着,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起步的时候,您是如何在广东省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开放改革的决定。没有这个决定,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到这么穷,搞到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小平同志他掌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它的口岸差不

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5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还是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革”,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我当时很气愤,我说谁要拍电影,要反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你就到汕头来,拿汕头做一个背景。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和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那时,叶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年2月21日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了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考虑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偏于一隅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但是，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啊，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北京有另一类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了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当年9月，谷牧同志来广东。当时，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他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省委决定由我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筹划办特区，得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否则，就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最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十年后，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特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册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前后作过13个草案文本，可谓是字字推敲。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在特区还只是个“概念”的情况下，率先着手拟定《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我们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

讨论,哪些我们立刻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说叶帅呵,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

真的,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尽管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特区条例》拿到人大讨论,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的。我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呵!虽然叫作广东《特区条例》,但它是中国的特区嘛。社会主义搞特区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说我不敢办特区。

后来,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种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可谓是大破大立,展示了一种智慧、胆略和冒险精神。

有人问:特区这么搞行不行?除了天上飘着的是五星红旗以外,地上搞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记者: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照搬。吴老,您是如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呢?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却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刚到深圳时,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褲在田里驶牛,许多从内地去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也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从1980年下半年起,这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党中央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份报告现在可以公开了吧?)。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目前,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

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最先从深圳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

特区改革,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先是姓“社”姓“资”,继而由“反对和平演变”引发出坚持“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

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如何反思与总结 20 年间的得与失,成为确保改革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

记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历史的写照。吴老,你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矛盾尖锐极了。

1982 年的 1 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一——

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5 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上,有人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 327 平方公

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说得很尖锐,很离谱,象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个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 1980 年在一个文件中定的,有人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照此论调,我们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1983 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 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会议。

4 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会议。会议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 1979 年 4 月小平同志说的:“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

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没有也不能一一读。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我想,特区之所以能够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的试验、实践,证明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精辟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试验。

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当然还有许多可以谈的。就先谈到这里吧。

(原载12月1日《南方日报》)

注重效益 稳步发展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刘 峰

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底成立,1982年3月特区基础设施工程动工兴建。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从汕头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努力探索一条投入较少、产出较多、效益较好的路子。至1987年底,累计完成基建投资5.08亿元,其中,国内投资3.75亿元,利用外资1.33亿元。1983年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372万元,到了1987年,已发展到3.38亿元;1984年出口总值仅449万美元,到了1987年,已发展到1.78亿美元。从1984年起资金开始回收,至1987年底累计回收2.1亿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56.5%。

汕头经济特区的起步建设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一、坚持“四个一片”的方针,量力而行搞好基本建设

汕头特区设置于汕头市东至东南面的海滨地带,面积为52.6平方公里,分为龙湖和广澳两个片区。建设初期,汕头特区的交

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筹措也较为困难。因此,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做好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执行“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建设方针,分期分片进行开发建设。

汕头特区的建设首先从龙湖片区 1.6 平方公里开始,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沙丘,我们把这片土地划为 5 个小片区,规划到 1992 年开发建成。首期开发面积为 0.2 平方公里。在其基本建成、摆满、逐步发挥效益之后,再开发第二小片区 0.24 平方公里。接着再进入第三小片区 0.47 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龙湖工业区的同时,我们还逐步开发建设了与工业区相配套的港口码头区、农业水产区、金融商业区、旅游区、住宅区,并发动特区内的农村及企业自筹资金开辟了珠池、广澳、渔港等 6 个小加工区。至 1987 年,汕头特区已开发建设的面积达 3.65 平方公里。

在建设资金投向方面,我们一开始就坚持以生产性投资为主的原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加工业的建设。在已完成的 5.08 亿元的基建总投资中,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有 3.68 亿元,占总投资的 72.5%。其中用于设备投资的有 1.6 亿元,占总投资的 31.5%。6 年中,共建成道路总长 40 多公里,3000 至 5000 吨级集装箱和散装两用码头 1 座,连接省、市电网的 4 万千瓦安变电站和 6400 千伏安变电站各 1 座,日供水 2 万吨的供水工程,与汕头市区 12000 门程控电话系统联网的特区 2000 门程控电话系统。同时,电传、传真等现代电讯设施也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特区的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条件。特区的厂房建设也一直放在主要的位置来抓。在目前已竣工的 49.5 万平方米房屋中,厂房和仓库的面积达 27.9 万平方米,占 56.4%。

在确保重点的同时,我们还认真抓好服务于生产的配套设施

建设,从小到大,逐步配套,相应发展。如特区内商业网点的设置,初期多数是比较简易的临时性设施,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高层商业楼宇的建设。龙湖宾馆一开始也只有 52 间客房,随着来往客人的增加,1986 年才扩建为有 237 间客房的较为高档的宾馆。至 1987 年,特区内已建起了一批写字楼、商场、餐厅、游乐场、宾馆、招待所、客商公寓、职工宿舍等生活服务设施,从而形成了较为配套的投资环境。

我们认为,这种量力而行,分期分片开发,确保重点,抓好配套的做法,比较符合汕头特区的实际,是一条以比较少的建设资金来达到较快形成投资环境的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扬长避短抓好外资引进

在抓好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1、精简机构设置,强化服务观念

在特区行政机构的设置上,我们根据有利于外资引进的原则和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力求建立起“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至 1987 年,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之下只设立 14 个行政局。这些局不少是综合性行政部门,如经济发展局统管了内经和外经工作,规划建设局统管了规划、设计、城建、环卫、三防等工作。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简化办事环节和审批程序。在行政局领导人员的配置上,我们严格控制线数,规定只设一正一副。对机关工作人员也严格挑选,控制编制,力求精干。

在精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基础上,我们还反复加强对机

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强化“少干预、多服务”的观念,并建立了“24小时内答复询问”的制度。对客商申报投资项目,我们明文规定:从接受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之日起,应在1周内作出答复;经批准立项的项目,如资料、证件齐备,在特区权限之内的一切手续应在10天内办完。由于特区的机构较精简、手续较方便,前来投资设厂的外商普遍感到比较满意。

2、实行优惠措施,降低收费标准

汕头与香港之间有300多公里的陆上距离,因此,在汕头特区投资设厂的外商往往比在深圳、珠海投资增加了直接和间接的成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发挥汕头劳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价格低廉的优势,把汕头特区的劳务费标准控制在比深圳低1/3左右,同时适当降低厂房租金。

《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公布以后,我们又进一步调低了劳务管理费、征地管理费、土地开发费和使用费,对产品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企业则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并将原来的2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为19项。对各种收费项目和标准,特区管委会还专门行文公布并授权物价部门进行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可拒交未经合法程序批准的收费及可向特区管委会申诉。经过各种努力,汕头特区的各项收费比较合理,基本上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外商对此比较满意。

3、尊重外商的合法权益,保障“三资”企业的自主权

充分尊重“三资”企业的自主权,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为了使“三资”企业享有较为充分的自主权,我们坚决做到:外商在批准的合同范围内可以自行安排生产和供销;可以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采购生产资料;可以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励、津贴制度;可以自行聘用或辞退职员、工人等。与此同时,我们充

分尊重外商的意愿,投资方式不拘一格,如外商愿意独资经营的,也按条件和手续给予批准。因而至1987年,直接引进外资的79个项目中,外商独资经营的项目有29项,占37%。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对合作经营中产生矛盾较多的则采取由一方承包经营的办法。

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汕头特区引进外资的工作逐步发展。至1987年底,利用外资签约合同422项,协议投资总额1.17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5138万美元。已开业的“三资”企业大多数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在汕头特区投资增强了信心,纷纷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据1987年9月份的统计,在开业一年以上的24家外资企业中,有13家不同程度扩大了生产规模。这13家企业的职工从1489人增加到3425人,增长130%;厂房从20962平方米增加到93800平方米,增长347%;另有2家企业租地21亩,准备自建厂房。1988年1、2月份,新签直接引进外资合同9项,协议投资总额445万美元,还有13个项目投资总额共1049万美元,在3月份的香港投资洽谈会上签约。

三、以出口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区经济

我们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办好特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以出口为导向,与办实业、发展生产上,朝着以工业为主,农业、交通运输、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不断努力。至1987年底,汕头特区已签约的外引内联和自办企业556个,协议投资和自办企业投资总额9亿元。其中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企业362个,占总企业数的65%;协议投资5.16亿元,占协议总投资额的57.2%。1987年特区工农业总

产值 3.38 亿元,比 1986 年增长 131.9%。其中工业总产值 3.1 亿元,产品外销比例达 81.2%;农业总产值 0.28 亿元,产品外销比例在 60% 以上。在特区经济中,“三资”企业占有较大比重。1987 年“三资”企业工农业总产值 2.03 亿元,占特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60%;出口总值 0.76 亿美元,占特区出口总值的 42.4%。

汕头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主要抓住以下几条:

1、发挥劳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特区起步建设后,我们也曾希望尽可能引进一些技术较为先进、规模较大的项目,但实践的结果觉得很困难。如现已在蛇口投产的浮法玻璃厂,开始来汕头洽谈,因电力不足未能谈成。广澳石油化工项目,拟引进外资 20 亿美元,几乎从办特区起就开始与外商洽谈,至今仍未谈成。因此,我们觉得,汕头特区的工业引进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先从劳动密集型搞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发展。至 1987 年 9 月,我们已经兴办并投入生产的 163 家工业企业,主要行业门类有服装、纺织、陶瓷、食品、塑料、工艺、玩具、电子、钟表等,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具有出口创汇能力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国外有市场、国内有资源,具有投资少、产出快、耗能低、用人多、应变能力强等特点,符合汕头劳力资源丰富、轻工业有基础,而资金筹措困难、能源不足等实际,有利于以较少的投入,达到较快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的目的,有利于逐步积累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过渡到重点引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项目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引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的同时,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在内联的基础上搞外引的办法,引进一些规模较大一点、技术档次较高一些、产品能够出口的项目。如从联邦德国引

进具有 8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技术设备的聚酯切片厂,年产 12000 吨聚苯乙烯的合成树脂厂,与日本合资经营的电子元件厂等。

2、发挥“龙头”、“龙尾”作用,发展增值加工和发外加工

为了扩大产品出口,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创汇能力,我们大力发展增值加工和发外加工。如瓷乡潮州枫溪镇,仅 1987 年一年就为特区华达宝陶瓷制作厂提供了 870 万港元的初级产品,由该厂精加工为仿古瓷工艺品销往欧美市场,既提高了特区的出口生产能力,又推动了内地陶瓷业的发展。又如特区的锦荣制衣厂,根据中东市场的需求设计了各式中低档服装,然后发放到内地加工点进行初级加工,又拿回特区精加工、精包装后出口,该厂在特区内只有 200 多名工人,在特区外就有 30 个加工点、4000 名工人在为其发外加工服务,1987 年出口服装 60 万打,出口值达 890 万美元。这样做,对特区和内地经济的发展都十分有利。

3、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立“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

潮汕平原地处亚热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农民善于精耕细作,同时,潮汕海岸线较长,水产资源丰富。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一方面加强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另一方面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把国外的信息、技术、市场和潮汕的农业资源结合起来,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的加工、保鲜、包装技术设备,逐步建立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的“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例如,我们根据日本市场上鳗鱼销售量很大而汕头有鳗苗资源的特点,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养鳗技术,在特区内和汕头市 7 个县 23 个点开辟了 567 亩养鳗基地,又从日本引进了一条时产 200 公斤的烤鳗生产线,烤制鳗鱼出口,形成捕鳗苗、育鳗种、养成鳗、烤鳗、出口一条龙。又如汕头沿海梭子蟹资源丰富,但过去这种海产品价值低,只在本地市场销售。1985 年初,我们从泰国引进一套

梭子蟹肉配料处理技术和罐头制作生产线,并组织沿海渔民捕捞梭子蟹,就地办起11个加工点进行初加工,然后运到特区加工制作成高级食品罐头,产品增值5倍以上。1987年,汕头特区的梭子蟹肉罐头已出口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食品市场。

至1987年9月,汕头特区已在区内外开辟了对虾基地46000亩、养鳗基地567亩、蔬菜基地6000亩、芦笋基地3760亩、生柑基地4500亩;从国外引进了加工、急冻、包装、保鲜等生产线或设备8条(套),在特区内建起了烤鳗厂、水产罐头厂、水产品急冻厂、蔬菜急冻厂、水果保鲜厂、保健食品厂等9家食品加工厂;还建成了6个种养示范场和1个试验中心;许多产品如烤鳗、急冻对虾、急冻小包装蔬菜、梭子蟹肉罐头、生柑等已基本形成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特区的“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已初具规模。

回顾汕头特区建设的历史,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在开发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还不够有力,迈出的步子不够大;对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做得不够,目前还缺乏一批规模较大的骨干企业;对教育与科技的战略位置,我们的认识仍然不足,措施不力;在体制改革方面不够大胆,也不配套;行政管理 and 企业管理的水平也不够高,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为特区经济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

1988年2月

汕头经济特区十年历程

吴波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汕头经济特区这片土地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沉睡的沙滩荒丘,如今朵朵改革开放之花竞相怒放,结出丰硕果实。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区建设者的十年艰辛创业,使汕头经济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济建设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年间,汕头特区的工业高速发展,产值平均每年以155%的速度增长;出口创汇从零开始,平均每年以113%的速度增长;利用外资由近及远,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平均每年以48.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本建设逐步加快,投资环境日臻配套完善,特区面貌日新月异。由于改革不断深化,特区的体制更加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相应发展,特区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社会治安稳定,到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汕头经济特区十年建设实践和取得的业绩,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实行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同

志的题辞,是对汕头特区建设的最好概括。

一、十年历程回顾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同年8月29日,成立了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汕头市办事处,负责汕头特区的各项筹备工作。

1981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面积1.6平方公里,位于汕头市东郊龙湖村西北角的沙丘地带。同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特区建设开始起步,当时中央给的任务是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利用外资改造市区老企业和发展旅游业。广东省结合汕头的实际情况,确定划出19.3平方公里作为农业控制区发展出口农业;划出1.7平方公里作为港口预留区筹建码头。从此特区开始一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面引进外资办企业,发展出口加工工业。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准汕头经济特区的区域面积扩大为52.6平方公里,分为龙湖和广澳两个片区,开始朝着以工业为主,出口农业、交通运输、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各业并举的方向综合发展。

1986年初,根据国务院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的“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的方针,汕头特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抓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提高引进项目的规模、档次。

1988年以来,在国家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环境下,汕头特区正确处理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

治理整顿中“求稳定,求提高,求发展”,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以外引内联与办实业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因而特区的建设速度加快,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取得更大的进展。

1991年4月,国务院批准汕头经济特区的区域扩大到整个汕头市区,面积234平方公里,并确定于1991年11月正式实施,理顺了特区的领导体制,使汕头特区获得了作为一个多功能城市综合发展的条件。

二、十年建设成就

十年来,汕头经济特区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办好经济特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效益,走求实发展的道路,使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建成一个基本配套的新城区。在十年开发建设中,汕头特区相对集中财力物力,做好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建设,并逐步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目前已开发建设了龙湖工业区、珠池工业区、台商投资区、港口码头区、农业水产区、金融商业区、旅游住宅区以及广澳东湖工业区、后江工业区、狮岭工业区和旅游别墅区,全区新开发建设的土地已有8平方公里。至1991年8月底止,累计投入基本建设资金达25.4亿元,房屋施工面积357万平方米,其中厂房仓库面积204万平方米。建成总长72公里的道路网络;建成1座3000吨级的特区码头,开辟了汕头至香港的海上货运、客运业务和转口远洋运输业务;建成装机容量13000门的程控电话系统,开通了汕头至香港、澳门、台湾、新加

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南朝鲜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60 多个城市以及国内各省市的直拨电话；建成日供水 6 万吨的供水管网和 1 座首期日处理污水 7500 吨的水质净化厂，供水和排污设施配套；建成两座变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6 万千瓦的特区两座燃油发电厂一期工程 2.5 万千瓦发电机组已投产发电；建成以一批工业大厦、银行大厦、管理大楼、海关大楼、通用厂房、宾馆、商店、学校、幼儿园、职工宿舍、商用楼宇、客商公寓、游乐场、快餐厅和综合市场等为主体的建筑群，生产和生活设施日益配套。

“昔年荒地沙丘，今朝玉宇琼楼”。一个新型经济特区已屹立在旧日的荒丘之上。

(二)初步形成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体系。汕头特区在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紧紧抓住外引内联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的水平。从 1983 年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特区到 1991 年 8 月底，全区累计批准签约的利用外资项目 1211 项，协议投资总额 7.03 亿美元。在这批项目中，直接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 521 家，协议投资总额 6.25 亿美元。目前实际利用外资已达 3.04 亿美元，已有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南朝鲜、泰国、美国、法国、巴拿马、德国、瑞典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汕头特区投资设厂，投资范围涉及电子、钟表、制药、制鞋、服装、化工、机械、食品加工、陶瓷、塑料制品、厂房开发等 20 多个行业，已投产的“三资”企业普遍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坚定外商投资信心，也吸引了更多外商前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汕头特区生产发展的生力军，其产值约占全区工业产值的七成。特区还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至 1991 年 8 月底，全区共批准内联项目 652 项，投资额达 8.77 亿元，联合面涉及中央 8 个部、14 个省、市、自治区。与此同

时，特区不断鼓励直属企业兴办生产性项目，壮大特区国营经济实力。

全区已批准兴办“三资”、内联和自办各类企业 1759 家，其中生产性企业占 67.5%，特区生产力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形成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从而保证了特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且以较高的速度发展。1982 年起步建设时，全区工业产值只有 40 万元，到 1986 年打基础阶段，生产有了明显发展，工业产值达到 1.3 亿元；1988 年起，生产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 年工业产值达到 19.25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为 1986 年的 11.5 倍。1991 年 1—8 月份，全区工业产值已达 19.82 亿元，预计全年可达 34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70%。与外向型工业同步发展的汕头特区出口农业，经过十年开发建设，目前已拥有自办、“三资”、内联的种植、养殖及其加工的经济实体 83 家，基本上形成了以特区为龙头，以潮汕平原为腹地，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的新型出口农业体系。汕头特区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正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三)逐步建立起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结构。汕头特区在外引内联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致力于与国内外广泛建立各种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发展对外贸易。从 1984 年特区进出口贸易迈开步子以后，对外贸易渠道不断拓展，对外贸易额逐步增长。1984 年，全区出口总值只有 449 万美元，到 1990 年达 4.19 亿美元，增长了 9.3 倍。据 1990 年的统计，在全区 19.25 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中，工业出口产值达 13.9 亿元，占 72%；1991 年全区出口值将达 5 亿美元，比 1990 年增长 20%。十年间，汕头经济特区建立了以出口为目标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为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一批出口商品基地，迈出了境

外办企业的步子,为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打开门路;同 36 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主要出口商品达 20 大类近 1000 个品种。对外贸易已形成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结合、转口贸易与直接远洋贸易结合、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结合、“三来一补”与一般贸易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外贸格局。

(四)不断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作用。随着汕头特区自身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其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的辐射功能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发挥出来,对于内地经济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日益明显。首先,由于特区运用“龙头”、“龙尾”政策,发展增值加工和发外加工,带动了周围地区工农业的发展。全特区有 550 家企业设立了分布于各县的 2000 多个发外加工点,发外从业人员近 12 万人。如特区华达宝陶瓷制作厂每年从瓷乡潮州枫溪镇订购白坯瓷,在特区精加工成仿古陶瓷工艺品销往欧美市场,枫溪镇每年为这个厂提供的初级产品达 1000 多万元。十年来,特区还根据农村地区农业和水产资源丰富特点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同内地联合,投资建立和扶植初级产品生产基地,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加工、保鲜、包装技术,形成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如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养鳗技术和烤鳗生产线,在农村建立养鳗基地和在特区建立烤鳗厂,生产烤鳗出口,1990 年出口值达 1473 万美元。同时注意发挥特区联结内地和外资的中介作用,把内地的技术、人才与特区的政策和国外的资金、先进设备、销售渠道等结合,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快生产发展。至 1991 年,特区共有“中、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48 家。特区物资进出口总公司与汕头化学制药厂和哈尔滨合作兴办的内联企业鲑滨化学药业总公司,1990 年与日本一公司合作兴办华明医药有限公司,生产抗癌药品,产品可以产顶进,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大笔外汇。十年间,汕头特区依托内地,增

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服务内地,不断发挥“窗口”和基地作用,与内地之间形成了取长补短、协作发展、共同繁荣的经济合作关系。

(五)培养锻炼了一支具有“求实、开拓、竞争、奉献”精神的干部、职工队伍。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综合试验区,两种经济制度和各种思想意识在这里交汇,因而,开创特区建设事业的同时,也是对特区建设者的锻炼和考验。在汕头特区十年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既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又培养了一支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具有“求实、开拓、竞争、奉献”精神的干部、职工队伍。在特区建设实践中,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不断加强,1983 年成立特区党委时,只有 126 名党员,到今年上半年,已发展到 3644 名党员,建立了 12 个基层党委、2 个工委和 328 个基层党组织,绝大部分党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自觉地同中央保持一致,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增强公仆意识和服务观念,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干部职工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逐步以“求实、开拓、竞争、奉献”的精神取代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投身特区建设事业,创建两个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现在,讲贡献、讲团结、顾大局、守纪律的良好风尚和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参与竞争的精神已成为特区干部群众思想风貌的主流。

三、体会和感受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试验,是一项划时代的全新事业,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效仿,需要特区的建设者们在充满挑战与竞争的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探索和开拓。经过十年艰苦创业的历程,我们从现实的

角度回首回顾,有以下的体会和感受:

第一,试办经济特区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过程。我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封闭状态,在深刻而痛苦的反思中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一旦打开国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外部世界与内部各种矛盾的冲击,而处于对外开放前沿,作为改革试验场的经济特区必然首当其冲。汕头特区起步之初,适逢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经济特区有诸多争议,对经济特区的生命力深表怀疑,经济特区的建设举步维艰之际,困难与压力是很大的。这中间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交锋和观念转变。特区的开拓者正是在这一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了信念,迈出了踏实的第一步。此后,在关系到如何办好经济特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总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思想,更新观念。在最初几年的摸索之后,我们的思想便超越单纯出口加工区的圈子,开始把目光投向综合性经济特区,并努力使这一有本质意义的模式转变成成为现实;当中央对特区建设提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的新要求时,我们逐步把思想统一到提倡和鼓励办实业上来,相应制定了若干具体措施,使特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较大的提高;面对特区优惠的特殊政策相对淡化,各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的现实情况,我们强调要把观念从原来较多地依赖特殊政策转变到苦练内功、自我完善上,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使特区的吸引力、竞争力、积聚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在治理整顿的环境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辩证地处理好进与退,保与压,速度与效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等关系方面,合理调整,积极进取,使特区外向型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既求得效益,又争得速度。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办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形象地概括了办特区的历史使命和创新的艰难。十年的实践,我

们深感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思想解放和观念的不断更新,是办好经济特区的先决条件,而只要经济特区作为一个“学习、观察、试验”的过程还在继续,就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想观念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

第二,建设经济特区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讲求效益的方针。汕头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能源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资金筹措上的困难,决定了汕头特区的建设不能盲目地铺摊子,争速度,而应该从自身的现实条件出发,在国家可能的帮助下,坚持自力更生,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节骨眼上,使基本建设的速度、规模、效益三者尽可能地统一。为此,在资金筹集上,我们坚持以自筹和利用外资为主,国家帮助为辅的方针,截至1990年底,在预计完成的22.55亿元基本建设投资中,62.8%是自我积累的资金,28.1%来自外商直接投资,贷款占7.2%,国家的拨款只占1.9%。在资金投向上,坚持突出重点,集中财力搞好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建设,75.1%的基建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生活服务设施开始是因陋就简,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才逐步配套。在开发建设模式上,初期是实行“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滚动式发展的方针,并采取大环境依托市区的做法,以较少的投入较快地形成投资环境,在特区财政和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的时候,才逐年加快速度,扩大规模综合配套,以日臻完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商。1988年至1990年3年,投入基本建设资金达17.47亿元,相当于前6年投资总和的3.44倍。在开发建设的组织形式中,一开始是指定直属国营开发公司进行小区开发,集中有限的资金确保小区配套建设,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前提为首先进入特区的投资者提供优惠的投资条件;当外引内联的步伐不断加快,要求有更广阔

的投资领域,更大的选择余地时,才调整为多家开发,多种形式开发,到1991年,有包括直属、内联和“三资”在内的42家企业参与了特区的开发建设,特区的开发面积从5.8平方公里扩大到8平方公里。

由于坚持执行上述的方法,汕头特区的基本建设见效较早,回收较快,包袱较轻,既使是在前两年经济形势严峻情况下,也仍能轻装上阵,逐步扩大建设规模。从实践的结构来看,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讲求效益的方针,立足于依靠积累,适度借助外力是对的,既结合本地实际,也适应中国的国情,与国家所提倡的建设方针也是相符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特区的建设才能根基牢固,步子扎实。

第三,发展特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为中心。在制定汕头特区工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根据本地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好,轻型工业有一定基础,对外经济交往较多,具有侨乡优势,但能源不足,交通条件较差等实际情况,选择了以出口为导向,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起步,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工业过渡,规模从小到大,技术档次由低到高的发展路子。在产业结构上,汕头特区选择了电子、食品、轻纺、医药、陶瓷、塑料、皮革、精细化工为主要行业,现有的企业大多数是外向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具有投入少、产出快、耗能低、应变能力强等特点;在投资构成上,“三资”企业占了较大比例,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在市场方向上,汕头特区自产产品的出口比例一直在70%以上,从未发生外汇无法自行平衡的情况;从经营效果看,无论是直属企业还是“三资”企业,都普遍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投产一年以上的“三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不同程度地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未有企业因亏损而中止经营。直属国

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较高。由于坚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因而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主动性,在近几年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受到的影响也就相对小一些,工业生产仍然在取得效益的前提下呈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开始引进了一批技术档次较高、规模较大的生产性项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实践使我们体会到,特区的“特”,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外向,把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引进来,把产品打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和竞争,只有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中心,在这方面真正地“特”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

第四,经济特区的管理体系必须以“精简高效”为原则,并在不断推进改革中改善投资“软”环境。十年来,汕头特区在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改善“软”环境,力求以“软件”之长补“硬件”之短,逐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首先是坚持以“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机构,特区的领导班子只有常委会和管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局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只有17个,客商到汕头特区办事需要盖的印章少,程序简单,迅速快捷;其次是强化服务观念,提高工作效率并建立健全各种办事制度,如公开项目审批,进出口审批和基建审批程序,代客商办理项目申报手续,建立“24小时答复询问”的制度,提倡深入基层为企业解决困难的工作作风。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报批材料之后一周内便可获得项目批准证书,企业所提出的意见和投诉,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或明确的答复。在管理形式方面,我们则实行单层次,少环节,强化职能部门,减少主管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具体干预的办法,所有企业除了在工商、税务、外汇、进出口等方面必须接受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之外,不再受中间管理层次的干预;此外,我们还在发

展中不断地调整措施,推进各项改革,如加强对引进外资工作的组织协调,随着形势的发展及时修订鼓励投资的规定和措施;推行全员、全工龄投保的劳动保险制度;改革土地管理体制,试行房地合一的管理形式;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职工劳动合同制和干部任期制;逐步建立技术市场,人才劳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所有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有效地改善了特区的投资“软”环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从而使外引内联工作有了较大的突破。我们认为,特区软环境的完善,应立足于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可能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创造一个能让企业在平等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唯有这样,才能把更多的投资者吸引进来,并把企业办成功。

第五,经济特区既要特事特办,又必须始终明确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特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举办的经济特区,既要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往,在直接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的过程中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引进来,又要抵制伴随而来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潮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也是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所在。在汕头特区十年的建设历程上,我们坚持一手抓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根据特区经济往来活跃,涉外活动频繁,人员构成复杂的情况,探索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方法,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利用各种培训基地和宣传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要求广大干部职工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做到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严的纪律,特别好的风气”。另一方面,坚决贯彻上级各个时期的部署,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扫除“七害”,惩治腐败,抓好廉政建设,搞好综合治理,在特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与此同

时,引导企业积极建设开拓进取、求实向上的企业文化,逐步配套文化娱乐设施,组织多姿多彩的活动,丰富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展现特区人健康、文明、乐观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汕头特区创立以来,基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也没有出现什么政治风波,始终保持了安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认为,经济特区的重大历史使命还在于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并以成功的发展充分表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在整个特区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既以开拓的精神和全新的方法促进外向型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又以坚定的信念和立场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种特殊的试验才能说是成功的。

(1991年)

汕头经济特区创办头十年 精神文明建设回顾

陈序藩

汕头经济特区是全国五大特区之一,起步建设于1981年11月。一开始,中央只批准1.6平方公里面积建设出口加工区,至1984年底,才批准扩大至52.6平方公里,建设综合性特区。1991年11月,又扩大至整个汕头市老市区,面积为234平方公里。可以说,汕头特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物质文明建设外,同步开展了大量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确保了特区建设事业顺利开展。本文着重记述头十年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

1981年11月14日,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于翌年2月从汕头行署办公室调到特区,开始负责办公室的资料、接待、人事等工作,当管委会领导参谋。1983年10月,特区正式成立党委会。我被提任党委委员和管委会副主任,分工负责组织、宣传、纪委、劳动、公安等工作,开始对特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工作进行筹划。这时特区刚刚起步建设,大量工作是进行“五通一平”基础工程,特区机构只建立了六个部和八个公司,人员仅百来人。三资企业刚开始进来,工人尚不多。到1986年,特区已初具规模,各行各业开始兴办,特区管理机构也逐步健全,人员增加迅

速,工人队伍发展相当快。省委、市委指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特区党委会设立专职副书记,专管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工作。经过班子的调整,1986年8月,我从管委会副主任被调任为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和政法书记,自此,名正言顺地开始了我主管特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历程。

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同内容?从何抓起?需采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和措施?开始时,心中无数。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和研究,加上学习深圳、蛇口等地经验,并边干边摸索,才逐步体会到经济特区是党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对外交往的前沿阵地,起着对外宣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作用,又是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经济结构上,它允许外商资本的进入,全面发展个体、私营、集体、国营等综合经济。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来自本地的、外地的、境外的、国外的,青年工人、干部比例大于任何地区。经济和人员的多元化,使特区呈现活力和生机,但也带来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文化的交汇点。

分析了上述情况,有利于有的放矢。1983年10月党委会一成立,就针对外资企业开始进入特区的情况,向全体特区干部、职工提出,要在同外商的交往中,做到“合营不合资”、“排污不排外”。并逐步制订出台各种规定和制度,印成手册发给干部职工,组织大家学习执行。

比如,对广大员工,有具体的合同条例和员工守则;对广大工作人员,有完整的工作、学习、生活守则和外事纪律规定;对领导骨干,有聘任制度和目标责任制要求;对广大党员,有民主生活制度和廉洁奉公规定。

我们用这些制度,首先来规范特区人的行为,要求特区各单位

都要做到有“特别严的纪律,特别高的觉悟,特别好的作风,特别快的效率”。这就是特区的特殊。用这种要求来纠正某些人的错误认识,认为特区的特殊是有“三洋”——洋人、洋物和洋钱。端正来特区的动机是为了捞钱的片面认识。

但随着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的确也碰到一些特殊的难题。比如在教育工人当好特区人,为特区建设作贡献的时候,有的工人就提出:过去我们学习时听到看到,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与被剥削。今天办特区,允许外商进来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这样做,是否又在发展资本主义?在三资企业工作,我们的剩余价值被老板拿走了,是否又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又提出:原来我们在国营企业工作,是国家的主人,今天到三资企业工作,是否还是国家的主人?

上述问题,的确是由特区的特殊地位、性质引发出来的。如何向工人解释,做通工人的思想工作,开始我们理论底子不深,办法不多。后来,通过反复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兴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并向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请教。许老在一篇专论特区的性质、作用文章中阐述了特区工人提出的问题。

关于特区的性质问题,许老文章中说到,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党中央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决策,它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土上,整个说,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允许境外资本家进来办企业,这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以补充我们快点建成社会主义之所需。三资企业进来后,要服从我国的法律、法规,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资本主义,有人叫做国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与解放前的资本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只要善于利用其长处为我所用,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利。

关于工人在三资企业工作,是否还是国家主人?是否存在剥削与被剥削问题。我们也用许老文章精神作了如下解释:

工人到特区三资企业工作,是特区建设的需要,是特区政府按合同派大家去的,大家是特区的工人,仍然是国家的主人。至于在三资企业工作被拿走的剩余价值,是什么性质,我们说,这当然是一种剥削现象,但这都是按合同办事的,是有代价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赎买政策,就是用剩余价值换取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过这一次学习、探讨和对工人开展教育的实践,使我们充实了很多办特区方面的理论,也疏通了工人的思想,提高了认识,激发大家积极当好一名特区工人的自觉性。

1986年以后,特区进入边建设边引进全面发展时期,干部、工人增加迅速,管理工作正规化、国际化,以办事快速、高效来树立特区新形象,以此吸引更多外商。这一问题,已成为党委急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如何办?经过集体研究,决定从组织机构、抓好队伍建设入手。

第一,建立精简机构,组织起一支“精干高效”的工作队伍。特区是新建机构,一开始,党委会就确立“机构要简,人员要精,宁缺勿滥”的指导思想。在组建各工作部门时,本着改革精神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敢于突破,不和内地机构对口。结果,新组建起来的机构是:党委会、管委会两块招牌一套人马,书记、主任两职一肩挑,副手仅有6个人,不设党委常委。下面部、委、办、局只设17个。一个经济发展局就包含了内地现行机构中的外经委、经委、农委、财办等职能,并负责引进洽谈、起草合同、实施企业管理等工作。党委、管委会各工作部门又集中一幢楼办公。这样一来,机构少,人员精,又集中,办起事来快捷方便。外商进来办企业,从申请

登记到开业,进一个门槛大部分手续可办妥。证件资料齐全,一周可办完申报手续。我们又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规定严格的工作纪律,提倡办事公开,开展优质服务,从而树立起特区的良好形象。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却换来有口皆碑的良好效应。1994年元旦,特区第一家宾馆——龙湖宾馆开业,在培训服务员时,我们要求服务员礼貌待客,规定好多文明用语,电话总机接线员率先用上。接听电话时先道一声:“你好!我是龙湖宾馆。”客人进入宾馆,先道声:“欢迎光临。”离开宾馆时,道声:“谢谢,再见!”简简单单的几句用语,使客商大为赞赏,说来到特区,就好像到西方文明国家一样,大有亲切感。

接着,我们又在提高工作效率上下工夫。有一次同外商座谈时,来自香港的客商陈锡谦先生向我们提出,说他们日常碰到好多问题需要向特区领导反映和请示解决,要求特区建立一个答复制度,最好是能在24小时内答复。我们觉得陈先生此议有道理,立即作出规定,要求各部门在接到各单位、各企业电话或书面请示报告时,可办与否,能办与否,何时办妥,一律要在24小时内答复请示人。简称为“24小时答复询问制度”。此举,又受到极大好评,一改客商过去总认为国内办事效率低、办事难的旧看法。

第二,抓好党建工作,培训建设特区带头人。特区建设一起步,困难重重。地点选定市郊龙湖村一带,为汕头市区的东北部,这里是一片海潮冲积的沙滩,道路狭小,电讯不通,淡水缺乏,贫脊荒芜。特区管委会成立后,经过一番筹备,1982年7月正式搬到现场办公。刚来乍到,这里仅有原市郊农科所留下的一幢二层楼瓦房,面积不足300平方米,管委会好多部门,就临时搭起篷棚办公。特区开办时,中央宣布只给政策不给钱,省委也没法给钱,只得在汕头市财政上缴部分中留点作开办费。“五通一平”的基础设

施建设所需资金,全部要靠引进外资和银行贷款。条件差,资金缺,使好多人信心不足,有些人甚至不服从组织决定,拒绝到特区来工作。如何战胜困难,促使特区建设迅速铺开,党委会一班人明确提出要从抓好党建工作入手,培养一批建设特区带头人。经同地委、市委组织部门商量,决定先从地、市机关挑一批能吃苦、有觉悟的党员作为特区各部门骨干。地、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要特区党委点名,点到谁调谁。经过了解发掘,特区党委点了三十多人,组织部门即逐人做工作,思想通了先调,结果调了十多人。这批人中,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入伍的老党员,文化层次不算高,但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最可贵的是能吃苦,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非常适应特区初创阶段的工作。这些人一到特区,即分到各部门、各公司当骨干。大家看到当时特区的一穷二白,二话没说,即带领全体干部、职工,投入“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平整荒滩没有机械,大家拿出修水利老办法,锄头加簸箕;筑桥时没有现代化工具,当过公社书记的老党员带领大家用堵河抗旱的办法,即用沙石堵河截流,桥建成后才放水把沙石冲掉。经过这批共产党人的带动,大家奋战了8个月,开发出特区龙湖工业区的第一片区,建起第一批厂房,1983年8月引进第一批三资企业,使大家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奔头。好多共产党员原来缺乏生意经,经过学习动员,大家精神一振作,边做引进工作,一边又办起公司,利用中央优惠政策,大办进出口贸易,为特区建设积累资金。至1984年底,汕头特区范围扩大至52.6平方公里,中央批准办综合性特区,自此,特区发展神速。1985年后,特区财政已有自己的收入,各行各业都迅速开展起来。这时,又出现了新情况,就是特区要不要加强党的领导。有些人认为:既然是经济特区,就突出抓好经济工作好了。言下之意是可以少谈党的领导,少谈政治。

有些人借口怕吓走外商,不敢公开提党的领导,不敢公开在三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把三资企业中的党员变成“地下党员”。有一次,我在一个外资企业检查工作,碰到一个外商也在参观,他看到小会堂里有一个牌匾写着: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他惊奇地说:“听说特区的党员都转入地下了,为什么还有新党员公开宣誓呢?”当时,我即明确地答复说:“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土上办的特区,党组织从来到处是公开的”。

针对这些情况,党委作出:“加强特区党的建设”的决定,公开指出:办特区是党的战略决策,鉴于特区的性质和特殊环境,更要加强党的领导。特区里的任何单位和企业,凡有党员的都要迅速建立起党组织。这一来,特区的机关、团体、企业,凡有三个党员以上,很快建立起党支部,接着又建立起直属机关党委和企业党委。至此,摆在党委面前的问题是:三资企业的建党工作如何办?由于有些外方老板刚来特区办企业,不了解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普遍对建立党支部存在二怕:一怕党支部建立后,会领着工人与老板唱对台戏,增加工作难度;二怕党组织经常要开会和搞活动,影响生产。针对外商的上述顾虑,特区党委派人深入三资企业,向外商说明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目的和作用,提出三资企业党支部的职责是:确保党和国家政策、法令的落实,合同的实行,使企业依法经营;协调劳资关系,带领员工模范执行符合我国法律的厂规厂纪;带领我方人员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家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帮助做好我方员工思想工作;教育和监督我方人员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使双方合作顺利,企业越办越好。我们又率先选择党员较多的澳门客商独资企业——华达宝陶瓷制作厂有限公司建立起党支部,做出榜样,以实际行动感动客商,消除客商顾虑。华达宝党支部成立后,近十名党员都是厂里骨干,平时处处以身作则,起

模范带头作用,关键时刻,不怕危险,冲锋在前。一次制作车间失火,党员带领全厂工人救火,并冒着危险冲进火场,搬出几桶天那水,使车间不致爆炸,减少损失。火灾过后,党员又带头护厂,帮助组织工人清理现场,一周内即恢复生产。这一事深深感动了外商老板,老板说:“若在外国发生这样的火灾,大家都争先跑掉了,一个月还不一定能恢复生产。中国的特区的确不一样,特区的党员真好。”自此,老板相信了党支部,积极支持党支部。支部在一千多员工中建立起崇高威信,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外资企业先进党支部”。

通过上述工作,使特区有一支带头人队伍,通过这支队伍去教育团结广大干部、职工,确保了特区人素质的不断提高。兴办特区的头十年,整个特区建设顺利,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第三,通过健全工、青、妇组织,组成建设特区大队伍。有了党员的带头,还要有广大党外积极分子的配合,才能组成建设特区的大队伍,把特区建设推向新高潮。1984年以后,随着特区建设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各行各业发展迅速,三资企业引进速度加快,工人队伍壮大,而且大多是青年人。如何组织好这支队伍?党委会一面加强思想工作,出台各项政策(主要是按劳分配方面政策)和法规。一面建立起共青团委员会、总工会、妇联会,并逐步把这些组织延伸到基层,团结和组织广大青年干部、职工,成为一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积极分子队伍。团委、工会、妇联,又根据各自的特点,经常开展各种“争先创优”竞赛活动。就这样,紧紧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建设特区的生力军。

最后,谈一谈汕头特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做法。鉴于特区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工作运行和生活节奏与内地有很多不

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比较强,因此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照搬内地的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经过摸索和借鉴兄弟特区经验,我们逐步形成一套具有特区特色的做法和形式,保证了工作效果。

比如,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中,不是用开长会、说教式、灌输式的老一套,而是把教育内容编成小册子,让干部职工自学,并针对各时期的不同思想苗头,运用节假日活动、厂庆、纪念日,组织度假、旅游、文艺晚会,组织演讲、歌咏、体育比赛和党团、工会日活动等形式,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寓教于各种活动中。既不影响工作和生产,又减少枯燥乏味的说教。还发动企业大兴企业文化,经常开展歌唱会、舞会、联欢会、时事法律知识竞赛等等,把思想工作融化于各种活动中。特区党委每年举行一次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把好的经验及时总结推广。

又比如在因人施教上,采取了分层次提出教育内容和要求。对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三资企业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各级领导骨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有不同内容和要求。如对广大干部,党委会强调:要加强5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教育,使大家积极投入特区建设;二是防腐倡廉教育,使全体干部正确理解“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方针,做到与外商“合营不合污”;三是更新观念的教育,激励大家勇于创新,大胆探索,甘于奉献;四是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要求特区干部自觉带头艰苦创业,在群众中当好表率;五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自觉抵制有损我国人格人格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对外交往中模范地做到不卑不亢。

对于特区的广大职工群众,着重开展改革开放和兴办特区目的意义的教育,要求大家都要自尊自爱,做个优秀的特区人。并进

行转变观念的教育,使大家牢固树立起: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知识观念、信誉观念和法制观念。

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扩大了教育覆盖面,收到良好的效果。十年的实践,归纳起来有5个坚持:即坚持思想教育的层次性和针对性;坚持在各种经济活动和文体活动中进行思想工作的灵活性;坚持思想教育与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的融合性;坚持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坚持党委重视,宣传部门主管,工、青、妇配合,人人动手的广泛性。

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加之特别的工作方法和措施,确保了汕头特区两手抓的同步发展,结出“投入较少,产出较多,效益较好”的硕果。

(注:此文的时间背景为1981年至1991年)

辉煌人生路 精忠报国情

——李嘉诚先生在1978-1998年

陈衍俊

在邓小平理论的光照耀和指导下,古老而伟大的神州大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间,已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增强。在国际社会举世瞩目,举足轻重。

在这改革开放的20年来,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潮汕籍旅港同胞、世界著名的华人实业家,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盛赞为“真正的爱国者”的李嘉诚先生,功不可没。

本文所简为介绍的,是有关李嘉诚先生在这伟大年代里所走过的辉煌人生路,所付出的精忠报国情。

华夏骄子 情倾家国

李嘉诚先生,于公元1928年7月29日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北门街面线巷(原称潮州府海阳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后日

寇侵华,潮汕沦陷,即随父母移居香港,时为1940年冬。不久因其父病逝,家境窘迫,遂于1943年投身社会务工。几经艰辛而顽强的拼搏奋斗,李嘉诚先生在1972年9月31日首建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此前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塑胶花业和玩具业,曾在港及欧美等地赢得美誉,独占鳌头。后转轨从事地产投资。“长实”股票先后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交易所、金银交易所以至英国伦敦、加拿大等地挂牌上市,并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联组怡东财务公司,这是促使“长实”企业走向国际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起步。1978年3月23日,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迁入港岛中环皇后大道中29号华人行,后又收购英资青洲英坭有限公司,其事业逐步走向欣欣向荣,并莫下了强固的基础。

1978年这一年,李嘉诚先生刚好50岁。由于祖国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大计,李嘉诚先生在港感到万分欣慰和鼓舞。他念念不忘先辈的谆谆嘱咐,“发达不忘家国,必以报效桑梓”。“我是潮州人,但我更以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对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我亟愿略尽绵力!”

就在这一年的10月1日,他首次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观礼活动,还和观礼团员们一起在怀仁堂前摄影留念。伟大祖国的古都北京,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令他倍感作为一名华夏子孙的自豪,也更坚定了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情愫和理念。回港之后,他不负潮州父老、乡亲之寄望,慷慨拨出巨款,首次为家乡建设一批民房,创建、扩建医院,修复开元护国禅寺等等。此后又多次为家乡捐建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基金等等。斯年,在潮州市,在李嘉诚先生所捐建的新民房中,有人住的乡亲就曾在大门贴过“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李嘉诚”这样的门联,引为佳话。

为了祖国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在1979年10月2日,应北京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之邀,李嘉诚先生开始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负责引进外资工作,以加快祖国内地的建设与发展步伐。在香港,在世界各地,李嘉诚先生则继续积极加强与多家港资、中资、外资合作,大力拓展多元化国际化实业,为国争光。

李嘉诚先生对祖国内地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加速发展十分关切。这一年,他获悉潮汕有识人士倡建一所汕头大学,又苦于资金匮乏,遂把家乡兴学育才一事视为己任,多次找老朋友、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商谈关于由他独资捐建并创立汕头大学一事。他表示:“创建汕头大学,就由我先带个头吧!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跟着来的!”他筹划首期投资3千万港元,并迅速拨款到位。此举很快得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以至国家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得到汕头地、市委和政府及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于是一个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任筹委会主任,庄世平、林川、罗列等人参与的筹建班子旋即组成并开始了筹建前期的各项工作的运作。这在当年的潮汕大地上,成为改革开放的一股浩荡春风和一大热点话题。潮汕人民、港澳台胞、东南亚华侨,以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都为之振奋,为之欢欣雀跃。1981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叶剑英元帅为汕头大学题写了校名。初创的汕头大学在1983年秋季边基建边招收首届本科生。从此,刚诞生的汕头大学走上了生气勃勃的办学历程,受到了各方盛赞、关注。“前有陈嘉庚,现有李嘉诚”。

1980年,李嘉诚先生主动为汕头医学专科学校的发展捐赠了500万港元,作增购先进医疗器械之用。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先生以雄厚的实力和强劲态势,出任

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董事局主席,一举打破长期以来香港由四大老牌英资(怡和、太古、和记黄埔、会德丰财团)垄断香港经济的局面,成为香港第一个入主英资财团的华人总裁。是年3月,他被评为1980年度的香港“风云人物”。

1984年9月29日,李嘉诚先生应中国政府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仪式。

1985年5月15日,李嘉诚先生出任香港汇丰银行董事局非执行董事。6月18日李嘉诚先生出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嘉诚先生。邓小平同志盛赞李嘉诚先生多年来“为祖国作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贡献”,并就如何办好汕头大学的事做了专题研究。邓小平指出,“汕头大学要办就一定要办好”,“要办得更加开放一些”,“要办成国家重点大学”,“希望国家教委从全国重点大学派出一些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汕头大学办好!”这次亲切会见,使李嘉诚先生倍受鼓舞。是年,“长实”系财团名列香港十大财团首富。在一期《日本经济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评价李嘉诚先生的话:“李嘉诚是世界华人实业家之中最受注视的人物,以能够会见中国最高实力者邓小平而闻名。与英国、东南亚的首脑有广泛的联系渠道。他旗下的长江实业是香港最大的企业集团,且以积极展开国际战略而有名”。

1988年5月18日,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李嘉诚先生在全球98位亿万富豪中,名列第26位。

1990年6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莅临汕头视察工作,首站到达汕头大学听取工作汇报,并到学校图书馆和师生们见面,还饶有

兴趣地视察了汕头大学学术交流楼、大礼堂等等。江总书记还挥毫为汕大题写了“任重而道远”的条幅，勉励汕头大学的教职员们再上层楼，更上层楼。

在1991年，“长实”系财团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跨国大企业集团，拥有1200多亿港元资产。

到1992年初，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神州大地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开放大潮。是年3月11日，李嘉诚先生被中国国务院聘为香港事务顾问。根据当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形势和报效家国、促进祖国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长实”、“和黄”系财团，适时地调整了投资拓展的方针大计，开始实现投资经营策略的战略性转移。是年5月2日，李嘉诚先生在深圳成立了合资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显示“长实”、“和黄”系财团将大规模地投资祖国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计划对祖国内地总体投资达该财团总资产的25%。这一重大决策和举措，倍受世界财经界的密切关注。从此，“长实”、“和黄”系财团在祖国内地的大规模投资拓展以雄劲的态势，大规模地、实实在在地启动了。

1993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李嘉诚先生颁发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的任命书。李嘉诚先生出席了预委会的第一次会议。

是年10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嘉诚先生，盛赞李嘉诚先生“有胆量，有见识”，“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并再次向李嘉诚先生“对国内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一年，李嘉诚先生对“中国残疾人基金”的捐资已达1亿港元。

1994年，李嘉诚先生在港所管理的企业，包括“长实”、“和黄”、“港灯”及“长实”的全资附属公司的“青洲英坭”、“安达臣大亚

有限公司”等等，已发展成为在香港具有领导地位的地产和投资发展公司。“长实”系财团的资产，占全港上市公司的市场资产总值在10%以上。“和黄”集团则更注重事业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化，其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了能源、港口、电讯、零售、基建、金融等多种业务，投资范围遍及中国香港和内地、欧美以至世界各地，拥有巨大的实力和资产。

1995年9月25日，以李嘉诚先生等为信托人的香港实业家们，发起组织成立了“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旨在策划和宣传、推广“东方之珠”的成就及形象，以增强海内外人士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是年12月28日，李嘉诚先生随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有关领导和广东省委、省府领导，参加汕头经济特区“12.28”多项现代化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的落成的隆重庆典。其中包括深汕高速公路东段、汕头海湾大桥、汕头深水港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等等。是年，“长实”系财团及其附属公司在香港的市值已超过2700亿港元。

此外，对深圳的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和深水港的建设，对珠海等地，也都投放巨资力促其加快发展。

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长实”、“和黄”系财团在大规模投资祖国内地上，气势如虹，迭有新绩。其事迹在神州大地遍为民众所知晓，声誉日高。此前，他已先后在首都北京投放巨资参与“东方广场”、城南、城东居民新区的建设；收购长城饭店等7家星级酒店51%的股权并将这批酒店改造成为四至五星级酒店；在北京大学捐建现代化的大型图书馆等等。此外，“长实”、“和黄”系财团在祖国内地大规模的投资还包括了港口运输、电力、公路、飞机维修、建材、证券投资、化妆品等等。投资范围业已遍及上海、武汉、福州、厦门、广东、广西、海南、四川、深圳、珠海、汕头及潮州等地。这是李嘉诚先生热爱祖国，报效桑梓的体现。

从上述所列举的有关李嘉诚先生大举投资祖国内地的实绩来看,李嘉诚先生的“爱国爱乡”和“卓识远见”,确实令人感佩。无愧于“华夏骄子”和“真正的爱国者”的称谓。李嘉诚先生曾经动情地说过:“今天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令人鼓舞!”“我从来是慳己不慳人!”“我的财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我的金钱犹如金字塔,越聚越高,只要从中挖出一小块就够我享用一辈子了。”“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去帮助那些有大志而力所不及的穷人子女,让他们能够上学;去帮助那些被病魔缠身的人!”他严于律己,颇有“平民意识”。到基建工地,和工人一起吃盒饭,他捱得。到汕大学生食堂,去探望学生的伙食,和学生一起吃盒饭、吃粽子粿条,他捱得。每次,校董会后进餐,他不愿“豪宴”而强调最多“四菜一汤”,不要浪费。有一次他胃痛,吃药要送点饼干,白开水,肇庆产的“菜汁饼干”他也捱得。1995年有一次他在京出席人民大会堂会议,走到台阶中间时,突然发现脚上的皮鞋有一条饰带断了。他借来小刀,索性将断了的饰带割掉了,那双鞋仍然照样穿着。李嘉诚先生笑说道:“我穿的鞋多数穿到换底。”他还强调:“潮州人会刻苦,并非孤寒。我绝对是不会孤寒的!尤其是在对公司、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在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业上,我绝对是不会吝啬金钱的!”

近期,“长实”、“黄埔”系财团的旗下机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已积极参与香港九号货柜码头的建设。该工程预计未来5年的投资逾100亿港元。预计今冬或明春开工。

广东省决定将兴建伶仃洋大桥、兴建珠三角环形高速公路,建

设经营梅(州)汕(头)高速公路等等,李嘉诚先生的香港东南亚(中国)基建有限公司也与有关方面达成投资意向。

在香港政府为打击金融炒家而宣布的“九大救市措施”下达后,“长实”系和“恒基”系均率先响应。“长实”系宣布将50亿港元的海外资金当即调回香港的银行体系,表示对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李嘉诚先生对祖国内地的赈灾行动也都有突出的表现和贡献。如1991年7月的“华东赈灾”,1993年“8.5”深圳清水河仓库大爆炸事故的赈灾救助,1994年对广东严重水灾地区的救助,1996年2月对云南省丽江地区发生七级地震灾区的救助等等,都充分表现了李嘉诚先生及“长实”、“和黄”系财团属下公司同仁们“扶危济困”的崇高品德和拳拳报国心。近期,在“长江抗洪赈灾”行动中,李嘉诚先生及其旗下公司又率先捐出了5千万港元巨款,为国人所深深敬仰。此外,他对社会福利及公益事业,尤其是残疾人事业,都有捐赠资助而不愿公开披露。这也是他为人处事一贯坚持“低调”风格的体现。

1996年1月26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北京成立,李嘉诚先生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

1997年7月1日,李嘉诚先生先后在香港及北京出席了庆香港胜利回归祖国的隆重庆典。“长实”旗下的香港海逸大酒店,隆重盛情地接待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一行。

1998年2月,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长董建华先生邀请,李嘉诚先生加入了“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成为香港特区政府首脑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今年,李嘉诚先生已年届七旬。多年以来,在李嘉诚先生的精

心培育下,李泽钜(“长实”董事局副局长、总经理)、李泽楷(“和黄”董事局副局长、总经理)兄弟久经磨炼,已显露头角,有乃父之风,业绩甚丰,颇得赞誉,业已证实后继有人。于是,在今年3月5日,李嘉诚先生在港向媒界宣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李嘉诚先生曾多次真诚而动情地谈到,“在我退休之后,一是打算能到祖国内地走一走,几十年来忙于生意,没有空到内地走一走,是很遗憾的事!二是期望能继续为国家多做贡献。继续为办好汕头大学,为科教兴国尽力!”“汕大是我的家,退休后会经常到汕大走一走的!”在好几年前的一天,他曾深情地指着汕大的办公大楼前那一株躯干伟岸、枝繁叶茂的古老的“刺桐树”,对汕大的工作人员说:“这棵树要好好保护!这可是历史的见证啊!”

多年以来,李嘉诚先生对伟大祖国所作出的一系列的无私奉献,令人见识到李嘉诚先生这位“华夏骄子”,对振兴中华、报效家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情结”,也可谓之“华夏情结”。1990年2月8日汕大落成庆典,他就带领着儿子和至爱的亲朋到汕头大学和老市区“小公园”来见识见识,并谆谆告诫孩子“发达不忘家国,必以报效母恩!”就在合家聚会时,他也常叮嘱孩子“在办实业抓经济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对祖国内地的科教发展、振兴教育的关心与帮助!”

在1995年5月间,李嘉诚先生已将其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权资金,转建“李嘉诚联合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达1100亿港元,为他此后发展祖国的科教医疗卫生及社会公益事业之用。李嘉诚先生多次深情地谈到:“一辈子为中国人民多做好事,这便是我的心愿,今生无悔!”

据不完全统计,自伟大祖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长实”、“和黄”系财团,对内地各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

资,已超过600亿港元。他本人对科教卫生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也已超过22亿港元。

1997年7月,美国出版的《福布斯》财经杂志公布,李嘉诚先生被排名为当今全球第十五位超级富商,并被评为“全球十大最具创意和成功商人之一”。1998年6月,《福布斯》杂志在公布本年度“全球富豪榜”的前100位中,李嘉诚先生排名跃居第十三位。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长实”、“和黄”系财团,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尽管曾出现经济发展普遍低迷的情况,但仍保持雄厚的实力和强劲态势,在香港以至世界,都享有巨大声誉及“旗舰”的领导位置。

据最新一期著名财经杂志《环球金融》(1998年10月)透露,本年度所选出的在“全球600位财经界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中,香港上榜的就有21人,人数仅次于英国和美国。香港商界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仍名列香港财经界榜首。又在最新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1998.11.9)中,该杂志所公布的《九八年国际华商五百名》排行榜中,李嘉诚先生旗下的“和黄”集团继续蝉联榜首,“长实”则位居第三。李嘉诚先生缘何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强劲态势而又屡战屡胜呢?有关权威方面指出,在当今全球的多种发展因素中,“中国因素成为国际华商发展的重要基石”。“由于中国内地具有庞大市场及适价的劳动力,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国民经济增长8%的目标不变:使中国成为国际华商发展的后盾”。“和黄”集团注重拓展多元化国际化业务,其经营范围囊括了能源、港口、电讯、零售、基建、金融等多种业务,其投资遍及中国香港和内地以至欧美等地。因此,前所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其影响甚微,至今仍拥有巨大的实力和强劲态势。

综观李嘉诚先生自伟大祖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大计以来,

在这 20 年的社会、人生和事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他所坚持的“立足香港,扎根香港;背靠祖国,紧靠祖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企业发展方针的正确性。多年以来,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下,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对伟大祖国亲情似海,故能在“风云变幻”的香港和国际社会中,始终心怀祖国,矢志不移地为报效家国而坚持不懈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而无私的奉献,堪为世之楷模,华夏骄子。

“黄宫”“杏林” 世代延续

自 1981 年 8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以来,年轻的汕头大学在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悉心关怀下,在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广东省委、省府及潮汕地区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持下,业已走过了一段令人振奋的创业路,令人羡慕,也令人刮目相待。正如汕头市委书记庄礼祥新近所称:“汕头大学办在汕头,这是汕头人民之福!”

汕头大学至今已拥有 18 年的创业史,有 16 年的招生办学史。在 1987 年夏即有首届本科生毕业,于今已有 12 届近 1.2 万余名本科生、专科生毕业,走上社会,为潮汕地区、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省以至各有关生源省、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些还受聘到香港及内地,在“长实”、“和黄”属下的有关企业工作,表现甚佳,受到好评。

汕头大学在 1984 年元旦举行隆重奠基庆典。1990 年 2 月 8 日宣告校舍建设落成并举行隆重的落成庆典仪式。1985 年,汕头大学开始招收部分港澳台学生和海外留学生。1991 年被广东省列入第一

批录取新生院校。1993 年汕头大学被列为硕士生授予权院校,部分专业开始同有关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1996 年底,汕头大学通过国家“211 工程”部门的预审(即国家教委确定,面向 21 世纪,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 100 所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出人才、上水平、促改革、增效益,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1997 年冬,又顺利地通过国家教委“211 工程”专家组关于“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暨立项审核。到 1998 年 6 月 15 日,据有关方面公布,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批准,汕头大学已被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其属下汕头医学院的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据称,“汕头大学从 1983 年秋首届招收本科生始,到 1990 年从病理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生以来,能切实注重培养质量,严把学位授予关,达到国家对重点大学研究生教育评估的要求。到现在已拥有 16 个硕士点和 1 个博士点,并被列入国家‘211 工程’行列”。

回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诞生的汕头大学以及汕头大学所走过的创业道路,我们倍感李嘉诚先生的赤子情怀和报国情结,是多么令人师法和万倍钦敬。

自 1979 年他和庄世平先生多次商议关于由他独资捐建汕头大学开始,在得到党和国家、省委省府的明确和大力支持下,就已经扎扎实实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而且一往无前,永不言悔。

1980 年 12 月 18 日,他就和吴南生、庄世平、蚁美厚、林川等一起莅汕,筹谋选择汕头大学校址的工作。当年,他显得很年青,神采奕奕,精力健旺,住在当年汕头地委交际处一号楼,穿着一套很得体的中山装,还在楼前和有关人士合影,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和蔼可亲,没有什么“风云人物”的架势。在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

后,汕头大学首批创业者队伍约40多人,在1981年12月中旬开始进驻建校基地。当年,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是汕大筹委会主任,具体负责创建汕大工作的是广东省高教局长林川(后为汕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汕大筹委会委员、筹委办公室主任罗列(后为汕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副主任方八鹏同志。1983年10月正式启动了规模巨大的首期建设工程。此后,新建的汕头大学在李嘉诚先生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她的办学历程。于今,汕头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多科性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设有文、理、工、医、法、商、艺术、成人教育等8个学院和一所科学院,拥有18个本科专业,16个硕士点,1个博士点。还有3个博士点(数学学科、计算机学科、结构工程学科)在申报审核之中。其学校图书馆、校园计算机网络、科研设备、科研实验室、体育场地、学生生活活动场地、校园绿化、校舍建筑设计等等,均先后跻身于全国高校的先进行列。它是汕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的绿化单位之一,广东省的“文明校园”,被誉为“高校建筑之花”。它拥有一支可观的优质的教师队伍,学校聘有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8名,还礼聘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26名世界著名科学家为学校的名誉、客座或兼职教授。全校拥有一支700多人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正、副教授近500名。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近80名,还有34名教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教师队伍勃勃生机。

其所属的汕头大学医学院不断创出新绩,令人瞩目。该院新近又拥有了当今世界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大型精密仪器,新一代的研究工具——尖端科研仪器ultima——312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将促使教学与科研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此前,该院微生物与免疫教研室的李康生博士,曾与法国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院的Pierre·J·Neveu博士共同申请的1997“中法先进研究计划合作项目”,经中

国国家科委和法国政府批准,已成为中法先进研究计划合作项目生物技术类的四个项目之一。这是汕头大学医学院在加强中法两国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的新一例。

据公布,汕大本部在1998年的科研执行计划(连同1998年在研和应结题的项目)共有117项,其中有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部级项目13项,其中“九五”攻关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科研发展态势良好。最近,在第十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上,由揭阳市大南山管理区茶厂与汕头大学合作,研制开发出的袋装速溶乌龙苦丁茶,被认为是填补了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空白,获得该博览会金奖,并被列入广东省1998至1999年星火计划开发项目。

汕大医学院附属一院,在去年以来,又先后在施行胆结石新疗法、首例半相合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粤东首例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血管搭桥术、粤东首例射频消融术等项获得成功,促进医疗服务实绩更上层楼,颇受赞誉。现今,汕大医学院附属一院,已入选“全国百佳医院”,“三级甲等医院”,被国家卫生部授予全国“救灾防病先进集体”称号,还被评为“广东省职业道德建设百优单位”。该院内七心血管内科则被列入“全国青年文明号”,实现了李嘉诚先生办学兴医、造福桑梓的愿望,令人欣慰。附属二院新院也由李嘉诚先生投放巨资新建,位于汕头市第三住宅区的广厦新城,占地81亩,首期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病床500张,由住院、门急诊、医技、三生、后勤辅助楼等等组成。院内环境优美,绿化率达35%,是粤东地区占地面积最大、停车位最多的花园式医院。该院在今年8月18日乔迁开诊。这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教学及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该院同仁表示,他们将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利用李嘉诚先生为医

院提供的良好医疗环境和先进仪器设备优势,进一步开展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汕大医学院属下的精神卫生中心和肿瘤医院,也不断革新,屡创佳绩。其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质服务,也颇受社会及人民群众的赞誉。

今年5月14日至15日,英国驻穗总领事魏意安莅汕考察,在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汕头大学之后,热情地表示:“希望英国的大学能与汕头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今年5月间,李嘉诚先生莅校参加校董会议。他又一次倡议并提出每年捐资100万元,支持医学院开展医疗扶贫工作。汕大系统的医院迅速地创建了一支扶贫医疗队伍。近半年多来,他们以使真正贫困和有医疗需要的人受益为宗旨,走街串巷,家访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扶贫医疗队还经常深入潮阳、澄海、南澳、潮州、揭阳、梅州及汕尾等贫困地区开展医疗服务,还多次到饶平、揭西、老区红场等地义诊,免费为贫困病人赠医送药,并开展健康普查和咨询,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至今已医治了病人6552例。

今年11月19日李嘉诚先生又一次莅校参加校董工作会议。20日上午,李嘉诚先生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一起,为汕大医学院附属二院新院揭幕。继之,李嘉诚先生和殷大奎副部长,广东省常委、副省长卢钟鹤及汕头市长周日方等,又来到汕头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创办的由李嘉诚先生捐资4千万元兴建的国际眼科中心工地,为该中心的奠基培土。该工程项目是李嘉诚先生关心民众,报效家国的又一动人壮举。

在李嘉诚先生的倡导和资助下,汕大医学院附属一院新建的“宁养院”,也于今年11月19日建成开放。这是粤东地区首家给晚期病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场所,它为晚期病人及其家属提供身体、意志及精神上的全面护理及治疗,以提高病人在临终阶段

的生活质量,维护其尊严和安宁。据称,此类机构目前只在北京、天津等少数大城市设立。

近日,汕大医学院在李嘉诚先生的爱国精神和深切关怀残疾人的种种义举的鼓舞下,院领导又发起了“角膜捐献光明行动”。院长徐小虎教授带头第一个报名。据称,全院师生员工和离退休的老同志,已有1379人踊跃报名参加了这一行动。

1998年5月14日,李嘉诚先生莅汕出席汕头大学第四届校董会第二次会议后,是夜在汕头国际大酒店举行晚宴,宴请省、市领导和汕大的师生员工代表。他恳切地谈到:“这十多年来,本人除在香港为汕大工作外,每年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放下繁忙的公务,到汕头大学和领导及老师们举行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大学发展的意见,商议及解决面对的问题及困难,认真地为大学的前景作出探讨。目前,我们拥有良好的领导层,优秀的师资队伍,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走的并不是一条无阻障的坦途。但我们必须谨记,是我们本身真正的实力,争取回来的成就,才是实至名归的。汕大朝着的方向,正是国家‘科教兴国’的跨世纪理想,通过教育促进科技发展,来实现国家、地区文化的长期稳定提升。”“汕头大学在我内心一直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多年以来,我是乐于付出时间、心血和金钱的。希望我这一份心情能得到潮汕地区内每一个人的理解,要汕大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潮汕地区培育代代的人才,每一个潮汕人都是具有支持和关心汕大的责任。”李嘉诚先生衷情地强调:“汕大要向前突破,大家必须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强化汕大同仁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汕大不单要重视培训专才,更重要的是同学们毕业后进入社会,应是一群品德高尚、注重道义、超越功利、愿意回馈社会、参与国家建设的精英人才。在世上要成就每一样真正有价值而值得骄傲的事,都必须有正确的人生

观,付出时间、努力、坚毅的意志和奋斗精神。今天,让我们一起共勉,把汕大建设成为一所有‘特色’有‘个性’的重点大学,贡献国家。”

当前,汕头大学在校长张湘伟、党委书记黄赞发的带领下,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和李嘉诚先生坦诚而殷切的期望,加快改革与发展,尤其在加大人才培养、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机构、完善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力度,充分发挥优势,为把汕大办成一所“实至名归”的、有“个性”有“特色”的大学而奋斗。

至今,李嘉诚先生对汕头大学的投资已超过12亿港元。另外,“汕头第一城”的建设本金、盈利及利息计20亿元,李嘉诚先生也作为个人捐赠无私地赠送给汕头大学,作为在21世纪继续发展科教医疗卫生事业之用。

今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同时也是李嘉诚先生为北大所捐建的现代化大型图书馆落成庆典。作为北京大学荣誉博士的李嘉诚先生,应邀参加了这个百年一遇的盛大庆典,再一次会晤了江泽民总书记。心系“振兴教育、科技兴国”的李嘉诚先生,趁在京逗留时间,又热情地访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协和医科大学等学校,还深入到教职员工的宿舍去探询他们的生活情况。当他看到了这几年高校的教职员工“紧促”的居住情况后,“心软了!”他动情地慨叹说:“这几所大学都是全国、乃至世界很有名气的大学,他们搞的是一流的教学、科研,出的是国家一流的成果!可是教师们居住条件都还很困难!尤其是走廊里还摆放着那么多的炉灶和坛坛罐罐。”李嘉诚先生登时生发出一个“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的念头。李嘉诚先生从来是一个以诚待人的长者,重信义,重承诺,言出行遂的人,但“解困”方案目前尚在“保密”之中。由于他一贯做好事都是“低调”处置的,相信不日将会有动人的景观出现。

此外,李嘉诚先生近年来还在他的家乡潮州市继续捐资兴建了一批小学。第一批巨款在1994年6月捐出,在家乡贫困山区兴建50所小学,亲自命名为“基础小学”,并要求建设质量要好,建筑设计要有特色。这批基础小学已在1997年底建成,分布在潮州市辖下的潮安县、饶平县和湘桥区,共建成教室378间和一批宽敞的运动场地,可容纳1.2万名学生入学。已经开课的教学班有308个,就读人数9404人。由于这一批“基础小学”拥有较好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有效地改变了潮州市贫困边远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

今年3月间,李嘉诚先生在全面了解潮州市山区基础教育情况后,再次捐资建设20所山区基础小学。

还有少为人知的广州宝洁公司,也是李嘉诚先生旗下的企业。该公司成立已有10周年的历史。据1997年1月统计,广州宝洁公司税利已经连续3年居全国轻工行业的第一位。该公司本着“让我们生活、工作所处的社会一起发展、一起繁荣”的宗旨,积极回报社会。该公司自建立以来,已先后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资累计达4000万元。自1995年以来,该公司就给陕西省革命老区山阳县捐款,使当地215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1996年5、6月间,该公司与国家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开展了“我愿为孩子点燃心中的希望”为主题的销售募捐活动;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权,公司开展了“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捐资活动,分别在广东省的连南县、阳山县和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山东、陕西、四川、广西等地捐建了13座宝洁希望小学。1997年,在全国又再捐建25所希望小学。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广州宝洁公司共同举办的“宝洁送光明”,为贫困地区眼疾患者免费治疗的行动,自1994年开展以来,也情暖人心,深得赞誉。

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由国家教育部和李嘉诚先生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筹资设立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在1998年8月全面启动。该计划包括建立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设立“长江学者成就奖”。教育部将在3至5年内,在全国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的学科中,设置300至500个特聘教授岗位。受聘人员在聘期内享受每年人民币10万元的特聘教授岗位津贴,同时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对在任职期间取得重大成就、作出重大贡献的特聘教授将给予重奖。由李嘉诚先生出资1000万元设立的“长江学者成就奖”,每年奖励一次。据悉,该计划的首次申报、推荐工作定于今年下半年进行。首批特聘教授将于1999年初正式上岗。

这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大好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工程、信息工程、遗传工程、海洋工程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为重要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需要一批富有献身精神、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家、专家。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继“管理科学”、“科技革命”、“体制改革”之后支撑经济发展的崭新因素、首要因素。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中,教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社会呼唤科学家、专家的大量涌现,呼唤全社会都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加宽松、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人才保证。

我们欣喜地见到,李嘉诚关于“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地付诸实施。正如他一贯所谦逊说到的:“一辈子为中国人民多做好事,这便是我的心愿,今生无悔!”

如前所述,1993年10月6日,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李嘉

诚先生时,曾盛赞他“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真正的爱国者”。对此,李嘉诚先生曾衷情地说:“江总书记这句话,我认为是我毕生以来的最大荣誉。我一生最大的荣誉,就是他的这句话!”“我认为,我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一方面我非常辛勤地工作,忠诚地待人;另一方面,就我个人来讲,在衣食住行等等却都非常简单、俭朴。这样,我可以有多余的钱,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做对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有所贡献的事。”“一辈子为中国人民多做好事,这便是我终生的夙愿。”

缅怀邓公 永生难忘

李嘉诚先生对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邓小平同志万分敬重。由于他有多次机会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更在关于办好汕头大学一事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鼎力支持,这些对李嘉诚先生来说,都永生难忘。

当李嘉诚先生读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获悉“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后,万分悲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李嘉诚先生沉痛地说:“听到邓公逝世的消息时,我非常难过。”“邓公对于12亿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位难得的伟人。”李嘉诚先生极佩服邓小平同志,他对记者说:“邓公对很多事有创见、有远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对国家对民族非常好的一位伟人。他倡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内地12亿人民从中受益,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

而且香港也受益良多。”“邓公的功劳将彪炳于中国史册。”李嘉诚说：“邓公对中华民族的另一贡献，就是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了香港问题。香港在过渡期得以保持繁荣稳定，港人充满信心，这都要归功于邓公的智慧和远见。很可惜，邓公不能亲自见证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了。”

李嘉诚先生强调说：“邓公去世后，并没有引起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波动，从这一点上更可看出邓公的卓识和远见。这几年来，中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 10% 以上的速度发展，国民生活和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一天天提高。可以预见，到 21 世纪，我国将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强国。这充分显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能力。”李嘉诚先生表示：“不论是过去十多年，还是将来，我个人以及我的家人、我的公司，对香港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因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我留在香港，或是为内地的教育、医疗事业尽一份力就是对邓公最好的悼念。”

(1998.12.13)

丹心系桑梓 青史留芳名

——记林百欣先生暨夫人林余宝珠女士

袁伟强

香港著名实业家林百欣先生和夫人林余宝珠女士，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情倾祖国和桑梓，热心捐办公益事业及投资创办实业，为造福家乡人民，振兴国家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人们的敬仰和赞誉。

林百欣先生的祖籍是潮阳市，林余宝珠女士的祖籍是中山市。林百欣先生 1914 年出生于汕头市，30 年代小学还没有毕业，就在汕头第一家银行任小职员。1937 年前往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他躲身于澳门。1946 年日军投降后，他返回香港经商。1947 年创办丽新制衣有限公司，以成衣制造和出口为主要业务。他勤奋经营，守信用，赢得了顾客和银行的信任，生意日益兴隆。五、六十年代，他把业务拓展到台湾、非洲、欧洲、美国及加拿大市场，使丽新制衣有限公司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制衣集团之一。

70 年代，林百欣先生抓住机遇，投资地产，发展房地产业务，大量收购物业地盘，至 1987 年，“丽新”拥有地盘 30 多处，楼面面积

36万多平方米,1988年增至45.5万平方米。

1987年,林百欣先生斥资13亿港元,收购当年发展势头正盛的鳄鱼恤有限公司,成为香港经济界一大新闻。林百欣先生成功收购鳄鱼恤有限公司之后,又追加近10亿港元投资,扩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聘请欧美及亚洲各国一批一流的服装设计师,引入欧洲时尚,使服装产品趋向多元化。1989年,“鳄鱼恤”与日本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拓展日本市场,并相继投资5000万元,在中山市设厂,生产各类产品。不久又率先引入特许经营方式,在内地广泛销售,仅几年时间,“鳄鱼恤”就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其特许专卖店已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南京、成都、深圳、汕头等大中小城市。至1994年,“鳄鱼恤”产品已有6大类,款式品种达2000多个,除在香港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及欧美各国,当年产品销售超过9亿港元。

1987年至1988年,林百欣先生先后购入香港亚洲电视一半以上的股份,还将地产业务分开独立,改造成“丽新制衣国际”和“丽新发展”两家上市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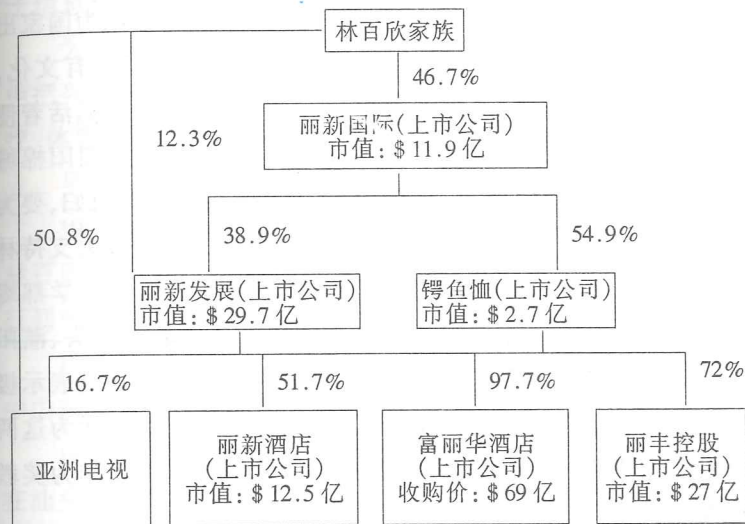
1989年,林百欣先生收购加拿大卑诗省山村度假胜地的最大酒家。

由于几十年的勤奋创业和卓有成效的经营,丽新制衣有限公司发展成为从事制衣、地产、传媒、餐饮、娱乐等多个行业的集团,成为拥有百亿资财的商业王国。林百欣先生本人成为一位家财万贯、富甲香江的著名实业家。据有关资料记载,1991年,林百欣家族在丽新集团各上市公司中的份额达54.6亿港元,在香港亿万富豪中排名第17位。又据《FORRES资本家》杂志报道,1995年上榜的世界华人富豪中有60位是潮籍人士,林百欣先生排名第25位,财产10亿美元。今年4月8日,香港《明报》报告,林百欣家族除

亚洲电视外,仅丽新国际、丽新发展、鳄鱼恤、丽新酒店、富丽华酒店和丽丰控股等6家公司的上市市值所占份额就达92.5亿港元。

(参见表①)

表① 林百欣的商业王国



(资料来源:1998年4月8日香港《明报》)

二

林百欣先生和夫人林余宝珠女士旅港半个多世纪,艰苦创业,功成名就,对家乡情深义重,慷慨捐资,兴办各种公益事业,一桩桩重大的义举,表现了他们对家乡一片赤诚之心和致力奉献社会的崇高精神。他们胸怀阔达,远见卓识,视兴学育才为己任。他们的名字与汕头市的教育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1987至1988年,林百欣先生相继在汕头市和潮阳市捐建两所林百欣中学。在汕头林百欣中学奠基典礼上,林百欣先生说:“现今世界,国家要繁荣,

一定要重视科学文化教育。汕头要兴旺,也要高度重视科学文化教育,注重专业人才。我和太太愿为家乡的兴学育才尽点绵力,为家乡培养精英,为国家培养人才。”

林余宝珠女士也说:“我和林先生都是上了年纪的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我俩还健在,能为家乡文化建设做点实事,为国家出点力,为家乡子孙后代做点好事,使他们更聪明,有智慧、有文化,建设好家乡,使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过幸福日子,我们活着便感到快乐和安慰了。”1988年5月,她偕林百欣先生回到潮阳棉城老家,受到当地领导人赞扬时殷切地说:“我是潮阳人的媳妇,要为振兴潮阳办点事情。媳妇为家乡办事情是应该的。”她极力支持林百欣先生的事业,对兴建汕头林百欣中学和潮阳林百欣中学都竭尽全力。她和林百欣先生在百忙中几次专程从香港到汕头、潮阳视察这两所学校的工程进度情况,对建校工程的质量、进度表示极大的关切。当这两所学校建成开学之后,她又捐资70万元为这两所学校每个学生定制夏、冬各一套校服,又捐资150万元作为奖教奖学基金。

汕头林百欣中学占地36132平方米,建筑面积28518平方米。潮阳林百欣中学占地3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0多平方米。这两所学校不仅规模宏大,场地宽广,而且设备先进,设施齐全,无论在汕头市或是在潮阳市都是属于一流的学校,每所学校可容纳二三千名学生就读。

1993年,汕头市提出“科教兴市”的决策,大力推行“教育曙光”计划,林百欣先生获悉时说:“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是事关汕头发展的大事。”表示要给予支持。1994年1月,他欣然捐赠1000万港元给汕头教育基金会,这是该会迄今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与些同时,他还捐资3880万元创办汕头市林百欣科技中专学

校。该校于当年3月奠基,1997年底竣工,总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开设了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经济信息管理以及办公自动化等专业,就读学生达700余人,成为汕头市培养现代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中等专业人才的重点学校。

为了对社会做出更多的奉献,林百欣先生和林余宝珠女士不但把兴学育才视为己任,一次又一次地捐办教育事业,而且在医疗、体育、救灾恤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捐办了多项公益事业。早在1986年,他们就捐资兴建中山市隆都医院。

1988年,潮籍海内外乡亲发起在汕头市区捐建潮汕体育馆,林百欣先生和林余宝珠女士积极响应,捐赠210万港元,在捐建者行列中名列榜首。

1989年,林百欣先生和林余宝珠女士又捐资210万元港币给中山市沙溪镇社会福利基金会。

1990年,以策励、扶掖潮汕青少年成长的潮汕星河奖基金会在汕头市成立,林百欣先生和林余宝珠女士踊跃捐资。至1995年,先后共捐赠310万元人民币。

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林百欣先生捐赠500万港元给灾区人民。

1993年,林余宝珠女士捐赠480万元人民币,兴建潮阳市林余宝珠小学。

1995年,第八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汕头举行。林百欣先生大力支持汕头市政府承办这次年会,他与汕头市政府合作,兴建了汕头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该会展中心占地18519平方米,建筑面积27468平方米。1995年2月13日动工。林百欣先生偕夫人林余宝珠女士专程从香港前来参加奠基仪式。林老先生在致词中说:“把家乡建设

成为现代化城市是我的心愿。我愿捐资 4000 万元,建会展中心主体楼。”1997 年 11 月,该会展中心落成启用,做为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主会场。林百欣先生总共捐赠人民币 9000 万元,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汕头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设计独特,造型美观。由北座、中座、南座三大部分组成。集会议、展览、文化活动、经济交流、娱乐、服务为一体,是汕头市当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经济、文化活动现场,是汕头市朝着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在1986年至1997年期间,林百欣先生及夫人林余宝珠女士连续不断在中山市和汕头市等地捐办各种公益事业总金额达人民币1亿6千多万元、港币2千多万元。(参见表②)

表②

林百欣先生及夫人林余宝珠女士在内地捐办公益事业简表

时间	项目	金额	备注
1987 年	汕头市林百欣中学	1200 万	人民币
1988 年	汕头市潮汕体育馆	210 万	港币
1988 年	潮阳市林百欣中学	1000 万	人民币
1988 年	澄海市西门华侨学校	20 万	港币
1989 年	中山市沙溪镇社会福利基金	210 万	港币
1991 年	汕头市林百欣中学奖教奖学基金	100 万	人民币
1991 年	潮阳市林百欣中学奖教奖学基金	50 万	人民币
1991 年	捐助华东地区水灾	500 万	港币
1991 年	潮汕星河奖基金会	310 万	人民币
1991 年	汕头市儿童福利会	80 万	港币
1993 年	潮阳市林余宝珠小学	480 万	人民币
1994 年	汕头市教育基金会	1000 万	港币
1994 年	汕头市林百欣科技中专	3880 万	人民币
1995 年	汕头市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	9000 万	人民币

这在近 20 年来众多潮籍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回乡捐办公益

事业的行列中是名列前茅的,除了香港著名人士李嘉诚先生捐赠最多外,林百欣先生夫妇名列第二位。

三

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热情,他们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为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林百欣先生也不例外,他认为身为炎黄子孙,应义不容辞地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身为中国人,回来投资是尽我的一点心意,赚不赚钱并不看重,只要对内地发展有好处,我自己又能够做到的,就要尽力而为。”继 1988 年在中山市投资生产“鳄鱼恤”名牌服装之后,林百欣先生于 1991 年出资 287 万美元,通过台湾一家注册公司与上海第十印染厂合资创办民丰纺织印染公司。这项投资,是台湾政府“经济部”当年核准的第三家大陆投资计划,也是当年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

1993 年,林百欣先生又把在台湾的大来纱厂(生产线 3 万锭)迁到江苏省昆山市,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了丽达纺织厂。双方各出资 1000 万美元,当地政府提供土地、厂房,林百欣先生一方负责购置机器及管理工作。

从 1994 年起,林百欣先生加快向大陆投资的步伐,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的国内房地产项目达 10 多项,多数分布在上海、广州和厦门等地。其中上海有 4 个项目,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旧城区改造项目,是与上海长宁集团合作投资的,总金额共 8.8 亿人民币。该项目占地 3.6 公顷,可建 16 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在上海衡山路 41 号兴建两幢高层住宅和会所,总投资额 9000 万美元,林百欣先生占 60% 的股权。此外,还投资上海闸北区“闸北广场”及苏家港旧城区改建项目。

在广州,林百欣先生也投资几个项目,其中有天河区中山大道的天河娱乐广场,广东省侨联大厦和广州中山医学院二院教学楼重建等项目。

1994年林百欣先生在厦门市黄金地带买下9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兴建香港广场,集商场、住宅、写字楼于一体。

据香港《企业档案》杂志1997年11月报道,“中国业务方面,现时丽丰在国内拥有14个房地产项目,估计总资产为60亿港元。”

由于他对上述这些城市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被汕头、广州、昆山、厦门、潮阳等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

四

林百欣先生一生辛勤奋斗,诚恳处事。他说:“赚钱要有良心,不害人,不骗人,做生意要稳打稳扎。”还说:“我并非只靠良好机遇,更主要是靠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如今,他虽然年逾古稀,仍然奋斗不息,继续担任丽新国际、丽新发展、鳄鱼恤、丽新酒店、富丽华酒店、丽新控股等6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和亚洲电视公司永久主席的职务。他德高望重,爱港爱国,深受人们的爱戴,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遗憾的是,他去年12月16日在台湾办完公务准备返港时,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台北大学土地舞弊案为由,限制离境,并且把他进行拘押,虽然以1000万元新台币作为保证金而获得保释,但台湾当局仍以种种理由限制他出境,所以他滞留台湾至今已整整一年时间。

原来林百欣先生早在1968年就到台湾投资,购买了台北县三

峡28500多平方米土地创办纱厂。1990年台湾当局审议通过扩大台北大学地盘的规划,大来纱厂全部划入台北大学范围。为了要服从台湾当局的决定,大来纱厂于1992年底关闭停产。1994年和1997年,台北县政府先后两次发布有关征收土地的公告,并公布具体补偿细则,规定每平方米土地补偿14000元新台币,这样,大来纱厂应得土地补偿款共4亿多元新台币,加上地面建筑物补偿新台币3亿余元,自动拆迁奖励新台币1亿元,总共实领合法补偿款共9亿8千万元新台币。

由于大来纱厂自1992年关闭停产至1997年办理补偿等事项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林百欣先生因而答应其手下主办人员的要求,将补偿款超过6亿元新台币之部分作为奖金,交由主办人员自行处理。所以,台湾当局抓住林百欣先生下属主办人员某些欠妥的做法,把矛头对准林百欣先生,以所谓“行贿罪”对他进行拘押、限制,甚至开庭审判。可是拿不出任何证据。为此,林百欣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知情人士透露,林百欣先生遭受如此厄运,其主要原因是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面对如此无辜受害,林百欣先生始终坚持抗争,他坚信总有还他清白之日。他还坚定地说:“做人最紧要要有信心,一次失败可能会给你有另外一次成功的机会。”

林百欣先生是一位实业家,更是一位爱国者。他与夫人林余宝珠女士对祖国对家乡的事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帮助,为祖国繁荣昌盛呕心沥血,他们在国内投资创业及所捐办的各项公益事业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惠及后代。他们的光辉业绩彪炳千秋,他们的名字将留芳百世。

汕头市全面落实市区城镇 侨房政策纪实

王炎荣

(一)

汕头市是著名侨乡,全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也是我国较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它自 1860 年开埠以后至本世纪 70 年代,一直是粤东、兴梅和闽南地区华侨出入国的主要口岸。从 1889 年开始,华侨便在这里经商办实业。近百年来,海外侨胞在汕头市购建了大批的房屋,一方面是因经商、置业所需,另一方面也作为一个“窝”,一旦海外情况变化,需要回国时可以居住。汕头解放后至“文革”期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很多华侨房屋被征收、没收、接管、代管或私改经租。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各项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逐步处理了一部分侨房归还华侨。但由于种种原因,处理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困难大,进度慢。据统计,汕头市区应处理落实的城镇侨房有 902061 平方米,数量列全省第二,仅次于广州市。至 1992 年底,处理归还侨房 290674 平方米,占应落实侨房的 32.2%,还有 611389 平方米侨房未处理落实,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此反映强烈,很多人不断写信给中央、省、市各级领导人,要求归还其在汕头的侨房。能否落实好侨房政策,关系

到侨心向背,也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特区的建设发展。

(二)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特区建设问题时曾说过:“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1993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汕头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汕头市委书记许德立在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把“侨乡优势”和“做好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工作”分别作为争取汕头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五大优势和八项工作任务之一,提出要“积极做好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工作,形成加快发展的内外合力。”“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按有关政策尽快落实归还被挤占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房屋。”同年 11 月 20 日至 30 日,周日方市长应泰国潮州会馆的邀请率汕头市友好访问团赴泰国访问期间,与泰国潮州会馆及潮汕十县同乡会负责人举行乡情座谈会,听取居住在泰国的潮汕乡亲对汕头建设发展的意见。与会的侨领在座谈中,反映了泰国侨胞强烈要求落实政策,处理归还在汕头市区城镇侨房的意见。再次引起汕头市领导人对落实侨房政策的重视。

1993 年下半年开始,汕头市侨务部门根据 1992 年 10 月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粤办发[1992]24 号”文件精神 and 市委、市政府领导关于“要用改革的思路加快侨房政策的落实”,“要有突破性进展,争取在二年内基本解决问题”的指示,抓紧做好落实侨

房政策工作,在做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制订加快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方案。市侨务办公室和落实侨房办公室先后向市政府呈报了《关于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工作情况及加快工作步伐的意见》、《关于两年内解决落实我市侨房产权和使用权问题的补充意见》、《关于全面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意见》和《关于兴建“华新住宅区”有关问题的请示》等4个请示报告。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于1994年6月以“汕府〔1994〕90号”文件发出《关于全面落实我市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通知》,对处理落实市区各类城镇侨房做了明确规定:对土改没收侨房,全部退还产权和使用权;对私改经租侨房(除解放前华侨股份公司和房地产置业公司的房产)和代管侨房,不论住宅还是非住宅,不论面积多少,一律退还产权和使用权;对土改农会拍卖侨房,现产权属国家和集体所有或者属私人所有的,都分别做出有关处理规定。依据这个文件,汕头市区的绝大部分城镇侨房都可得到处理落实。

为了解决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所需资金和房源,市政府决定从1993年至1997年,每年拨出专款1100万元,5年共5500万元用于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每年从市政府统建的“二、二、六”补贴住宅(即按国家标准造价由国家补贴20%,集体补贴20%,个人负责60%的补贴出售住宅)中划拨280套住宅指标,五年共1400套,用来安置侨房租住户;划拨700亩土地建设“华新城”住宅区,兴建大批住房作为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腾退用房。

为加强对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领导,市政府调整加强落实侨房政策领导小组,由周日方市长任组长,当时分管侨务和城建的郭斯锟、黄遵忠两位副市长为副组长,并从市侨办、国土房产局、侨联、中旅社和公、检、法等单位抽调一批熟悉业务、工作责任心强的骨干充实市落实侨房政策办公室力量。

1994年9月,市政府召开的全市侨务工作会议上,郭斯锟副市长做了工作报告,许德立书记、周日方市长也分别讲话,对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工作做了部署和指示。

(三)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汕头市侨办和落实侨房办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力度:

1、改变过去等待华侨前来申请才予调查落实的被动做法,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政策,主动通知侨胞前来申请落实。通过《汕头日报》、《汕头特区晚报》和汕头电视台,大力宣传汕头全面落实侨房政策,并组织市区侨房办和有关单位干部上街宣传,接受政策咨询。1995年6月上街宣传,一天便发出有关政策问答8000多份。同时,主动到海外向侨胞宣传政策。1994年10月,由郭斯锟副市长率领的团队到泰国访问,与泰国潮州会馆和潮汕十个县同乡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介绍汕头市全面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情况,接受侨胞咨询和申请。此外,汕头市侨办和落实侨务政策办于1995年3月向泰国、新加坡、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潮州会馆及国内潮州、揭阳、梅州等有关城市的侨务部门发出函件,请他们协助通知有侨房在汕头市区的华侨业主前来申请落实侨房。

2、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加快审批落实侨房速度。为加快落实侨房进度,市落实侨房政策办公室采取既慎重又简快的做法,加快审批退还侨房产权速度。对业主通过信函或上门前来申请的,都予以周到处理和热情接待。同时,对占最大数量的私改经租房,根据掌握的档案资料,采取整条街道成片调查处理的办法,不论业

主是否前来申请,只要是资料记载齐全、准确,都予以审批落实。其中业主尚未申请的,由市辖各区国土房产分局侨房管理站暂行代管。这样,加快了处理落实侨房产权的速度。1994年6月,国际知名数学家邱成桐教授前来汕头市侨办要求落实政策归还其母亲原在汕头市区房屋。市侨办的同志热情接待,并当即帮助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当他得知汕头市侨办在此前已将其房屋按政策给予落实时,十分高兴,一再表示感谢。

1997年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重点转入处理归还使用权以后,为加快进度,市侨房办在组织人力对历年撤还产权侨房全面摸查的基础上,把腾退侨房使用权任务分解落实到有关各区和市直机关单位包工包干,并由市落实侨房政策办组织检查督促,推动落实。同时,重视抓点带面,做好有退路而拒不退房户工作。市政府从公、检、法部门抽调人员充实侨房办力量,组成检查组,对有退路而拒不退还侨房使用权的租住户,由清退小组负责协调处理。1997年共有75户通过协调处理,归还侨房使用权5045平方米。

3、抓好华新城住宅区建设,为腾退侨房使用权提供充足的房源。华新城到1997年底完成了第一期施工建设。建成包括小学、幼儿园、市场在内的34幢住宅楼,安置落实市区城镇侨房腾退户600多户。1998年上半年开始第二期施工建设。

4、通过立法,维护华侨合法权益。根据汕头市区华侨房屋数量多,且经常有侵犯华侨业权的情况,为切实保护华侨合法业权,1996年3月全国人大授予汕头经济特区立法权以后,汕头市确定的首批立法计划中就包括保护华侨业权的立法,并由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牵头,市侨务外事办等有关单位派员参加,起草了《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并由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8月审议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

施行。该办法是全国有关保护华侨业权问题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它既维护了汕头经济特区范围内华侨业权的合法权益,又推动了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的开展。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汕头市区绝大部分城镇侨房已落实归还产权。1993年至1998年第一季度,共处理落实市区城镇侨房产权479257平方米,累计达739931平方米,占应退房的98.6%。同时,落实归还使用权177301平方米,历年累计达467975平方米,占应落实的62.4%。

(四)

汕头市全面落实市区城镇侨房政策,理顺了侨气,赢得了侨心。在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取得良好效果。

著名爱国华侨、工商业家胡文虎家族解放前曾在汕头创办永安堂制药厂和《星华日报》,解放后其在汕房产被没收。1993年以来汕头市以易地建房方式处理落实胡文虎家族在汕头的房产以后,香港星岛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仙女士1994年和1997年先后二次访问汕头,考察、策划胡文虎家族在汕地皮的建设和寻求投资合作项目。还以胡文虎基金会名义捐款30万元给澄海上华镇中学建教学楼。

1995年3月底,汕头市政府到新加坡举办了汕头首次在国外举办的投资环境介绍会,期间,众多潮籍海外侨胞纷纷支持和参加这次介绍会,共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潮州八邑会馆、中国商会、潮阳会馆、澄海会馆、揭阳会馆、陈嘉庚国际学会、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等社团组织的侨领和来自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实业家及各界人士近千人参加开幕式或亲临参观介绍会,使这次招商会办得很成功,共签订投资项目 32 个,利用外资 5 亿多美元。

创立于 1980 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以往一直不到中国国内开会,也不邀请家乡潮人派团参加年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侨务政策进一步落实,国际潮团联谊会终于同意正式邀请汕头市组团参加 1995 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会上并决定第九届年会于 1997 年来汕头市举行。1997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汕头市成功地举办了第九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来自世界 25 个国家(地区)86 个代表团、庆贺团共 3255 名代表和嘉宾参加会议。年会的规模居历届之最。

海外侨胞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比以前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接受海外侨胞捐资办公益事业累计达 14.6 亿元(未包括李嘉诚先生捐资 12 亿港元创办汕头大学)。其中 1993 年以来捐资近 8 亿元。这些资金被用于新建、扩建校舍的有 646 宗,投入 6.1 亿元;新建、修建医院,购置医疗设备的有 78 宗,投入 7775 万元;新建、扩建敬老院、幼儿园 105 宗,投入 2844 万元;建设饮水改造工程 140 宗,投入 4957 万元。还兴建了一大批民房、文化设施和修桥筑路等,有力地促进汕头两个文明建设。

和平重建时期的金边城 潮人和柬埔寨潮州会馆

陈景明

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几年来伴随着“和平重建柬埔寨”的步伐,人口急剧增长,至目前全城人口近百万。其中华人 20 万。潮汕人在华人中占有 15 万之多。

70 年代中期,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实行“金边空城下乡运动”,华人惨遭洗劫。素有“小潮州”之称的金边市,许多靠多年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侨居金边的华侨全部被驱赶到乡下,强迫劳动,受尽歧视、虐待,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因贫病交加,被折磨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浩劫中,潮人饿死、病死人数全柬近 30 万。而少数人则冒着生命危险,顶着丛林、山地、海洋的恶劣条件,以及奸商、流氓、地痞、土匪的凶恶袭击和摧残,逃亡到香港、澳门、加拿大、美国、澳洲等地区和国家而定居下来。许多潮侨一提起这段辛酸的日子,都言“不堪回首”,万分感叹!

80 年代初,有部分潮人带着剩存的一点家资,冒险“试试”重返金边,原住乡下的部分潮人也开始来闯金边。开头房子很便宜,100 平方米左右的楼房约需 100 克左右的黄金即可买到。以后随着柬埔寨新政府的成立,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华人的权益得到保

障,居住在农村的潮人更放胆地闯进金边。至90年代初,金边潮人已超过10万,目前已达15万之多。其中约有二成人是重返金边的潮侨,其余八成人是从农村来的“新人”。

初来金边的潮人,普遍都象“出世仔”一般,赤手空拳,靠自己艰辛奋斗,白手创业。他们有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靠投亲靠友,寄人篱下,借点本钱做小生意,先解决食住问题,有了立足之地后,再逐步发展。这次笔者抵金边时,跟外甥阿俊前往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七彩电脑冲印中心冲印相片,同一位潮籍姓李的老板交谈,深受启发。他今年50多岁,原住金边,当时金边政府通知他下乡三天后就回来,但一去就三年多。他们下乡后饱受饥饿之苦,一顿饭只半斤米(0.25公斤)就要吃10人,吃不饱就吃香蕉树茎,有的人吃得水肿,要是再拖一两个月就会饿死。笔者问他:“现在能有这么大型的七彩电脑冲印设备,生意做得这么红火,是靠什么起家的?”他伸出两只手说:“我初回金边,一无所有,就靠这10个好朋友(指两只手十个指头)帮助,白手起家的。原来身边存点钱,再向亲朋借一点,凑集起来买了较便宜的楼房和简单设备,以后赚了钱,就逐步更新设备,扩大营业范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有今天。有些高棉人看到我们潮人发达比他们快,认为是商店有设财神爷之故,他们现在也在商店供起财神爷来了。”

笔者在金边期间,还结识一位姓洪的潮阳籍老乡,他年近花甲,身体硬朗,平日勤劳俭朴,目前专做从泰国运来的批发西药生意,生意除金边外遍及柬埔寨各省。他有个能干的妻子,协助他做生意。1983年来到金边,开始没有本钱,就先向泰国老板借本钱搞代销,他深信其父的教导:“生意细细会发家”,一步一个脚印,经过12年的奋搏,生意从小到大,目前的家业相当可观,又有二个铺面,4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电话3个,汽车两部,三个女儿,

二个儿子,三个女婿均在店中经营生意外,还雇一些当地人为他当会计。

笔者还结识金边另一位姓黄的大亨,他是潮汕人,更是经商有道,赚钱有术。他在20多年的战乱中险些丧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由于他娶了个高棉人做妻子,这个妻子对金边的情况很熟悉,交际甚广,人际关系甚好,消息灵通,脑筋也很灵活,因此,在80年代初期,重返金边时,就积极帮助她丈夫进军房地产,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并向亲友借贷部分,买下几处旧楼房、仓库,后来适时抛出,获利甚丰。人们估计他目前的资产可能有百万美金以上。但他仍不满足现状,继续扩大经营,除房地产外还与法国一客商洽谈合伙经营葡萄酒的生意。

在金边的潮侨,大量的经营商业,本钱足的做大生意,本钱少的做小生意。如自己有临街铺面,则前面做生意,后面或二楼作住家。无临街铺面的则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更多的潮人是在各集贸市场设立固定摊档,经营小百货、文具、烟酒、食品、录音录像制品、服装和水果,有的则经营金银首饰。全市最大的集贸市场,一是奥林匹克商场,一是新市商场,都有摊档位2000个以上,其中潮人开办的大约占六成多。每个摊位小的六七平方米,大的十左右平方米。寸土尺金。他们坚信那里是发家之地,整天蹲在那里,寄予很大期望。笔者几次到这两个大商场购买一些商品,几乎都是用潮州话交谈成交的。大街上的饮食店多数为潮人所经营,笔者吃过几次小食,都是潮人开办的饮食店。

几年来,在金边的潮人由于勤劳刻苦,善于经营,生意由小到大,房屋由无到有。据笔者在金边所见并问及亲友,在乞丐队伍中没有一个潮人,在清洁工和人力三轮车队伍中也未见潮人。更值得骄傲的是,尽管在艰苦的岁月,在众多的潮人中,没有一个妇女

涉足红灯区或高级宾馆,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色情行业。她们不愧是海外可爱的“半边天”。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在外甥周阿俊的陪同下,我带上了柬埔寨潮州会馆会长杨启秋先生的介绍信,前往位于金边闹市中心的潮州会馆参观访问。

接待笔者的会馆秘书庄明瑞先生,领我们参观会馆各项设施,包括办公室、礼堂、公立端华学校和神社等。然后坐下来同我们一一畅谈,介绍重建潮州会馆后的情况。

70年代中期,“金边空城下乡运动”时,会馆也遭受空前浩劫,其全部财产包括有关历史资料全部毁于一旦。自从进入90年代后,柬埔寨新政府成立以来,实行平等民族政策,华人华侨权益得到保障。在以杨启秋为首的一批旅柬侨领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93年重建了柬埔寨潮州会馆。3月7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使旅柬潮人有了一个自己温暖的“家”。会馆成立后,以“敦睦乡谊,互助福利,弘扬文化,拓展工商”为宗旨,积极开展工作,被当地潮人誉为“潮侨是赖”。

潮州会馆重建后,首先是解决了从柬华理事会(旅柬华人组织)手里移交回该馆之端华大楼业权和端华学校校务管理权,使这座公立学校校舍不断扩大,设备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师生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校有教师180多人,学生9000多人,成为金边也是全柬一所最具规模、最完整的中文学校。

重建后的潮州会馆第一届理事会产生后几天,即1994年3月11日,金边市铁桥头发生了严重火灾,毁屋近千间,灾民近万人,新生的理事会主席即发出紧急呼吁,动员旅柬潮人救灾,并向美国潮州会馆发出求助救灾的公函。1994年4月14日,美国南加州潮州会馆,南加州玄武山福建善堂等组成救灾委员会,派团至金边现

场发赈。今年10月上旬,也是笔者旅柬在金边逗留期间,柬埔寨桔井、磅同等几个省发大水,灾情严重,潮州会馆响应柬埔寨王国政府救灾号召,捐助大米20吨,并派出代表前往灾区慰问。

几年来,柬埔寨在和平重建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政府的经济仍属拮据,首都金边的公共设施仍相当落后。1994年3月21日,潮州会馆捐款3.2万美元供金边市政府修葺王宫四周城墙。同时,潮州会馆还捐赠柬币1000万元,会长杨启秋伉俪捐赠柬币2000万元,作为修筑公路费用。当天下午,金边市市长秦锡龙接见潮州会馆会长杨启秋等人,称赞潮州会馆的捐助是“及时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金边市5位副市长。

重建后的柬埔寨潮州会馆,还积极加强对距金边市30公里的贡武“潮州义地”的管理、扩建与维修,斥资扩建了贡武潮州义地长达3公里的通道,并开了水井,使潮州义地附近社区的交通、饮水卫生和环境得到改善,方便了侨社乡亲葬祭先人的活动。如此善举深得广大潮人的欢迎。许多老华侨说:“会馆办此善事,使旅柬潮人逝世后有个葬身之地,做到落叶他国,根连故里(因在这里入葬,可建潮汕式碑墓,碑上刻有祖籍广东省某县某乡、村)。”

潮州会馆的建立,不仅办好中文学校,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成立了潮剧、潮乐组、大锣鼓班、醒狮团,既把遭浩劫后的潮汕艺术在柬重振雄风,而且也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每当潮人有婚丧喜庆,这些团体都接受邀请,积极配合活动,活跃气氛。今年3月,潮州会馆还特邀广东潮剧团到金边为瑞华学校修建学校筹款义演,一共演出7场,场场爆满,佳评载道,既满足了广大华侨渴望能看到潮剧的愿望,也为中柬文化交流,加深中柬友谊做出了贡献。

柬埔寨潮州会馆的建立,还为当地华人、潮人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如有的潮人家中出现纠纷,或者家族内产生矛盾,都找会馆

解决。有位70多岁的揭阳籍老华侨在柬无依无靠，孑然一身，要想回老家定居，但经济困难，会馆知道后，出资给老人买飞机票，办好回国手续，让他顺利到达故乡，他回乡后即去信鸣谢会馆。还有4位是中国北方籍女青年，受骗到金边，后想跳出火坑回归祖国，但身无分文，会馆获悉后，伸出援助之手，出资为她们办理回国手续并买飞机票，直至把她们全部护送上机。这4位女青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告别。

这一天，庄先生为笔者介绍重建后的潮州会馆所取得的成绩还很多，但不能一一表达于笔纸。最后，我向庄先生表示：“我回国后一定要把重建后的潮州会馆积极为潮人和社会办好事实事，向乡亲们宣传，让亲人们高兴！”临别时，庄先生即席赋诗一首道别。诗曰：“海外相会情倍深，沧桑变化多浮沉，今日亲人相聚会，不重银帛只重情。”

1996年10月中旬于金边

潮汕人民支援北伐战争纪事

秦梓高

1925年12月，国民革命军经过东征南讨后彻底摧垮了军阀在东江和南路的盘踞。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出师北上推翻反动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伐统一中国是孙中山毕生奋斗的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就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时，也作出决议：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主要任务。7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广东党组织在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中广为宣传北伐，鼓励民众赞助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北上，在三个战场上作战。中共汕头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援助北伐战争的指示精神，动员潮汕人民给予大力支援。首先是在为北伐战争筹款方面：当北伐先遣军5月出师之际，广州国民政府即令汕头先筹款60万元，“以为第一批军队

之军糈”。广东为支援北伐发行的第一期有奖国库券 500 万元中，潮梅人民负担就达 200 万之多，并要求 7 月 14 日前认购完成。此外广东省政府还要求全省人民提前征一年（即 1927 年）钱粮；还要潮梅从食盐专卖中年销售 88 万担，每担抽饷银 2.5 元；又规定凡内河船只，按吨位应交 3 至 60 元不等的保护费；还要轮船、火车、电灯加二征税。以上各项筹款任务，潮汕人民都积极完成，先后共筹款 1000 万元之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的进行。

当驻潮梅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第四师，奉命编为北伐东路军出师福建时，中共潮汕地方党组织动员人民大力支前。7 月 28 日，在中共汕头地委领导下，汕头市成立了北伐青年工作团汕头分团。该团设有组织、宣传、游艺三部，在共产党员徐琛（原团汕头地委委员）领导下，积极开展宣传、劳军、募捐等活动。该团并随军北伐到福建，沿途向工农群众宣传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讲述国民革命的道理，发动群众踊跃支前。汕头市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罢工工人北伐运输队 200 人，分成 2 个大队，由共产党员彭丕、曾学吕分别担任大队长，黄汉强为训育员，随军出发，担任运送军需用品任务。当东路北伐军经潮州开大埔赴福建时，因秋旱韩江水浅，水运困难，中共潮安县部领导县农会和工会，组织一支由 700 多名青壮工人、农民组成的运输队，并派总工会执委、财政部主任韦少楠担任队长，帮助革命军挑粮草、运弹药、抬担架。澄海县农会筹备处，也从各区动员组织了近百人的运输队，由县农会特派员余斯仁率领前来参加，使北伐东路军能够顺利向前推进。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战争节节胜利。9 月两路北伐大军汇集于江西，直逼军阀孙传芳老巢南昌。孙传芳为解南昌之危，急令福建军阀周荫人集结兵力进

攻潮汕，妄图使北伐军首尾不能相顾。9 月 19 日，周荫人于福建龙岩总司令部策定分兵五路进逼潮汕，进而夺取惠阳、广州，企图捣毁国民革命军大本营。整个广东形势相当紧张。

为了阻击周荫人军队入侵，中共汕头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阻止敌人进攻，保卫潮汕，保住广东，支援北伐。中共饶平县党支部接地委紧急通知后，党支部书记林琮璜和杜式哲、詹宗鲁等领导人，立即奔赴各区乡，动员扩大农军，筹集武器弹药，准备随时协助国民革命军粉碎周荫人军队进攻。

10 月初，国民革命军后卫独立第四师张毅部，于福建平和县与周荫人部属闽军第一师张毅部交战，独四师受挫，退入广东饶平，张毅部尾随追逼。10 月 8 日，张毅先头部队抵饶平的上饶茂芝，局势危急。是日，林琮璜、詹宗鲁于饶平新丰召开各乡农会骨干会议，组织新丰农军助战团。水口、二祠、石井等乡村还发动农会会员制纸旗、备鞭炮和铜锣准备助战。次日晨，独四师二团于蔡坑口与张毅部交锋，农军助战团即分头包抄闽军侧背，发起冲锋。各乡前来助战的群众 1000 多人。据守各个山头，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还在煤油箱里燃放鞭炮，酷似此起彼伏的机关枪声。一时枪炮声、锣鼓声、呐喊声震荡山谷。新丰农军助战团詹光国等 40 多人，手持牌刀火枪，配合二团八连冲入敌阵，砍死砍伤闽军数十人，缴获枪支数十杆。在激烈战斗中，詹光国的右手和腹部被流弹击伤，但他还咬紧牙关，枪转左手射击，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在阵地上。农军和革命军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精神，使张毅部乱了阵脚，败退茂芝。不久张毅获悉国民革命军已攻下永定，北洋军阀的左、中两路均告惨败，遂率部退回福建漳州。

蔡坑口阻击战的胜利，支持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使潮汕转危为安，巩固了后方根据地，饶平农军也从此扬名。事后，省农协潮梅

海陆丰办事处致电嘉勉饶平农军,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澄海县党部;汕头、潮安、潮阳等县总工会,也分别致电勉励。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将詹光国烈士灵柩护送到饶平县政府举行公祭,并发给300块光洋抚恤其家属。

在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之后,已被打垮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乘国民革命军后方空虚之际,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密谋起事,企图动摇广东革命根据地。陈炯明在香港被吴佩孚封为“南方讨赤救国军总司令”之后,又分封其余党刘志陆、杨坤如为军长,组织致公会,设总部、出报纸,鼓吹东山再起。并派亲信周醒南在福建厦门与军阀孙传芳的闽军接洽,阴谋内外夹攻潮梅。还暗运军火接济滞留在福建漳州的刘志陆、洪兆麟残部,要其伺机窜犯潮汕。陈炯明残部林虎,也派人在潮安庵埠一带秘密活动。与此同时,陈还派遣陈演生、陈天球等一批亲信,潜回东江,收罗余孽,组织土匪武装,蠢蠢欲动。潮汕人民高度警惕,监视着这一帮匪徒,配合当地驻防军,打击这些军阀残余,粉碎其破坏阴谋,巩固了后方阵地。

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领事考

房建昌

对于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历任领事的生平,我们了解不多,有关史料也很少,但仍值得认真研究和排比,这对于近代汕头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蔡家常先生在《潮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02页所撰“外国驻汕领事馆”一条主要介绍了设领背景,列举了9个国家曾在汕头设领,并考出了这9个国家领事馆的汉文名称及今址,还考出了7个国家领事馆的开设年份,还附有英领馆旧址照片。本文认为设领的不止9个国家,比蔡先生多了4个,且蔡先生所考这7个国家领事馆的开设年份并不准确。本文认为有的更早。本文还据更多的史料,指出了领事们的出任年龄。对其他有关背景也作一勾勒,希望能比蔡先生的成果更进一步。限于篇幅,本文的考证还只是初步的,望有关专家学者能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

一、英国

蔡先生言英国驻汕领事馆有两个,一为“大英驻扎潮州等处领事署”,1860年开设,地址在汕头;另一为“大英驻扎潮州领事官行

署”，1870年开设，地址在潮州市。但后一说法不大准确。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增设潮州为通商口岸，英国得在口岸设领事馆。但后来潮州口岸设在汕头。

英国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英文名和上任年龄为：

1860年6月（咸丰十年五月）坚佐治（George W. Caine, 28岁）。曾在伦敦皇家学院学中文，1850年起在香港政府就职。其父为香港代理总督。1860年坚氏抵达汕头时，因此前西方海盗船在此贩卖鸦片和绑架苦力，当地人民的反西方情绪非常强烈。坚氏马上决定暂时在汕头双岛（Double Island，今妈屿岛）设领，而不是在潮州。双岛比汕头更靠海，这里没有几个西方人，1898年还只是个小村子，无清朝驻节行政官^①。不久，一个西方人的住所在夜间遭攻击。一个西方工程师从船上下来在双岛逛窑子，离开后被杀。西方人只要一上岸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坚氏只能向上要求提供来福枪和刀剑。9个月后，他才敢从汕头上岸拜访清朝官员。3年后他才敢迁领馆至对着汕头的港口一侧，即岩石英领馆址。为了保护领馆，他从香港搞来了一尊12磅的榴弹炮及火药，依靠警察，一个前炮兵，训练领馆炮手们以为用。不过他希望只起威摄作用，最好能不用。在领馆的地下室有两个房间关着犯人，他们日夜喊着和企图冲破牢笼。坚氏企图在此搞块租借地，但未果。

当坚氏首次来到潮州时，一块大石头从城外的桥上扔了下来，砸穿了地方官为他此行所准备的船的甲板底部，他一看不好，赶紧回去了。5年后他才到了潮州，但访问不成功。地方官很礼貌地接见了，但第二天一早，因害怕出意外，请他尽快离开，还派了一位护卫送他上船。当地用武力表达他们憎恨西方人的情绪非常强烈。坚氏回英探亲时，固危林（M. William Cooper）代行其职。他在当地清朝官员的严密保护之下在潮州待了10天，他被告知不要想

马上在此设领。他也明智地向英公使团报告：在汕头设领比潮州好，因汕头可进大蒸汽船，且有外侨90人，其中半数为英侨；而潮州距离汕头要走一天的路，英商不感兴趣。但英公使团认为应照条约在潮州设领。

汕头领事显然不是一个肥差，坚氏有侵吞和挪用公款的嫌疑，这在英国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但是他的个人财政陷入了绝境，坚氏为此入狱。一个中国公司的失败使他丧失了所有的钱，到1870年，他与唯一的妻子有了8个孩子。据信，他欠一个同事5000英镑，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且除了薪水别无收入。英国外交部对他评价是低的。他说1864年在汕头领馆时一笔公款被抢，但这一说法不能令人满意。他们认为他试图用公款付他居家的每一笔小开支，而在英国时所用的支票不能兑现。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给人以这种看法意味着他前程的断送。在华时他不太受宠，尽管他忽视了学中文，但他在华的上司阿礼国公使和威妥玛还是认为他是个称职的领事。1868年，阿礼国将他从汕头调任收入较丰的汉口领事职，但遭到了英外交部的反对。威妥玛向部里报告，要是不让坚氏的孩子离开学校，就要增加他在汕头的薪水，但又遭部的拒绝。坚氏离开汕头后面临着被人追债的窘境。他40岁时卸领事职，全家赴澳大利亚谋生，又遭失败，不久回到上海，在上海因债务被判刑两年。在狱中患上了绝症，发现1个月后在上海去世，年仅41岁，留下妻子和8个孩子，最大的才15岁，而且一贫如洗。上海和汉口的英侨出于怜悯，捐款6000两银子，才使他一家得以返英。

1868年5月（同治七年四月）阿查理（Chaloner Alabaster, 30岁），爵士，1838年生，其父在伦敦做草帽，1858年来华为使馆翻译生。1858年英法侵略军占据广州后，奉英国军事当局令，负责押

送两广总督叶名琛到印度。后在华南各埠任副领事、领事。1868年交接坚氏在领馆的职务。当时英领已在潮州找好了领址房子。阿氏时为署领事。他马上去了潮州,待了1天没人骂他鬼子,但他认为西方人在此不会安全,因为清朝行政官在此政令不行,自己都怕当地人,他们不是靠行政手段在此治理,而是用欺骗的手段维持。西方人一旦在此引起争端就会被杀。但阿礼国公使认为这么多年无法在潮州设领会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所以阿查理向潮州地方官宣布该地已向英国开放,英领或一助理将在此久居。不过英外交部这时还是决定:不必再在潮州设领,有汕头一领,并从汕头有时访问潮州就可满足需要了。此后再未提潮州设领事,汕头从此成了永久设领地。但潮州的房子至少留了下来,到清朝灭亡,汕头英领访问潮州地方官时还住在那里。阿氏1892年(当年54岁)因身体不好退休回国,1898年去世。

汕头领馆刚建立的第一个月,任翻译的阿氏曾带一船英海军去一村子救一被作为人质的法国神父^②。他们炮轰了该村子,烧毁了一些房子,救出了一些人和该神父,将抓住的4个“海盗”交给了地方官。第二年,固危林又应地方官的要求,陪同三船英海军攻打另一“海盗”村,屠杀了100多名“海盗”。当时的英公使卜鲁斯虽赞同这一行动,但要求他们以后遇此事应交清官员处理。

1872年3月(同治十一年二月)威妥玛(Thomas Watters, 32岁)。

1872年12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佛理赐(R. J. Forrest, 36岁)。

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额勒格里(William Gregory, 44岁)。

1886年(光绪十二年)贝德禄(E. Colborne Baber, 43岁)。据说

在1887年,西方游人来到汕头领馆区会遇到当地人的友好接待^③。

1888年8月(光绪十四年七月)费里德(Alexander Frater, 47岁)。

1894年(光绪廿年)司格达(Benjamin Charles Georges Scott, 47岁)。

1896年4月(光绪廿二年三月)禄福礼(Harry English Fulford, 37岁)。

1897年(光绪廿三年)贾礼士(William Richard Carles, 49岁)。

1898年8月(光绪廿四年六月)福恪林(Colin Mackenzie Ford, 51岁)。

1899年3月(光绪廿五年二月)佩福来(G. M. H. Playfair, 49岁)。

1899年(光绪廿五年)萨允格(James Scott, 49岁)。

1901年(光绪廿七年)何兰田(W. Holland, 50岁)。

1902年6月(光绪廿八年五月)德为门(B. Twyman, 29岁)。

1903年1月(光绪廿八年十二月)吴理斯(R. Willis, 35岁)。

1906年3月(光绪卅二年二月)斯来(H. E. Sly, 29岁)。

1906年10月(光绪卅二年八月)郝思义(P. F. Hausser, 49岁)。

以下为驻汕英领在任年:

1924年,歌尔克(C. C. A. Kirke, 49岁)。其父为英格兰首府列斯特的花样布商和女帽商。歌氏1898年23岁时来华人领事界。1915年在广西梧州任领事。他的汕头领事报告内容十分丰富。他说汕头的反外势力很大,而且有传统,他致力于建立友好的关系。汕头的地主象流氓无赖,但有时挺有趣,而反外的外务委员及其属下就不好对付了,成了他与汕头地方当局交涉的障碍。1925年初,广东政府占领了汕头,当地立即出现了反洋教和反帝浪潮,

还散发小册子,年轻人走上街头宣传,他们控制了汕头。教学被农会占领,英日人及领事馆的当地仆人被迫离去。禁止车船搭乘英日人,要将他们赶走。此年7月,歌氏言英日人惶惶不可终日,东西只好从香港买。两个年轻人在夏季的高温下整天围着炉子为大家烤面包,然后还要洗碗洗碟子。水也从井里自己打。鉴于汕头的形势,噶尔斯廷建议暂时撤走,但歌氏想观望一下。9月,反共势力得手,枪杀了市长,使外国人的日子好过了些。但11月蒋介石控制了广东政府,反英行动又照旧。1926年春,当歌氏从领事馆外墙清除共产党标语时,被几个显然是当地革命者指责,后他躲回了领事馆。整个夏季外国人的日子仍不好过,无法象过去那样从当地人手中买到烧火用的木材,出行仍有被拒载的。外侨只好雇佣白俄、欧亚混血和印度仆人,有时也雇华人,但这很危险。到晚秋,一些英国公司已有人冒险回来,所雇华人又照旧。1927年初,一个当地国民党人宣布在一个福州传教士的家中发现了屠夫屋,内有无眼的婴儿们、铁锅和炉子。这是屠杀婴儿们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歌氏愤怒地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得到的答复是此下级官员并无授权,而且已被解职。至迟在1927年春,右翼国民党势力在汕头开始反对共产党各组织,反外势力停止了活动。经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到了秋季,革命武装势力又控制了汕头,但只维持了4天,外国人未受骚扰。在汕头待了3年半,歌氏离去,头脑一片混乱,他不知以后要怎么办。据说在中国领事界,没有人同他那样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困苦。歌氏1928年8月10日升任昆明总领事,当时他52岁,已显得老态龙钟,人们认为可能是在汕头太操心。其妻死在回家的航海路上。他1932年2月6日被翰垒德接替后退休,时年57岁,为英国勋章获得者。84岁去世。

1925年,噶尔斯廷(C. F. Garstin, 24岁)。其父为印度文官,后

回伦敦。1901年20岁时来华人领事界。1925年7月17日在厦门领事任上,不久任广东领事馆汉文代理秘书,此时似兼管汕头。1929年任上海总领事。55岁退休,荣获英国勋章,89岁去世。

1928年,翟兰思(Lancelot Giles, 50岁)。此时,英领事与地方官的关系仍很好。此年,翟氏在汕头报告,有12男2女被指控是共产党暴乱,遭处决,他们唱着革命歌曲从监狱赴处死场所后,被射杀,其中1女被打了5枪。两女死后均被剥光肢解。他写道,只有华人才会为他们的信仰而死,对他们的敌人亦如此,否则拯救中国无希望。翟氏1878年生于厦门,其父翟理思当时在厦门领事馆工作,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学家。翟氏1899年进入驻华外交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正在北京。1970年,有人把他1900年在京日记整理出版。来汕头前他曾任腾越、长沙、福州领事。1928年任天津总领事。1934年死于天津任上。

据《汕头指南》(汕头,1933年):英国领署位于大岩石96号,领事名布理嘉(据《中国外交年鉴》[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版,R. S. Pratt, 1933年3月1日上任),住岩石海乾96号(应与领事馆为同一地)。布氏1905年时23岁进入外交界,54岁(1936年)从领事任上退休。其兄亦为在华领事外交官。其家庭有印度渊源和血统,以致其兄在沪被当地人称做黑领事,不过布氏来华时是很英俊的。1926年广东爆发了反英运动,布氏正任驻海口领事,他得知沙基惨案爆发的当日,趁当地华人还不知道,决定立即带妇孺于翌日离开,但因交通通讯原因未成功,后来得到了广东政府派兵保护。1927年1月,正任重庆领事的他走在街上,有拿枪的士兵们骂他,喊着要杀他,这也是因为全国性的反英运动。布氏93岁去世。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英国领事馆位于岩石99(号),领

事名布以霍义慈库莫阿^④。

二、法国

蔡先生言“驻汕大法国领事署”的开设年份为1906年。实际为1860年,只是在本世纪初以前大多由英领事兼。

法国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60年6月(咸丰十年五月)(副)坚佐治(英领兼)。

1863年4月(同治二年三月)迪格士(H. A. Dircks),德国商人(代理)。他另外还于此后的几年兼过丹麦、挪威和德国领事。1874-1878年底在汕头海关任职的英国人皮丕(1874年时21岁)记载:其名为Diercks,为当地德国商人首要。他在汕头港的一边挣扎了20多年,有一华人妻子和一大群子女。突然由于欧洲甜菜收成的失败,对汕头糖有了大的需求,他鸿运高照,美元滚滚而来。运气使他从默默无闻者变成了香港日耳曼商业王子。他建了华宅,对不多的几个在他运交华盖时未予轻视的人招待时出手阔绰。他是记仇的。皮丕不是他的喜爱者,因为皮丕不豪饮或好赌。他不信任皮丕,因为皮丕是个英格兰人,却能讲德语,而且有的事情比他知道得更多。但迪格士的结局是悲伤的,他欲荣归“故里”,炫耀乡里,而实际上由于岁月的流逝,除了汕头,他已无故里。皮丕还记得他话别时所言:“我要去法国,吃法国菜。我要将在汇丰银行所存1万英镑随身带回去。”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因心脏病死于归航中。

1867年(同治六年)(副)坚佐治(英领兼)。

1868年5月(同治七年四月)(副)阿查理(英领兼)。

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副)额勒格里(英领兼)。

1883年(光绪九年)(署)费笠士(George Phillips, 46岁,英领兼)。

1904年(光绪卅年)道弥乐(Dr. H. Daumiller)。

1906年9月(光绪卅二年七月)(副)博安(E. Point)。

1908年8月(光绪卅四年七月)(副)费恒禄(H. Feer)。

据上引《汕头指南》:法国领署位于外马路77号,领事名宝礼悦(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版, Amedee Beaulieux, 副领代理领事, 1933年5月3日上任);又言领事官名吕尔庚, 42岁, 已居留3年, 住址同领事馆。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版, 领事高尔图(Cadol), 1934年3月上任。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法国领事馆位于外马路77(号), 领事名阿鲁巴托基亚多尔。

三、美国

蔡先生言“大美国驻汕领事署”的开设年份为1909年。实际为1859年12月,只是在本世纪初以前时由德、英领事兼。1870年时领事馆属第一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恢复。

美国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和上任年龄为:

1861年(咸丰十一年五月)巴力斯(Jr. Chas. W. Bradley, 德记行商人)。

1864年2月(同治三年正月)荣日德约瑟(Joseph C. A. Wingate)。

1875年3月(光绪元年二月)石巴以撒(Issac F. Shepard)。

1876年12月(光绪二年十一月)恒德森约瑟(J. J. Henderson, 驻厦门兼)。

1878年10月(光绪四年九月)(知)林四舍(C. C. Williams)。

1882年10月(光绪八年八月)(知)周尼斯(W. J. Jones)。

1883年11月(光绪九年十月)(副)司良德男爵(Edwin von Seckendorff, 29岁, 德领兼)。

1889年6月(光绪十五年五月)(副)施德礼(Ivo Streich, 德领兼)。

1898年(光绪廿四年)璧洛(Dr. Edward Bedler, 驻广州兼)。

1906年10月(光绪卅二年八月)郝思义(英领兼)。

1908年12月(光绪卅四年十二月)韩慈敏(Percival S. Heintzman)。

1909年3月(宣统元年闰二月)潘士思(Albert W. Pontius)。

1910年9月(宣统二年八月)卫家立(C. L. L. Williams)。

据上引《汕头指南》:美国领署位于外马路74号,领事(官)名格兰(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版, L. N. Green, 葛瑞恩), 电话1357, 41岁, 已居留2年, 住址同领事馆, 1931年9月上任。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版, 领事邢祺(F. W. Hinke), 1934年2月上任。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美国领事馆位于外马路, 领事名凯耐斯基埃扬兹。

四、荷兰

蔡先生言有“荷兰国驻扎汕头领事府”, 但未考出开设年份。

荷兰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64年(同治三年)李质逊(Thomas Williams Richardson)。

1878年4月(光绪四年三月)(署)赫尔(Robert H. Hill)。

1892年8月(光绪十八年七月)(署)施德礼(德领兼)。

1900年(光绪廿六年)萨允格(英领兼)。

1901年(光绪廿七年)何兰田(英领兼)。

1902年6月(光绪廿八年五月)德为门(英领兼)。

1903年1月(光绪廿八年十二月)吴理斯(英领兼)。

1906年3月(光绪卅二年二月)斯来(英领兼)。

1906年10月(光绪卅二年八月)郝思义(英领兼)。

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版, 领事代理温亨(Vam Hevm), 1930年4月3日上任。

据上引《汕头指南》:荷兰领署位于外马路283号, 领事名甘摩伦(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版, 代理领事 W. C. Crommelin), 36岁; 代领事木德声, 34岁; 两人均已居留2年, 住址同领事馆。领事甘伟良, 31岁; 其妻29岁, 无职业; 均居留1年, 两人住址为蜈田路85号。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荷兰领事馆位于外马路283(号), 领事名班德鲁乌奥鲁。

五、丹麦

蔡先生言有“大丹麦驻扎汕头领事署”, 但未考出开设年份, 且言由挪威领事兼。此说法并不准确。

丹麦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64年(同治三年)(兼)迪格士。

1879年3月(光绪五年二月)希路踪(Wm. Hulse, 德人)。

1883年3月(光绪九年正月)郇罗博(Robert Craig)。

1885年4月(光绪十一年二月)荷华(E. F. Alford)。

1886年2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窝打阿林(W. E. Allum)。

1891年5月(光绪十七年四月)(署)纪禄生(W. A. Cruickshank)。

1892年10月(光绪十八年八月)(署)麦嘉飞(D. Machaffie)。

上引《汕头指南》无丹麦领署记载。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丹麦领事馆因事变(指抗日战争爆发)闭锁。

六、挪威

蔡先生言有“大挪威驻扎汕头领事署”，1908年开设。实际上是1867年，且为瑞典和挪威联合领事。两国联合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67年(同治六年三月)(兼)迪格士。

1879年3月(光绪五年二月)(兼)希路踪(德人)。

1883年12月(光绪九年十一月)(副)安德辂(John Adrew)。

1886年(光绪十二年)(副)夏罗俾(Franz Heinrich Lueder Haesloop, 德商)。

据上引《汕头指南》：挪威领署位于居平路6号2楼，领事(官)名武兰勒(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版，

Frederick Murer, 名誉副领事, 1933年5月上任), 住址同领事馆, 但未言2楼。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挪威领事馆因事变闭锁。

七、德国

蔡先生言“德国驻汕领事署”的开设年份为1874年，实际为1864年。

德国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64年(同治三年)迪格士(代表律百克、不来梅、咸伯, 亦译三汉谢城)。

1870年3月(同治九年二月)库吕各尔(Caesar Krueger, 代表北德意志公会。1872年起授德国驻汕头副领事)。

1877年1月(光绪二年十二月)(副)额必勒(H. Ebell)。

1880年5月(光绪六年三月)(副)沙博哈(Berhard Schaar)。

1883年4月(光绪九年三月)(副)司良德。

1886年8月(光绪十二年七月)(副)卜德乐(H. Budler)。

1889年6月(光绪十五年五月)(副)施德理(1898年授正领事)。

1906年(光绪卅二年)古朋阿(B. Krause)。

1908年(光绪卅四年三月)(署)卜海泊(Dr. H. von Borch, 31岁。1911年授正领事)。

上引《汕头指南》无德国领署记载。

八、比利时

蔡先生未言比利时有驻汕领事署。实际上有该国驻香港领事同时兼汕头、琼州、北海、三水领事。

比利时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902年8月(光绪廿八年七月)韩蔓(Th. Hamman)。

1907年3月(光绪卅三年正月)李百协(J. Bribosia)。

1909年(宣统元年)Francis Jansens。

上引《汕头指南》无比时领署记载。

九、意大利

蔡先生未言意大利有驻汕领事署。实际上有该国驻香港领事同时兼汕头、琼州、北海、三水、江门领事。

比利时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99年(光绪廿五年)福罗秘车利(Z. Volpicelli, 43岁)。

上引《汕头指南》无意大利领署记载。

十、西班牙

蔡先生未言西班牙有驻汕领事署。实际上有。

西班牙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文名为：

1879年(光绪五年闰三月)贝黎那。

上引《汕头指南》无西班牙领署记载。

十一、奥匈

蔡先生未言奥匈有驻汕领事署。实际上有,均由英领事兼。

奥匈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中外文名为；

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额勒格里。

1883年(光绪九年)(副)费笠士。

1886年(光绪十二年)(署)满思理(Robert William Mansfield, 25岁)。

1888年8月(光绪十四年七月)费里德。

1894年(光绪廿年)司格达。

1896年(光绪廿二年)禄福礼。

1898年8月(光绪廿四年六月)福恪林。

1900年(光绪廿六年)萨允格。

1901年(光绪廿七年)(署)何兰田。

1902年6月(光绪廿八年五月)(署)德为门。

1903年1月(光绪廿八年十二月)(署)吴理斯。

1906年10月(光绪卅二年八月)(署)郝思义。

上引《汕头指南》无奥匈领署记载。

十二、俄国

蔡先生言有“俄国驻汕领事署”,由法国领事兼,未言开设年份。但在西方学者兰森(G. A. Lensen)所编:《俄国外交和领事官员在东亚》(Russia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ials in East Asia, 东京, 1968年)、《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 1985年)及上引

《汕头指南》三书中均未见记载。估计即使有,也是清末之时。

十三、日本

蔡先生言“驻汕大日本领事府”的开设年份为1904年,实际为1873年,只是在1904年前为香港和厦门领事兼。

关于汕头日本领事馆的馆址、职员姓名、小传及他们以后的经历除了文中注出的史料外,主要据日本外务省《外务省年鉴》卷二、《外务省职员席次表》、《外务省职员一览表及び配属表》、《外务省职员一览表》、《外务省职员录》。

日本驻汕领事的出任年及姓名为:

1873年6月(同治十二年六月)林道三郎(副,驻香港兼)。

1874年8月(同治十三年六月)安藤太郎(副,驻香港兼)。

1883年11月(光绪九年十月)町田实一(代,驻香港兼)。

1896年3月(光绪廿二年二月)上野专一(驻厦门兼),1887年7月以署副领事资格任福州领事,1890年升任副领事职;1896年3月任厦门领事,兼管汕头领事事务。

1904年3月(光绪卅年七月)天野恭太郎(代)。据1904年8月的日本外务省资料:时厦门领事馆汕头分馆主任为天野恭太郎^⑤。

1905年3月(光绪卅一年二月)大贺龟吉。

1907年4月(光绪卅三年三月)德丸作藏(Tokumaru Saxuko)。1901年11月,德丸作藏任重庆副领事,1904年8月时为七等一级,1905年授领事。

据《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下册,该领事馆

1907年10月30日开设。

据1921年的日本外务省资料:时在汕头领事馆位于崎碌中路78号,副领事打田庄六,书记生浦和四郎、道明辉,警部今村梧朗。

浦和四郎(Urawa Shiro),1882年12月生,原籍爱媛县,1919年7月驻汕头领事馆。

岩井英一(Iwai Eiichi)1899年10月生,原籍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东田町,1921年6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同年8月任外务通译生,任职重庆领事馆,翌年2月任职汕头领事馆,1924年12月任外务属,在情报部第一课勤务,1926年5月任外务书记生,任职长沙领事馆,1929年1月任外务属,在电信课勤务,1932年2月起赴任上海总领事馆。1944年1月,上海领事岩井调来广东大使馆事务所任领事。

据1931年6月的日本外务省资料:时在汕头领事馆兼勤副领事为竹内静卫(Takenouchi Shizue.),1927年6月派驻厦门,兼管福州、广东和汕头。外务书记生为户根木长之助和土屋贤郎,警部为福山三霍。

《汕头指南》载:日本领署位于外马路178号,领事(官)名户根木长之助(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三年版, Tauegi C. 领事事务代理,1930年12月1日上任),电话1100;领署警察署长名岩田清太,两人住址均为沈赵路口1号。领署职员有小针兵吉、山内勇喜、小西改大郎、纪公明、藤原常一、佐了(々之讹,应为佐)木好雄、武者胜造(以上7人分别住联和海旁铭德里1、21、4、5、6、7、8号)、湘泽、小陇、小村(以上3人均住同益东巷2号)。

户根木长之助(Tonegi Chonosuke),1900年10月生,原籍埼玉县,1921年6月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同年8月任外务通译生,驻重庆领事馆,同年12月停职,翌年11月任外务属,在通商局监理课

勤务,1924年7月任外务书记生,驻吉林领事馆,翌年3月任陆军炮兵少尉,同年4月叙正8位,1927年3月驻汕头领事馆,后任香港副领事,1942年3月任广东总领事馆副领事。

岩田清太(Iwata Seita),1884年8月生,原籍冈山县,1903年4月冈山师范学校毕业,1915年1月任冈山县巡查,1917年7月任外务省巡查,1920年11月因1915年乃至1920年事件之功受赐90元,1925年3月任外务省警部补,厦门领事馆警察署长,1928年6月任外务省警部。

据《中国外交年鉴》(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版),领事原田忠一郎(Harada Chiuchiro),1934年5月出任汕头领事。他1881年8月生,1905年7月早稻田大学法学科毕业,1909年5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1915年8月外务省书记生考试合格,同年9月被录用此职,派驻南京领事馆,1920年3月任外务翻译官,叙高等官7等。

山崎诚一郎(Yamazaki Sei-ichiro),1880年生,1904年东亚同文书院第1期毕业,1907-1909年处理了间岛的疆界问题,后任张家口领事,1932年9月27日做为满洲里领事,经历了70天的被包围,后与日侨回国。后任汕头领事,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带领汕头日侨撤走。1940年3月,山崎诚一郎受任汉口首任日本居留民团长,4月22日上任。参事会员的责任自然取消,参事会从执行机关转化为咨询机关。1942年时住在日租界顺庆里1号,团址在汉口湖南街14号。1943年8月时,团址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21号,山崎仍为民团长。

井手清见(Ite Kiyomi),1895年4月生,原籍长崎县大村市,1933年入外务省,驻上海,后任汕头领事馆警察署长,1938年2月升为警视,1941年2月任广东总领事馆警察署长。

据1940年10月的日文资料:日本领事馆位于永平路1号,领事名高井末彦(Takai Sueshike),1895年1月生,原籍岛根县簸川郡今市町,1915年东京外语学校英语部和支那语部分别毕业,1925年5月派驻厦门总领事馆,1927年11月上任广东总领事馆副领事,1929年10月1日时为赐暇归朝者,1932年9月11日任汉口总领事馆副领事,1940年任汕头领事馆领事,为同年上任,时45岁。

据1942年2月的日本外务省资料:时汕头领事馆领事为高井末彦,兼勤副领事为水元(同年的资料言其名恒八,以厦门总领事馆副领事兼此职,54岁^⑥),书记生前岛岩男、吉天正巳和山崎大二,警部为山野宗松,警部补为(潮州)铃木正一、小江太吉和梅津正雄。

朝比奈贞治郎(Asahia Teijiro),1899年10月生,1921年6月东亚同文书院第18期毕业,同年8月任日本外务省事务嘱托,11月做为外务省留学生来北京留学,1923年1月任日本外务省外务书记生,派驻南京领事馆,1925年派驻北京公使馆,10月做为日本代表参加中国关税特别会议,1929年4月派驻汉口领事馆,1937年在伦敦总领事馆,1938年调汉口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42年11月10日上任第四十八任汉口总领事代理(领事)。1944年任汕头领事,因要赴广州出席会议,搭乘了日本陆军的飞机,途中遭美国飞机袭击而死,被迫升为总领事。

结 语

外国驻汕领事不是个重要的职位,故在外交界鲜有显者。但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领事报告,特别是英国的报告保存比较完整,年

月日准确,为我们重建汕头地区的近代史提供了较可靠的史料。

据 1940 年 10 月的日文资料:此时仅英、美、法、荷、日五国在汕头设有领事馆。而曾景辉主编《最新汕头一览》(汕头,1947 年)一书无领事馆记载。这说明,同厦门一样,驻汕德国领事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战败而撤销;英美两国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因为是日本的敌国而撤去;法国则为维希傀儡政府,无暇远顾国外,何况汕头;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战后日本使馆被撤销,而英美两国 1947 年尚无暇恢复,加之国民党政权形势不妙,尚待观望,不久全国解放。所以蔡先生的“这些外国领事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都被撤销”之说是根据内地情况的推断,并不准确。

注释:

①科阿特斯(P. D. Coates)著:《中国领事们》(China Consuls,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490 页。

②见在汕头传教达 45 年之久的英国长老会的汲约翰(John Campbell Gibson)所著:《华南传教问题与传教方式》(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1901 年)

③见《地区研究系列》(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爱尔兰大学出版社, 1971 年,共 42 卷),第 10 卷,第 413 页;第 11 卷,第 145 页;第 8 卷,第 527 页;第 18 卷,第 503 页。另见在汕头海关待过的英人皮丕(Paul Henry King)所著《在中国海关: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伦敦, 1924 年),第 39 页及第 2 章和第 3 章。还可参见英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s Frederick Mayers)所著《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伦敦, 1867 年),第 235 页。

④汕头伪市长许少荣编:《汕头事情》(台北,昭和十五年),第 19 页。

⑤《外务省の百年》(东京),下册,第 1511 页。

⑥《中国绅士录》(东京,1943 年),第 52 页。

从夏衍追忆南强书局 的一封信谈起

陈梦熊

1930 年至 1932 年间,夏公曾在虹口区唐山路 685 弄,即近舟山路的业广里居住过。而 30 年代的南强书局也正开设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公益坊 38 号,这是一家中型的进步书店,曾与“社联”和“左联”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夏公曾在这家书店出过好几种书,与主要编校人员也有过交往。为此,笔者在 80 年代末,着手调查、搜集这家书店的史料时,曾给夏公发信。1990 年,夏公已是 90 高龄,仍亲笔复信,详告他所知道的该店情况。这种不辞辛劳,高度负责、认真的精神,令人敬佩。现将这封弥足珍贵的复信抄录如下:

梦熊同志:

四月二日来信收到。关于南强书局的事,我也只知大概,不了解具体情况,因为这家书局成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的破坏,党员之间有严格的纪律,大部分人写文章和相互间都用笔名或代号,所以你提的那些人名,有的我知道,有的则完全不知道。例如林伯修的本名是杜国庠,我是抗战前夕才知道的,我用夏衍这个笔名,当时连周扬、于伶也不知道。地下党有一条纪律,相互之间除工作上的联系外,

连住处也是保密的。

关于南强书局,表面上是“私营”书店,实际上是党员(主要是广东潮汕、海陆丰一带彭湃同志领导下的文化界的党员)集资办的。林伯修、洪灵菲、王鼎新等都是潮州人,也都是太阳社社员,所以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太阳社的。我只知道主持这家书店的是王鼎新,出书主要由林伯修负责,三〇年七月“社联”成立后,书店即归“社联”领导,有一个党的支部(或党组)。我译的《新兴文学论》等,都是经过林伯修的介绍,在南强出版的。三〇年到三三年之间,类似南强的进步书店很多,如陈望道先生办的“大江书铺”,太阳社办的“春野书店”等等。至于新知书店、读书与生活出版社等,则是一九三四、五年才开办的(也是“社联”所主办的)。

你提问的那些人名,有的是真名,如熊得山、宁敦五、钱铁如等,这些人的情况可以查一查《辞海》或《中国人名辞典》,——你不妨请教一下上海文管会的方行同志。至于其他用假名或笔名的,那么恐怕很少有人能知道了。“社联”老一辈成员,许涤新同志去世后,存世者只有李一氓同志一人了。

我介绍你读一读许涤新同志的回忆录:《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市上已售完,可能上海图书馆还有。此书谈到“社联”及林伯修同志。还有,最近我给《收获》写了一篇《“左联”六十年祭》,三月号,对当时的大气候及社联的情况,可供参考。

匆复并致

敬礼

夏衍

四、五

又,柯柏年也是“社联”成员,他是杜国庠的弟弟。

从上引复信中可以看出,夏公对这家店并不太了解,但他还是

认真地作了追忆。这家书店确实成立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具体地说是1928年夏天。表面上是“私营”,实际上是广东潮汕地区文化界党员集资创办,这却说对了一半。至于说是由太阳社办的,那当然是外界的传误。根据我后来的调查得知,它确非“私营”,而是由邓演达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人陈卓凡、王鼎新所创立。由于陈、王与共产党人彭湃、杜国庠都是留日同学,共同组织“赤心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共同经历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二次东征,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拥护革命,积极反蒋,于是走到同一阵线上来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陈卓凡接受杜国庠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1928年3月,陈在离任龙溪县长后,随即去印尼,撤回其父留在印尼的全部股份,并向华侨亲友招股,筹集资金4万余元,作为创办这家书店的资金。翌年一月,他被股东推举为这家书店的董事长。他便聘请同乡、同学兼同志的王鼎新(化名王子瑜)任经理,李达为总编辑,杜国庠(化名吴念慈)、柯伯年(原名李春蕃)为编辑兼撰述,许美勋(又名许峨)、冯铿(原名岭梅)夫妇任校对,沈端先(夏衍)为特约撰述。这就是书店的全班人马。特别要介绍的是王鼎新、杜国庠和冯铿三位。

王鼎新,又名王心民、王慎名。广东澄海人,生于1894年,比陈卓凡长4岁,是陈的亲密战友。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爱国运动。留日时,参加“赤心社”。回国后,曾创办《时报》,任总编辑。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王鼎新出任澄海县教育局长,聘杜国庠任澄海县中学校长。翌年一月,因杜调任潮安省立金山中学校长,他又接任澄中校长,重用了中共党员教师李春蕃(即柯伯年),团结师生,投身学校改革和社会革命。期间,还与杜国庠、李春涛、李春蕃到汕头社会科学院兼课。这是中共创办的学院,附设

在私立震东中学内。后来,他接受周恩来的指示,改组国民党澄海县党部,吸收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改变了该党的组织成份。所以他是位与我党有着长期合作经历的民主人士。在大革命失败后,王鼎新与陈卓凡前后逃避香港。1928年,陈任龙溪县长时,王任漳州训政人员养成所所长,4个月后停办。应陈之聘,王鼎新担任了这家书店的经理。他虽系经理,不但管营业,还兼编辑,联系作家,有时还跑印刷所,是个什么都做的当家人。实际上董事长陈卓凡将这家书局都委托给他经营了。他不是“左联”成员,也未参加太阳社,但是十分同情革命,对左翼进步人士竭诚地支持和照顾。此外,他在书局还参加了《新术语辞典》、《经济学辞典》的编写工作,这两部辞典都是与杜国庠、李春蕃三人合编。正如夏公复信中说“主持这家书店的是王鼎新”。王鼎新主持书局长达8年之久,直到“八·一三”日寇占领华界,北四川路处于炮火之中,书局财产无法搬出,他才被迫迁去法租界避难,南强业务也宣告结束。

杜国庠,笔名杜守素、林伯修、吴念慈等。广东澄海人,生于1889年,比王鼎新长五岁,留日同学,后又同事,关系非常密切。他幼入私塾,后入县城数学传授所,学习现代知识。留日时曾入京都帝大政治经济科,毕业时获经济学士学位。当时,杜听了河上肇博士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确定了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当时,他担任了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大学留日同学会会长,与反动的日华同学会作不懈的斗争,一直遭到日本特务的监视。1919年杜国庠和李大钊任教北京大学,并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校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之后,他与谭平山、李春涛等创办了《社会问题》,仅出一期,即遭查禁。1924年列宁逝世,杜国庠编印了《列宁

逝世纪念册》,广为散发,影响很大。据郭沫若回忆,当时杜国庠与李春涛合写文章,发表在《孤军》杂志上,又参加了孤军社开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结果只有郭沫若和他主张实行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他人都持相反态度。1925年,杜国庠返乡任澄海县中学校长,后调任潮安金山中学校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因事去了汕头,得幸于免。“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后,他闻讯立即从家乡赶来汕头,与周恩来相会,并欣然接受周要他出任潮阳县长的要求,同时向周提出入党要求说:“目前是革命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应吃苦,我希望党允许我加入,给我更多的教育。”周高兴地答应提交市委讨论。然而,当杜国庠准备往潮阳赴任时,形势逆转,潮汕革命政权仅存七日,便被反革命势力摧毁,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同时打听彭湃消息,也无结果。幸在农民帮助下隐蔽10日,潜往香港。1928年1月,杜国庠由香港来沪。2月,由阿英、蒋光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先与洪灵菲、戴平万同住北四川路底鸿庆坊,后迁入北四川路春江里54号。不久,应陈卓凡之邀,入南强书局当编辑兼撰述。此时,他曾参加太阳社,组织我们社,从事左翼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左联”的筹组活动,组织“社联”,担任党团书记。正因为这样,他联系了不少进步学者和作家,绝大部分左翼进步书刊是经过他的手而由南强书局出版的,所以夏公复信中说:“出书主要由林伯修负责”。换句话说,杜国庠是这家书局的实际上的编辑部主任呢!可惜在193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三次遭到敌人破坏时,他与书记黄文杰,中央文委田汉等36人同时被捕,从此脱离了南强书局。

冯铿,原名冯岭梅,1907年生,原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广东汕

头的一个书香之家。中学读书时已显露了文学才华,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和文章,是位爱国学生运动中的“主战派”。在大革命时期,她四出奔走,热烈欢迎、慰劳东征军入汕,经常排练和演出话剧,为支援上海“五卅”罢工工人筹款募捐,可说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将她推上一条动荡曲折的生活道路,使其更深刻地思考人生。她流亡乡间,几经风险,幸获农友的掩护。1928年春,冯铿同许美勋到澄海教书,与当地巨族豪绅的姨太太、县立女校校长等旧势力发生冲突,掀起学潮,震动了整个县城。冯铿与她的师生另立“东风学校”,但不久归于失败,不得不匿居于潮安庵埠友人陈若水的“亦园”。1929年元宵节,冯铿与许美勋一起到了上海。顾不得海轮颠簸之苦,顾不得居处未及安置停妥,即走到南京路上。这个“五卅”运动的故地,使她心潮澎湃。于是,第一个自编自演的以“五卅”运动为题材的话剧在支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募款大会上献演了。冯铿初到上海时,与许美勋在南强书局的亭子间里。她在持志大学(后又进复旦大学)英语系读书,后因经济拮据辍学了。在南强工作时,由同事杜国庠、柯伯年两人介绍,于该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领导下,投入了上海的地下斗争。冯铿经常在午夜,去北四川路一带用粉笔在电杆上书写标语。由于近视使她显得很吃力,书写时好像在嗅着电杆,一面还要顾前顾后左右,与望风的同志呼应。刚参加地下斗争时,开头不免提心吊胆,但慢慢地便习以为常,处之泰然,而且变得老练了。她学会了地下活动的很多常识,胆大心细,应付自如,甩掉“尾巴”、“捉迷藏”成了拿手好戏。有次巡捕和包探突然“抄把子”(拦路检查),冯铿刚巧挟着一大卷苏区课本的插图原稿要去制版,退避不及。她便以攻为守,显出赶着办公事的样子主动挤近前来,终于蒙混过关。

这固然是出于急智和老练,但根本上还是出于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据许美勋回忆说:“当时我和冯铿住在南强书局的亭子间,我们同在‘左联’,便把这个亭子间兼作交通站,有不少相识的,不相识的同志来来往往。有时上街回来,推开门,只见桌上床上甚至地上,常有书函、文件、书籍等。我感谢新兄(指王鼎新)的掩护、照顾。”又说:“阿英(钱杏村)、光(蒋光慈)、乃超(冯乃超)等经常来南强,新兄都竭诚招待。”“新兄未参加‘左联’,但实际上对‘左联’从间接上尽了好多力量。他对我和冯铿百般支持、帮助,亲如兄弟,他常鼓励我俩尽力为革命文艺工作,在书局工作只作掩护。”冯铿就在这家书局的掩护下,一直为党工作到1931年1月18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2月7日午夜与其他战友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成为鲁迅撰文所悼念和表彰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至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强书局至少有杜国庠、柯伯年和冯铿、许美勋四位中共地下党员,这就可能如夏公复信中所说:“有一个党的支部(或党组)”,“归‘社联’领导”。王鼎新虽系党外人士,也是同情革命、支持“左联”,甚至是“左联”成员,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清楚的。由于这些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是经过革命锻炼和有实际革命斗争经历的,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退潮时期,他们开设这家书店是要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击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也就是实践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因此,它绝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书店,而是有着政治上的宗旨和目的的。

再从这家书店的出版物和著译者看,也可以体现它的出书宗旨和目的。在大约近200多种书刊中,主要是文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而其著译者大都是“左联”和“社联”成员。“左联”成员有:阿

英、夏衍、杨骚、白薇、马宁等。“社联”成员有：杜国庠、柯柏年、彭康、李一氓、邓初民、吴亮平、杨贤江、熊得山、宁敦武、钱铁如和王哲民等。此外，还有施复亮（即施存统）、许德珩（即许楚生）、李华、秦明等等。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著译有杨贤江即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柯柏年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和钱谦吾（钱杏村）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以及夏衍译《伟大十年间文学》、易坎人（即郭沫若）译、美国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等。尤其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初版不久就流入苏区作为教本，现存1930年8月印刷的闽西列宁师范暑期学校讲义，名为《教育学》，实则是《新教育大纲》的节印本。又如郭化若在《新教育的教学法·序言》中说：在延安清凉山边的学校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但“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答教育问题的。”足见，它在延安也有流传，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1930年春，肖山的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曾将《新教育大纲》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同学们纷纷先睹为快，争相阅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至于其他理论和文学书籍，较多被某些中学，或在与“左联”、“社联”有关涉的读书会、座谈会上，作为进步青年的阅读材料，甚至有被誉之为启蒙老师呢！

国民党政府对南强书局的出版物是密切注意的。在1930年《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颁布以后，就查禁了南强书局20种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书籍，其中有夏衍（沈端先）译《新兴文学论》、钱杏村编《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施复亮《社会问题大纲》和吴黎平《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1932年，上海出版业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出版法的实施，发表了《请愿书》，刊于《中国新书月报》第二卷第一号。在《请愿书》上签署的有商务、中

华、世界、开明、北新等50家，南强书局亦列名其间，强烈地表示反对，要求废除出版法和细则，以保障出版自由的神圣权益。

南强书局确是屹立在30年代文化反“围剿”斗争前哨的一块红色出版阵地，它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虹口地区活动的一个据点。它为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鲁迅曾经批评过某些出版物中译文上的差错，但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它面临着敌人的压迫和摧残，毫不退缩，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和使命。尤其可贵的，它是由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人所创办，与共产党人长期合作经营，团结奋斗，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业绩。它体现着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也是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同前进的一个范例，它在虹口区，以至全市、全国都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应当总结和发扬。

最后，附带说明夏公复信末尾的附言：“柯柏年也是‘社联’成员，他是杜国庠的弟弟。”柯柏年确是“社联”成员，但不是杜国庠的弟弟，而是李春涛烈士的弟弟，柯原名李春蕃。由于他与杜国庠长期合作，相处甚好，故有此传误呢！

1997年7月27日

写毕于梅陇新居南窗灯下。

汕头港引航话旧

沈饶生

在美丽的汕头港湾,当看到外籍轮船在引航员的引领下徐徐进港、外轮前桅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每每勾起我对汕头港一些往事的回忆。

按照国际惯例,一些进出它国开放港口(对外宣布为自由港外)的外轮,主权国家有权对船只实施强制性引航进港。这是一项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重要措施。但是,在汕头开埠至今的130多年历史中,引航权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约80年之久,在汕头港的引航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潮海关”于公元1860年1月设立。从此,汕头港的全部管理权都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海关所掌握,关内的高职位官员都为外国人占据。

汕头港开港后引航管理事务由海关理船厅属下的港务课负责办理,引航员须经港务课测验合格领得证书方能执行,引航费率也由港务课制定。引航员一直由外国人包办,绝不让中国人插手。当时海关对进出港船舶并不实施强制引水,而是在船长需要时提出申请才由港务课指派引航员出海引航的。在汕头港内亚细亚石

油码头附近和妈屿两地都设有引航站、小码头、小型避风港、修船排,验潮标尺及住宿房屋等。

有关汕头港自开港起至抗战胜利80多年中,引航业务在海关的管理下,港外主要航道的变化如何?有多少名外籍引航员在汕头执过业?引领过多少船舶?发生过什么事故等历史资料,我一直多番用心,所获甚微,有待今后关注这段历史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以补此空白。现在有历史价值可以记下的,是当时(1930—1940)受雇于外国人当引水船船长的陈荣(以后是港务局职工)的回忆:“在汕头港干到最后的二个外国引航员是英国人伍德(CAPT. WOOD)和司笃卡(CAPT. STOCK)。他们都在日军突袭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1941年12月7日),被日军俘虏解往香港集中营囚禁。当时他们二人的年龄都已60多岁了,以后情况不详,相信都已作古了。”

在潮汕沦陷期间(1939年6月至1945年8月),汕头港在日军控制下,除了日军船舶之外,绝少其他船只进出汕头港,引航工作陷于停顿。

抗战胜利后,汕头港的对外运输逐渐恢复,但海关港务课并没有对引航事务进行管理,除了进港船只的泊权外,任由各国船舶进出港。极个别对港口航道不熟识的船舶需要引航时,则由船舶代理行临时雇佣有经验的沿海小轮老船长去引航。因为他们不是正式引航员,就难免有时要出事故,比较突出的就是“夏利士轮”在港内碰坏了海军码头,造成轮船船头碰穿了一个大洞,码头被碰开一个缺口,90支码头钢筋水泥桩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轻重伤,损失不小。

1945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引水法令,成立了“交通部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宣布全国各对外开放港口都应建立引水管

理机构,实施对外轮进出港口的强制引航。尔后,广州方面相应成立了“交通部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粤桂区办事处”。处长由当时的广州航政局局长卢逢泰兼任。

1946年冬,粤桂区引水办事处委派霍远昌为汕头港引水分处主任,负责筹办建立汕头引水分处事宜。经过霍远昌的多方努力,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罗置了具有引航员资格的原海轮船长梁文华、黎培根和沈饶生等3人到广州航政局申请引航员考试,均经考试合格后由中央交通部核发引航员证书。区办事处拨发了开办费,在香港购置一艘现成的出海快速游艇。为使其能适应于中浪条件下在汕头港外引水锚地安全接送引航员的要求,经引航员们提出修改意见,修建工程由铜锣湾船厂承包。在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于1947年3月8日上午,由分处主任带领,乘自己的引水船,从香港出发,由引航员轮流驾驶,中途在汕尾港一宿之后,翌日中午安全到达汕头港内。

1947年3月20日成立了“交通部全国引水管理委员会粤桂区办事处汕头分处”。并宣布对一切外国船舶进出汕头港实施强制引水,公布了汕头港引水管理办法及费率规定,从此结束了自开港以来引水由外国人包办的历史,维护了国家港口主权的尊严。

当初汕头港引水分处设主任1人,由上级委派霍远昌担任,下有引航员梁文华、黎培根、沈饶生3人,办事员4人,工友2人,引水船1艘,船员4人,一共14人,地址在现已改建为汕头港安全监督局的原址。

1948年1月1日起,“汕头港引水分处”归并于“广州航政局汕头办事处”管理,原分处主任霍远昌调回广州,另由汕头航政办事处派詹德钦为引水分处主任,其他人员没有变动。

1948年5月份起,汕头港的引水事宜又奉上级命令改由航政

机构管理,并在引水费的全部收入中提解6%缴交汕头航政办事处作为管理费,引水业务则由引航人员另设引水业务所办理,其全称为“广州区引水辅导委员会汕头港引水业务所”,主任由上级指定引航员沈饶生兼任。引水费方面规定60%为引航员所有,40%为业务所办公费。引航员方面梁文华自行辞职回香港当船长去了。后上级派来了引航员2人(黄文田和林木屏),于是引航员有4人,一直到汕头市解放。

在解放前,汕头港口的条件和引航设备都很差:港外主航道中的一段浅滩,大潮低潮时水深只有13.5英尺,而且是硬砂底质,吃水在15英尺以上的船只都要候涨潮时进出港,没有夜航灯标设备,遇到有些吃水较深的船只必须争取在夜间高潮过浅时,只有在航道重要转折点用小木船预先点灯作临时标灯,否则无法引航;港内航道任由渔船到处下钢锭泊捕鱼,无人管理,引水船经常要兼做清道工作,这些都增大了引航工作的困难。尽管如此,在1947年3月至1949年10月的2年多中,在引航员们的认真负责、谨慎操作下,从未发生过大小事故,做到安全引航。

汕头市解放前夕,被我人民解放军击败南撤的国民党胡璉兵团以及在各地强掠的壮丁共约5万左右人,从1949年10月中旬起陆续涌入汕头市,分批乘运兵船逃往金门和台湾。全市陷入混乱恐慌状态。10月12日有2名国民党军官来到引水业务所下达上级命令:“不论何时,运兵船只需要引水时,应立即派引航员引领,如敢违抗,后果自负!”虽来势凶猛,但全体员工都不为所动。因为他们事先在沈饶生主任的号召下,经过多次会议商妥,大家思想认识一致,决定不论情况何等险恶,都要照原定计划,尽力把全部引航设施和人员保全下来,迎接解放。

从10月13日至21日那段紧张日子里,每天最少都有10艘次

运兵船进出港,引航员都能勉力应付,度过难关。21日早林木屏引航员引航完一艘万吨级自由轮出港后,在回港途中,察知港内仅存有2艘船尚在装兵。这2艘船是招商局的,船长都是林木屏认识的,在那几天内曾来过二、三次,都能自己引航,肯定这最后两艘船是不需引航的。基于林木屏这一正确估计,沈饶生当机立断,令引水船船长吴大第,将引水船驶往岩石宫鞋礁西侧的预选地点,将船底凿穿一大洞,使海水尽速入舱,让船体沉没水中,使这条当时港内最坚固、时速最快(15节)的出海引水船得以保存下来,不被劫走。同时对于引水所内的档案、机器备件、燃料等也由已分工的各负责人员进行疏散保管,并宣布从中午起停止办公,留下2名工友看守。引航员和职员各自寻找亲友隐匿,不要留在自己家中,以保安全。至此,全部护产工作宣告顺利完成。

“1950年10月24日,汕头市在新华戏院举行庆祝市解放周年纪念庆功庆模授奖大会。驻汕部队首长,地、市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大会由市长谢育才主持,并向汕头市解放时有显著贡献的人员颁奖,沈饶生被授予有功奖状。”

1949年10月24日汕头市解放,25日成立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6日,军管会属下的公用事业接管部交通处的接管组,由处长林西园率领,对原“交通部广州航政局汕头办事处”和原“广州引水辅导委员会汕头港引水业务所”两个单位进行接管。接管后成立了“汕头市军管会公用事业接管部交通处航政局”,引水业务也并入航政局办理。局主任由交通处长林西园兼任。原有的引水所人员(除引航员黎培根自动离职外)全部被留用,在局主任的统一领导下,恢复引航业务(后来奉交通部命令建立汕头港港务监督,引航业务由港务监督负责管理)。

在人员安定之后,航政局立即组织力量把凿穿船底沉没水中

而保存下来的引水船只打捞起来。机器经过10天浸在海水中,必须整机拆洗,受浸电器都用备件换上,船底穿洞补固,全船内外油刷一新。经过员工们自己动手,日夜奋战,仅用7天就全部修复,驶回汕头海关避风塘内备用。在解放前夕(10月22日)汕头港内所有比较好的小汽艇——特别是海关的几只很新型的辑私、交通快艇都被国民党军撤退时劫走,只有这艘原来就是港内最快速的引水船幸存,而且焕然一新。

至此,汕头港引航事业获得新生,跨进了一个新的里程。

汕头的天主教区和 外来基督教新教述略

房建昌

汕头的天主教首先是清朝初年就有传入；其次主要是近代，也就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而来的。在汕头传教的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

中文记述，基督教多照中国的习惯仅指基督教新教。实际上，广义的基督教不但包括了天主教，也包括了东正教等古今一切信仰耶稣基督的派别。简单地说，天主教与新教的基本区别在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在中国称作神父和修女，神父可抽烟喝酒，但不可结婚，以罗马教皇为最高宗教领袖，一旦来到中国，非因教务，将在华终老，不可返乡，而且要求从语言及服装上从当地之俗；而新教神职人员称作牧师，不可抽烟喝酒，但可结婚，没有世界性的类似教皇的宗教领袖，在华有定期的回国休假制度。在华的天主教早期在农业区多通过农业手段来拉拢中国农民，使灾荒频仍的农民得暂缓饿毙之忧，特别注重收留被弃女婴，所以比以教育为主的新教在某些方面有更胜之处。

1848年，法国巴黎天主教外方教会建广东和广西教区，1868年，内分广东分教区和广西分教区，1875年，两分教区各自独立为教区。1850年，神父们开始在潮州地区传教，1870年传入汕头市

区。1908年，都必师神父(Antoine - Adrien Douspis)在中马路盐埕街附近主持建成一座面积400平方米的旧式贝灰结构教堂，名若瑟堂。他1871年11月8日生于法国上卢瓦尔(Haute - Loire)省的勒皮(Le Puy)教区的卢瓦尔河畔的莫尼斯特罗尔(Monistrol - sur - Loire)堂区，1898年6月26日祝圣，同年5月11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教区。

解放前存在、解放初期被取消的汕头天主教教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e Swatow)是个代牧区，属法国巴黎外方教会(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简称 M.E.P.)传教区，乃1914年4月6日从同会广东教区(V.A.de Caton)分出，同年7月17日被任命的首任代牧主教(Vicaire Apostolique)是实茂芳(S.G.Mgr Adolphe Rayssac)，他1866年11月4日生于法国洛特(Lot)省的卡奥尔(Cahors)教区的卢南(Lunan)堂区，1887年8月加入法国巴黎外方教会，1889年9月21日祝圣，同年12月23日离开法国，翌年初抵华，被分配至广东教区。

1918年，龚善传神父(Joseph Constancis)在外马路今107号建成主教楼。他1789年2月5日生于法国多姆山(Puy - de - Dome)省的克莱蒙(Clermont)教区的克莱蒙费朗圣皮埃尔莱米尼梅斯(Clermont - Ferrand p. St - Pierre - les - Minimes)堂区，1902年2月22日祝圣，同年4月2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教区。

1919年时，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潮州府、嘉应州及长宁、陆丰、龙川、连平、和平五县。负责汕头的是罗神父(Francois - Felix - Marie Roudiere)，驻汕头的是和敬谦神父(Charles Vogel)，下有教民约700人。

罗神父1861年9月13日生于法国东比利牛斯(Pyrenees - Orientales)省的佩皮尼扬(Perpignan)教区的埃尔讷(Elne)堂区，1884

年3月16日祝圣,同年4月8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

和敬谦神父1878年12月3日生于法国当时被德国吞并的上阿尔萨斯(Haute - Alsace)省的斯特拉斯堡(Srasbourg)教区的比施维尔(Bischweier)堂区,1897年加入法国巴黎外方教会,1901年6月23日祝圣,同年7月24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

1923年时,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潮州府、嘉应州、惠州府及陆丰、龙川、连平、和平四县。负责汕头的是罗神父和退休的卫神父(Charles - Alphonse Guillaume),驻汕头的是和敬谦神父和华人林欣然神父(Francois - X Lim),教民增至830人。

卫神父1844年5月26日生于法国默尔德 - 摩泽尔(Meurthe - et - Moselle)省的南锡(Nancy)教区的热贝维莱(Gerbeville)堂区,1869年6月29日祝圣,翌年1月31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和广西教区。

1925年时,负责汕头的是娄神父(Joseph - Marie - Jean - Baptiste Le Corre)、卫神父和退休的华人苏芳济神父(Francois So),驻汕头的是和敬谦神父和林神父,下有教民850人。1929年驻汕头神父同上,教民增至900人。1931年只去了娄神父,教民数仍同上。

娄神父1873年9月15日生于法国伊尔 - 维兰(Ille - et - Vilaine)省的雷恩(Rennes)教区的勒捷(Retiers)堂区,1896年6月28日祝圣,同年8月26日离开法国,被分配至广东。

1933年时,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潮州府和陆丰,负责汕头的仍是娄神父,驻汕头的是退休的卫神父、和敬谦神父、华人黄伯禄神父(P. Vong)和苏神父,教民增至1030人。

1935年5月1日,和敬谦被任命接替实茂芳主教职,同年12月9日正式接任。1941年6月17日,实茂芳在法国蒙伯通(Montbeton)去世。

1935年,负责汕头的仍是娄神父,驻汕头的是蓝神父(Mndre Lambert)、黄神父和苏神父,教民增至1500人。

1937年时,汕头教区范围包括汕头、潮安、澄海、南澳、饶平、揭阳、丰顺、潮阳、惠来、普宁、陆丰,负责汕头的仍是娄神父,驻汕头的是蓝神父和林神父,苏神父驻澳头,教民仍为1500人。

1941年时,负责汕头的仍是娄神父,驻汕头的是蓝神父、袁中希神父(J. Yuan)和吕神父(Luis Desruelle),驻澳头的是华人林以忠神父(C. Lim),教民减至1100人;驻南澳的是华人陈迪民神父(P. Tchen),下有教民100人。此年汕头教区约有人口500万,有天主教徒32070人,教堂27座,外籍神父18人,华籍29人。

圣于尔絮勒天主教修女会(Sainte - Ursuline)十六世纪创建于意大利。1922年7月,罗马联盟的于尔絮勒修女院(Ursulines[de L' Union Romaine])在汕头创建,主要工作是收养女婴和办学。1925年时负责人只有罗萨勒嬷嬷(Sr Marie du Saint Rosaire),正培养修女3人,要求入会华人女子2人。1929年正培养修女8人,新入会华人女子4人。1931年时,该修女会已在潮州和河婆设分院,汕头负责人换成了克饶克丝嬷嬷(Mere Marie du Saint Croix),1931年共正培养修女9人,另有华人女子3人(统计包括两分院,下同)。1933年除克嬷嬷不在外,其余情况未变。1935年时汕头负责人换成了伯纳德嬷嬷(Mere Marie de Saint Bernard),加上华人女子3人,共15人。1937年正培养修女3人,要求入会华人女子2人。1941年正培养修女11人,另有华人女子3人。

多明我会为天主教一大教派。1937年德国的“汕头多明会堂(Dominican Procuration Swatow)”建成,1940 - 1941年间,负责人为韩神父(Edmond - M Hoyer),下有戴神父(Thaddee - M Nowak)。该会堂属该会福建汀州教区,两神父亦从该教区来。可以看出,该会是

借日本人力量在汕头存在的。由于法德均为日本“友邦”，所以其在汕头宗教势力日占时未受损。

汕头天主教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今日汕头市，史料较多，限于篇幅，仅略述如上。

1930年时，在汕头传教的外国新教差会只有4个，势力最大的派别是大美国浸礼会差会(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缩写 ABFMS)，该会华南区驻汕头，负责人是彭维牧师(A. H. Page. 1906年来华)，此时夫人与他在一起。该会1860年传入汕头。驻汕头的还有1896年来华的包立基(C. E. Bousfield. 夫人与他在一起，1893年来华)、1905年来华的姚宣德(A. S. Adam)夫妇、1908年来华的马便垒(Ben L. Badker)夫妇、1923年来华的布朗医生(Dr. Velva V. Brown)等。

其次是大英长老会(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缩写成 EPM)，汕头传教点负责人是华河力牧师(H. F. Wallace. 1903年来华)，此时夫人与他在一起(1924年来华)。该会1856年传入汕头。(据《潮汕百科全书》“基督教·长老宗”，该教派最先来潮汕传教是1848年德国巴色会的黎力基传教士。——编者)驻汕头的还有1902年来华的德怀情(I. E. Brandre)小姐等。

北美孟诺兄弟会会议外国传教会(Foreign Mi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Mennonite Brethren of North America. 缩写 MBRC. 总部在美国)，汕头传教点负责人是迪约翰牧师(J. S. Dick. 1920年来华)，此时夫人与他在一起。孟诺(Menno)派为1523年起源于瑞士的新教派别，反对婴儿礼、誓约、就公职和服兵役等。驻汕头的还有律淑惠(S. Richert)小姐(1921年来华)、霍保廉(Pauline Foote)小姐(1922年来华)和李凤彩(Adelgunda Priebe)小姐(1926年来华，从厦

门鼓浪屿来)。

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 Day Adventist Mission. 缩写 SDA)当时在汕头传教的外籍牧师仅有钮基力牧师(I. B. Newcomb. 1906年来华)和夫人。

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缩写 YMCA)在汕头的仅有负责人高美克牧师(Samuel M. Cowles. 1918年来华)及夫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英美成了日本的敌国，在汕头的新教势力因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传教士不是被驱逐，就是被监禁。日本投降后虽力求恢复，但不几年就解放了，外国传教士从此离开。

1945 年以前日本人在汕头 情况记述

房建昌

日本对潮汕地区的军事侵略和我方的抗日活动,我们已大致了解,但近代日本在潮汕地区的经济及文化活动,以及日系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其中的作用,我们了解不多,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日文史档。而日文史档中汕头市伪政府及其主要人物、日伪办的《粤东报社》、汕头的日本人协会(后改名为汕头日本人居留民会)、博爱会医院、日本东瀛学校、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台湾银行汕头支店、在潮汕地区的朝鲜人及台湾人、台湾总督府与潮汕地区等史料,都值得发掘。故在此笔者据在北京所见日本驻汕头领事馆档案和其他有关日文史料做一大致的叙述。

一、日军占领汕头前日本人的情况

1903 年华侨投资的潮汕铁路开始筹备,股额定为 300 万元,素居台湾的厦门人林丽生认了 55 万元。由于英商怡和洋行估价较高,林丽生乃请日本三五公司重估,仅为 150 万元大洋,比怡和洋行约少 40 万元大洋,遂让三五公司承包了潮汕铁路的铺设工程,用的当然多是日本内地人,在技术管理方面聘请了小宫山市之进、竹下平三郎、浅村幸一等人前来协助。1906 年 10 月全部工程干线完工,同年 11 月 16 日正式通车,号称时间短、工程优、造价低。工

程虽结束,但日本人仍留守了一段时间。1907 年 6 月时在驻汕头日本领事馆登记的日本人达 170 人,至 1915 年 6 月减至 123 人(一说 122 人)^①。

据 1915 年 8 月 2 日日本驻汕头领事馆的报告,这两年(均为 6 月)日本及台湾人(大部分住在汕头)的职业及人口情况为^②:

日本人 职业	户数		男		女		男女计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官吏	2	5	7	7	3	11	10	18
布教使	1		2				2	
教师	1	1	1	1		1	1	2
会社员	2	2	8	3	1		9	3
银行员	1	2	3	8		6	3	14
写真业	1	1	1	1	1	1	2	2
杂货商	4	2	5	12	3	4	8	16
旅馆兼料理业	1		1		1		2	
旅馆兼杂货商	1	1	1	4	1	3	2	7
运送业	1		1				1	
卖药业	4	1	7	6	3	2	10	8
玻璃制造业	1		9				9	
海产物商	1		2		1		3	
医师	1	1	1	1	1		2	1
齿科医		1		1		1		2
洋服裁缝业		1		3		4		7
西服洗濯业		1		2				2

日本人 职业	户数		男		女		男女计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理发业	1	1	1	1	1		2	1
铁道雇佣员	33	7	39	14	32	8	71	22
税关雇佣员	1	4	1	4	1	5	2	9
杂业		1	18	1	12	1	30	2
外国人所雇			1	1		4		5
中国人所雇						2		2
艺妓					1		1	
计	57	32	109	70	62	53	170	123
台湾人 职业	户数		男		女		男女计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1907	1915
布匹商	3		5				5	
银庄业	2	1	2	1			2	1
杂货商	7	3	7	8		6	7	14
杂谷商	4	1	4	1			4	1
席包业	1	1	1	1			1	1
铁道雇佣员	9	7	12	13	7	18	19	31
杂业		1	70	13	5		75	13
鱼种商		1		1				1
茶商		2		3				3
烟丝及杂业		1		2		2		4
柠檬水制造业		1		1				1
通译		1		1		1		2
内地居住者	不明	不明	不明	54	不明	18		72
计	26	20	101	99	12	45	113	144
总计	83	52	210	169	74	98	283	267

从 1909 年至 1913 年,除了汕头,日本人还有在潮州和澄海受

雇的,但 1914 年后就没有了。1915 年的日本人数少于 1907 年,是因为初建铁路时,雇了二十四五名日本工人,后改雇华工,日本工人都回国了。1915 年,台湾人在潮汕及毗邻地区的分布情况为:潮阳 34 人,海阳 14 人,嘉应州 13 人,澄海 3 人,漳州和饶平各 2 人,普宁、达濠埠、陆丰及大埔各 1 人。

1907 年和 1914 年时,日本输入汕头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其次是火柴和药品,汕头的洋药主要来自日本,情况如下表:

品名	1907 年		1914 年	
	数量	价格(两)	数量	价格(两)
绵丝			34841	797859
棉布	110440(码)	8544	373018(码)	31125
绵缩	70944(码)	6387	45472(码)	5502
火柴	1005062(箩,12 打)	251251	1091649(箩)	339503
药		150620		288985

1927 - 1936 年,台湾对汕头输出入贸易额如下表(单位日元):

年份	输出	输入	计	年份	输出	输入	计
1927	4029341	489728	4519069	1932	135541	290662	426203
1928	1438080	420702	1858782	1933	51511	311749	363260
1929	1779659	500197	2279856	1934	501689	307025	808723
1930	1652749	472124	2124873	1935	819767	320898	1140665
1931	1061218	298872	1360090	1936	319131	334810	653941

可以看出,以 1927 年为最高,以 1933 年为最低,这与当时的中日关系有关。

1935年及1936年台湾输出汕头的物资情况如下表：

品名	1936年		1935年		增△	减 (日元)
	数量 (斤)	价格 (日元)	数量 (斤)	价格 (日元)		
活植物		62		22		40
生菜		280		11		269
椎耳	390	780	401	1106	△	326
包种茶	4050	1367	6275	2130	△	763
粉茶			4090	381	△	381
砂糖	302(百斤)	2160	696(百斤)	4716	△	2556
干鱼	194525	29294	435965	78817	△	49523
咸鱼	204930	20203	1918615	206918	△	186715
鱼易	8080	4478	222695	86601	△	82123
干贝	11920	5488	29026	13925	△	8437
海带	21800	812	129000	5161	△	4348
水罐头	520(打)	1764	742(打)	3089	△	1325
挥发油			21250(加仑)	9810	△	9810
灯油及轻油	3975(加仑)	1282	19800(加仑)	6276	△	4993
机械用油	10717	4689	14155	5328	△	639
人参	417	1857				1857
火柴			8193(合)	4420	△	4420
毛丝			756	1400	△	1400
苧麻	2590	881	12977	6337	△	5456
绵织物	553948(码)	112327	694768(码)	121639	△	9312
毛织物	546	801	204	290		511
绢及绢交织物	20422	5703	2540	674		5029
纸类	7632	467	43832	7806	△	7339
煤	1163(吨)	11180	2849(吨)	25995	△	14815
水泥			546	7734	△	7734
坛	113980(个)	1414	156783(个)	1647	△	233
铁	1183	102	15216	209	△	107
铁制品		535		1859	△	1324
通草		139	3328	479	△	340
玩具		54		1904	△	1850
其他杂品		111011		213084	△	102073
合计		319131		819767	△	500636

1935年及1936年台湾从汕头输入的物资情况如下表：

品名	1936年		1935年		增△	减 (日元)
	数量 (斤)	价格 (日元)	数量 (斤)	价格 (日元)		
植物		100		521	△	421
动物		22034		11933		10101
枣	416	61				61
茶	1661	1046	200	188		858
咸鱼	49289	8484	33778	7710		774
盐海月			2984	239	△	239
革枕			721(个)	501	△	501
阿胶	31	25				25
当归	3733	1535	2154	1367		168
漆	60	38	726	703	△	665
黄麻	101259	11866	6253	995		10871
绵织物	338(方码)	87	40(方码)	32		55
苧麻布	545973	126918	452490	148254	△	21336
黄麻布	764977	74754	460057	68823		5931
凤梨布	15459	5281	15990	7985	△	2704
唐纸	392	154	1172	573	△	419
陶瓷器		7304		17908	△	10604
竹材		6465		4372		2093
木材			82(立方尺)	120		120
包席	1600(枚)	89				89
纸伞	3522(把)	2476	2008(把)	1895		581
木制品		372		518	△	146
其他杂品		65721		46261		
合计		334810		320898		13910

另外，台湾对汕头的转口物品输出额 1934 年为 418928 日元，1935 年增加到 580039 日元。而台湾对汕头的转口物品输入额 1934 年为 78512 日元，1935 年增加到 188686 日元，1936 年又减至 7600 日元。

1917 年汕头仅有日本人 94 名，1923 年又增至 135 人。当时由

于抗日情绪高涨,日货受到抵制,日本商人的日子没法过,故留者少。会社仅有台湾银行支店及大阪商船会社出張所,其它以广贯堂(药材及杂货进出口)、幸阪洋行(经营煤炭、药及机械类)及日华洋行(经营药种、染料、洋杂货、机械类及进出口)为主,另有杂货、贸易、旅馆及饮食店等,其势甚微。

汕头日本居留民会 1914 年 11 月计划建东瀛学校,该会(一说为汕头日本人协会)与台湾人于 1915 年 3 月 21 日在汕头崎碌乔林里借房作为临时校舍开设了东瀛学校,由台湾总督府派出教员开课,至年底有男生 21 人,女生 4 人,日本及中国男教师各 1 人。1917 年从台湾总督府弄到了大笔的补助金,于 1919 年 9 月建成了新校舍。1920 年 2 月在市内福安街设分校;10 月,为了方便日本内地人在汕头子弟及台湾人在日本留学设了日语特设科。1922 年 4 月,为本科毕业生设了补习科。1923 年 1 月,在新马路的临时校舍设了分院;10 月,迁至中马路新校舍。1924 年 3 月废止补习科,设兼补习教育的实务科。1928 年有学生 262 人,其中台湾学生仅 36 人。1930 年 2 月用日文专修科取代特设科,并进而增进为程度更高的具有乙种实业学校程度的商科。1937 年 4 月底时训导 3 人,嘱托 1 人。本科 3 个学级,其它学级 1 个。台湾本科学生 71 人,其它 3 人,共 74 人;非台湾华人学生仅本科 1 人。学生几乎为清一色的台湾籍。这时本科已有毕业生 119 人,其他 54 人,共 173 人。至 1937 年度末共接收台湾总督府补助金合计 43.1 万元。1940 年 7 月的资料把该校称为台湾籍民教育机关,位于崎碌外马路,院长为庄司德太郎,经营者为汕头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为梅津昌^⑧。该校的历年财产等情况如下表:

年份	财产			经费(日元)		教员		学生	
	土地建筑	动产 (日元)	合计 (日元)	收入	支出	内地	台湾	台湾	华人
1934	38371	11516	49887	3186(2110)	3949	2	3	43	1
1935	同前	11859	50230	4183(1697)	3174	2	2	52	3
1936	同前	12136	50507	4212(3535)	4189	3	2	52	1
1937	56035	12920	68955	3680(3450)	3680	3	2	52	1
1938	同前	同前	同前	1163(1160)	1163	2	2		

(注)括号内为台湾总督府补助金额。 华人指非台湾籍中国人。

1915 年 4 月 11 日,位于外马路的汕头日本人协会以该协会的一室为教室,开设了汕头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校(附设幼稚园),至年底有男生 4 人,女生 8 人,日本女教师 1 人。1917 年 2 月迁至市内广州街。汕头日本人居留民会又计划在作为东瀛学校分校购入的外马路一块地上建新的汕头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校校舍,1916 年 2 月开工,翌年 9 月竣工。为木造二层楼,有 223 坪,教室 4 间,还有讲堂和养护室等。1936 年 9 月有 3 个学级,3 名教员,学生 20 人,教育费 4844 元,国库补助 3000 元。1937 年 4 月底仅有寻常科,两个年级,有职员 2 人;男生 14 人,女生 32 人,共 46 人。1938 年土地、建筑及动产价值 54578 元。1940 年 7 月的资料称该校为日本居留民会未指定学校。

为了救济 1936 年 8 月汕头地方的台风和大水灾民,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募集了捐款,用其中的余款 4.39 万元拨给 1925 年 2 月 21 日日本人在汕头开设的博爱会医院,以补经费不足部分。但由于抗日的情绪,有的患者不愿来日本医院。1936 年底设有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及齿科。特等病床 4

个、一等6个、二等11个、三等甲级3个、乙级1个,共25个床位。有院长、调剂员、书记长、书记、技手各1人,医长及副医长各2人,共9人。1931年收治病人57855人,1932年为39006人,1933年为148253人,1934年为207141人,1935年为172971人。“七七事变”后该医院曾关闭。1940年7月的资料言该医院位于崎碌142号。该医院的财政状况为:

项目	1937年	1938年
基本金和储备金	40000日元	20356日元
土地建筑	78905	78905

《潮汕百科全书》第273-274页不仅将该医院误列入教会医院,创建年记为1922年10月,而且将博爱会医院名减了“会”字,成了博爱医院。

据日本驻汕头领事馆的统计,在该领事馆登记的邦人(一度专指日本人,后也包括台湾人、朝鲜人,下同)1928年有340人,1933年有436人,但其中的台湾人多住在梅县,在汕头的实际不到半数,所以未组织台湾公会。为了方便,与日本内地人共同组织了日本居留民会,1931年时仍存在。1942年时会长为手冢鼎三,他喜欢野外运动和谣曲,住外马路295号,这里也是他当时任所长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汕头出張所所在地。他还任汕头米谷肥料配给组合长、日本俱乐部会长。手冢鼎三1889年3月生于栃木县,原籍东京。1918年上智大学商科毕业,后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在该社的汉口、大阪和台北支店工作过。1942年8月时会长为筱冈规矩夫。一说1941年7月他就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汕头出張所所长,1942年时住在该出張所内。筱冈规矩夫1895年9月生,冈山

市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15期毕业,后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此前在该社的汉口支店任支店长,曾被推为汉口日本居留民团参事会员。1943年8月时会长为池上一郎。实际上,历史上广东迁居台湾的主要是梅县和潮安人,所以汕头日本人居留民会中的台湾人的祖籍也主要是梅县和潮安,其中不少是在当地出生后去台湾的客家人。

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广东的抗日情绪高涨,1936年1月,中山大学学生抗日救国宣传队来汕,领导当地各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这时的汕头日本领事馆设有警察署,负责潮梅25县、1市和闽西地方8县,共1市33县。这一地区总人口约1千万。汕头领事馆报告,当地抗日情绪早已有之,此时尤烈。同月20日,有华人持枪进汕头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威胁,但未发生别的情况,第二天就出了人命。1月21日,汕头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巡查角田进(1909年6月25日生)中午回外马路的家中吃饭(系租房)后又去上班,走到联和里海旁第七号前遭人枪击,贯穿胸部而死(同日汕头博爱会医院医师田中金治郎的验尸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被住在附近宏昌洋行台湾籍民林生涂发现。日方向我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捉拿凶手。日本海军更欲借机制造事端,派军舰在汕头外海游弋,日本海军十六驱逐队司令官木村还亲赴汕头交涉此事。广东方面十分重视此事,但凶手抓不到,只是赔了款,折合4075日元。同年8月29日,死者的遗属从东京的外务省收到了这笔钱。

角田被杀的翌日,汕头日本领事馆原田领事致电广田外相,言角田巡查生前警察事务精励,成绩拔群,任外务省巡查两年以上,成绩优良,请升巡查部长。第二天广田即回电照准,并赏50元,特赏200元,遗属千元,丧葬费183元33钱予以报销。

汕头日本领事馆还向上报告了 1936 年所谓的邦人被害情况件数(朝鲜人仅 1 人,无事):

类别	内地人	台湾籍民	计
负伤	1	5	6
杀害	1		1
扣留物品	1	22	23
暴行		5	5
扣人		11	11
闯入家中	2	6	8
炸弹投掷	1		1
胁迫	1	6	7
投石	1		1
计	8	55	63

这时,日本海军十六驱逐队司令官木村从广东东区绥靖公署获知在汕台湾人有伪造纸币的窝点。我方怀疑是日方利用台湾人扰乱我国金融秩序。1936 年 9 月 9 日,汕头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接到此情报,即搜查了有嫌疑的 15 户台湾人家,发现了证据,遂做进一步的搜查取证。9 月 15 日,日本警方探知台湾人吴服(和服)商汤阿珍买卖了约 4000 元假钞,遂于同日晨 7 时在一汕头妓楼潜伏袭击,将其当场抓获,从身上搜出了伪造的福建省银行纸币,面值有 5 角及 1 元。

据日本驻汕头领事馆 1936 年 12 月末的统计,在该领事馆登记的邦人情况如下表:

邦人类别	户	男	女	计
内地人	49	64	68	132
台湾籍民	160	356	226	582
朝鲜人	1	1		1
计	210	421	294	715

从事职业:宿屋 1,饮食店 2,医师 3,产婆 1,药种商 2,卖药请负(承包)1,银行业 1,贸易商 6,海产物商 4,杂货商 29,米杂谷商 5,吴服(和服)商 2,酒烟草商 2,酒精中国酒药 4,石油商 1,机械商 1,古物商 2,時計(钟表)商 2,饮料水贩卖 1,船舶业 1,制冰业 1,土木建筑业 1,铁工业 1,瓦斯取付(安装)业 1,共 77 种行业。

据日本驻汕头领事馆 1937 年 4 月 1 日的统计,在该领事馆登记的邦人有 741 人,其中内地 135 人,台湾 605 人,朝鲜 1 人。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日本政府通过在华各日本领事馆急速通知日侨撤退,台湾人和朝鲜人亦在其中。汕头日本领事馆也不例外。该馆还特别召集在汕台湾人,警告他们情况危险,应立即撤走。领事馆向日侨发放了免费撤离证明书,开始分批撤退。日本军舰也来保护,如 7 月 24 日这天上午 11 点半,松冈号开进了汕头港,中午 1 点,吴竹号驶离了汕头港。后一艘驱逐舰与另一艘名速风守的驱逐舰,8 月 12 日下午 5 点保护着载有最后一批撤离汕头的日侨共 432 名驶离了汕头港,目的地是台湾的基隆和高雄港。

这一天的前夜开始下大雨,但日本汕头领事馆山崎领事下令日侨应全部撤走。8 月 12 日晨 8 时,日本人和台湾人冒着大雨将领事馆及警察署的重要文书搬上福建丸,还有日侨本来准备用于在被围困时支撑的食品,正好在船上用,这些东西很多,搬了几次。中国方面派人警卫,以防再出现袭击日本人的事件。中午雨停了,

1点钟搬完。日本人想到他们要放弃经营了40余年的汕头产业,也许再也回不来了,心情十分沉重,场面十分凄惨。但这时还有7名内地人留下,以为断后。还有122名台湾人未走,他们或是配偶为大陆人,或是留居已久,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

留居汕头的台湾人有积极抗日的,如参加台湾人丘念台(1894-1967年,抗战期间任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少将参议)组织的东区服务队,于1939年6月到潮汕前线,当时该队属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因而协助当时在前线的独九旅(旅长华振中)训练由潮汕随部队撤出的青年学生200余人,并做营部的部队政治工作和当地的民众工作。在汕头期间,东区服务队介绍了一位姓林的台籍医生担任独九旅的上校军医。1942年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汕头分会。台湾彰化青年谢敏初抗战时在潮汕参加抗日游击队,保卫地方^④。

二、日军占领汕头后日本人的情况

1941年上海设有日本中南支民团民会联络事务所,据中南支居留民团民会代表者会议的决议,在上海设置联合事务所,1943年10月1日开始在上海民团庶务课内处理事务。1943年12月31日加盟的民团有14个,民会有13个,内有汕头居留民会。1943年11月16-18日,中南支民团民会联络事务所召开了第一回联络会议,但汕头居留民会不知何故未参加^⑤。

上海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大致在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经常有来潮汕地区考察,他们的考察报告(1940年前后的内容为对汕头华侨及钱庄的调查)和日记手稿至今在北京和日本仍有收藏^⑥。

日军占领潮汕地区后,日侨的人数成倍增多。应当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汕头的日本居留民会中也包括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人。为了表示区别,又称日本人为内地人,称朝鲜人为半岛人。朝鲜人中除了一部分经营正当行业外,有相当数量是贩卖毒品的,女的则从事色情业的较多;而台湾人则多为翻译和医生等技术人员。日本人还恶毒地将台湾的流氓甚至是正在服刑的台湾刑事犯送至汕头。这些人多从事毒赌黄行当,他们有日本人做后台,有恃无恐。日本人要让汕头人认为台湾人都是坏人,这样正直的台湾人就会被汕头人疏离,好为日本人所用。在日本占领汕头前夕,汕头当局的确对当地的台湾人,甚至是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十分警惕,暗中监视,以防日谍。还曾将在汕头日本人商店工作的华人指控为日本间谍而枪毙的。有的居住在军事区附近的台湾人还被强行迁离,以为防范。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汕头的日本居留民会随着日本各驻潮汕地区军政机构的崩溃而自然解体,但仍任在掩护日侨撤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日本投降后,潮汕地区日侨绝大多数被遣返回国。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汕头与台湾的特殊关系,汕头的日本内地人和朝鲜人主要是从台湾转迁过来的。

日军侵占潮汕地区后一日文史料记载:汕头一向以抗日根据地、南洋华侨出身地、刺绣工业基地而闻名。“七七事变”前有人口约23万。1939年6月21日日本海陆军协同攻占汕头后,邦人返回者很多。朝鲜人又有新进入者,最多的是从事军妓业的,还有从事渔业和经营杂货商的(汕头朝鲜人时当慰安妇的7人,当女招待的8人,当女佣人的2人,当家庭女佣的2人,从事渔业的2人,杂货商2人),生活都很安定,将来会有较大的发展。当时朝鲜人在汕头的二名为首者均住在安平路永胜街,一位是慰安业主金光洪,年47,原籍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垵下里119号,资产额2.5万元。另一位是从事渔业的高光弼,年44,原籍全罗南莞岛郡化

芦花面芙黄里,资产额2万元。汕头虽称不上是良港,但作为广东省东部的贸易港,会有很大发展。1940年11月1日潮汕地区邦人的情况如下表^⑦:

地名	内地人	台湾人	朝鲜人
汕头	746	1246	31(5户,男7,女24人)
潮安县	62	96	51(4户,男6,女45人)
计	808	1342	82(9户,男13,女69人)

据1941年4月1日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的统计:汕头日本领事馆管内有美国81人,德国48人,英国46人,法国34人,瑞典9人,荷兰4人,葡萄牙2人,瑞士、挪威及其他各1人,无国籍3人共230人。邦人的情况如下表^⑧:

地名	内地人				朝鲜人				台湾人				合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汕头	329	512	379	891	5	7	25	32	531	954	562	1516	865	1473	966
潮州	19	22	25	47	2	5	19	24	40	77	34	111	61	104	78
庵埠	7	7	6	13	1	1	13	14	12	28	8	36	20	36	27
石鼓	1	1	1	2			6	6	1	1	1	2	2	2	7
彩塘	1		1	1					4	7	1	8	5	7	2
澄海	3	2	5	7			1	1	6	9	6	15	9	11	12
外砂									1	1	1	2	1	1	1
南澳岛	3	3		3					11	13	2	15	14	16	2
达濠岛	2	2		2					2	3		3	4	5	
总计	365	549	417	966	8	13	64	77	608	1093	614	1707	981	1655	1095

据1943年10月1日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的统计:汕头日本领事馆管内有德国125人,法国25人,菲律宾7人,泰国3

人,伊拉克1人,共161人。邦人的情况如下表^⑨:

地名	内地人				朝鲜人				台湾人				合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计	户数	男	女
汕头	342	486	385	871	3	2	21	23	482	929	704	1633	827	1417	1110
澄海	2	2		2					6	7	6	13	8	9	6
南澳岛	7	7	2	9					11	11	2	13	18	18	4
潮阳	7	7	2	9					5	5		5	12	12	2
达濠岛	1	1		1					3	3		3	4	4	
潮州	19	19	16	35	1		1	1	44	73	37	110	64	92	54
庵埠	5	7	3	10	1	2	6	8	14	21	10	31	20	30	19
彩塘	2	2		2					4	6	2	8	6	8	2
浮洋	2	3	2	5					2	3	3	6	4	6	5
总计	387	534	410	944	5	4	28	32	571	1058	764	1822	963	1596	1202

三、台湾总督府在日本对汕头渗透、侵略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日本对潮汕地区的渗透上,特别是日军占领汕头之后,台湾总督府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配合日军对华南的侵略,据1938年8月4日内训第五号,台湾总督府总督官房成立了临时南支调查局,以总务长官兼任局长。1939年6月21日日军一占领汕头,台湾总督府就从台湾官民募集了慰问品,准备了巩固日军侵略和用于宣抚的物资,装满了一艘南支航路配属船,于7月1日从台湾启航,来汕头慰问日军。率船的是台湾总督府派出的事务官庆谷隆夫同理事官片寄军儿,另外有一名慰问使。船上还载有原汕头日本人小学校及东瀛学校校长权藤鹤次及职员后藤元吉、木户守一、井ノ口资郎。他们应侵汕日军的要求,做为军嘱托,代表台湾

总督府,于7月10日在汕头开设了日语讲习所,至同年底已办了3期,被迫就学的当地男女有535人。

1939年6月21日日军占领汕头后至同年9月,台湾运至汕头的贸易物资情况如下:米70500斤(价值10237日元),豆类200斤(价值40日元),马铃薯淀粉5262斤(价值920日元),其他谷物及淀粉类96斤(价值31日元),蔬菜渍物1266斤(价值296日元),凤梨(价值12日元),林檎219斤(价值49日元),梨234斤(价值42日元),红茶8斤(价值23日元),砂糖1680斤(价值32587日元),果子1754斤(价值910日元),鲜鱼43650斤(价值6871日元),盐鳟3373斤(价值813日元),其他咸鱼9625斤(价值1753日元),干鳕10435斤(价值3275日元),煎子15909斤(价值4737日元),鱼易14640斤(价值9493日元),干虾818斤(价值475日元),贝柱20斤(价值70日元),海带831斤(价值77日元),味噌1808斤(价值215日元),酱油1918斤(价值531日元),清凉饮料水652升(价值290日元),牛奶2324斤(价值1049日元),蔬菜罐头2972斤(价值1303日元),柑桔类罐头90斤(价值30日元),凤梨罐头243斤(价值84日元),其他果实罐头57斤(价值24日元),鸟兽肉类罐头130斤(价值117日元),鲑罐头31斤(价值19日元),鱼温罐头97斤(价值29日元),其他鱼类罐头295斤(价值121日元),荣螺罐头66斤(价值83日元),鲍罐头1973斤(价值1974日元),其他贝类罐头124斤(价值104日元),调味料罐头61斤(价值138日元),同罐头2079斤(价值318日元),面类127斤(价值31日元),纸烟400支(价值4日元),大豆油47720斤(价值19725日元),其他植物油87斤(价值77日元),兽脂5690斤(价值2485日元),原油及柴油180斤(价值1130日元),挥发油245立百(价值5748日元),灯油180立百(价值4350日元),机械用油(价值4198日元),化妆石碱

1045打(价值1250日元),其他石碱18513斤(价值1631日元),炭化石灰375斤(价值43日元),杀虫剂59斤(价值44日元),蚊香油689(价值738日元),酒精4000斤(价值2774日元),齿磨类1626斤(价值2637日元),中药11斤(价值13日元),蒲团100斤(价值95日元),鞋类(价值202日元),木材3斤(价值4日元),包装用纸47斤(价值11日元),半纸及美浓纸56斤(价值82日元),煤400吨(价值6260日元),水泥50吨(价值1410日元),陶器(价值489日元),其他硝子坛3个(价值3日元),绝缘电线(价值812日元),珐琅铁器812斤(价值570日元),蓄音器1个(价值150日元),唱片150张(价值162日元),汽车1辆(价值5985日元),汽车配件(价值148日元),汽车车台7辆(价值510日元),木炭7650斤(价值417日元),竹制品(价值22日元),叠垫1583张(价值5969日元),木制品(价值1298日元),其他物品(价值51458日元),转口物品(价值27106日元),共计229186日元。自1937年8月日侨撤走后,台湾对汕头的输出就停止,所以因积压物资而显得对输出的如饥似渴。

为了了解日侨回到潮汕地区及带家属的可能性,台湾总督府派出了临时南支调查局事务官大田修吉来汕头调查,并根据当地日侨的强烈要求,于1940年1月29日重开了汕头日本人小学校及东瀛学校。

日军占领汕头后,日本粤东派遣军报道部办起了汕头粤东报(新闻日报),以从事侵略性的宣传。但因日军的名声太臭,所以开办后不久,就于1939年9月15日移交给了日本善邻协会,这时台湾总督府派出了职员65人来经营粤东报社,至同年底发行中文版6000份,除了汕头一带,在华南和南洋广为散发。为了争取华侨,还发行了外文和日文版2000份及周刊2000份。

应粤东派遣军报道部的要求,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派出了调查员于1939年9月末着手筹备,于10月初以共荣会的名义在中煌戏院常设映画馆(电影放映馆),用于对华人进行奴化教育和慰劳日军。这时,为了印刷侵略性宣传品,还在汕头设了广东协荣印书馆分馆。

日本粤东派遣军占领汕头后,马上要求台湾总督府重开汕头日本博爱会医院,台湾总督府于1939年7月15日将在广东的技师派往汕头调查。翌日,该技师与汕头博爱会医院院长河田幸一郎及另二人急赴汕头,又从台湾及广东增派了人员,于8月3日在旧汕头博爱会医院处开设了临时汕头博爱会医院,12月开设了汕头博爱会医院潮州分院。1939年底该医院院长为山中觉,另有医师10人,书记4人,技术员4人,雇工7人,女护士9人,共34人。截止1939年12月,接待汕头普通患者511人,受治患者635人;潮州2384人,共3530人。

1939年,台湾日日新闻社汕头支局开设,有社员2人。1942年时支局长为谢仓,住在支局里。谢仓1904年生于台湾新竹州,193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同年入该社。

日军占领汕头后,要求台湾总督府将因“七七事变”而撤走的台湾银行汕头支店迁回,该支店遂于1939年7月15日在永平路1号开办业务。至7月底,台湾总督府派出了支配人及行员6人,处理储蓄、汇款及汇兑等业务,为日军的占领提供金融保证。1940年2月,成田丰胜来汕头出任该支店支配人。他1896年8月生,爱知县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第13期商务科,入台湾银行,历任嘉义、广东各支店支配人,代理台东、澎湖列岛各支店支配人。1942年仍在任。

日军占领汕头后,要求台湾总督府在电报通讯方面协助,台湾

总督府遂在汕头设置了75瓦特的短波无线电台,以与台北和广州联络,还派出了通讯员6人,技术员5人,带着器材于1939年7月28日乘船来汕头,8月18日开设了电报局,不仅处理军用电报,也处理民用电报。至同年底,每月平均处理8861件,电报费13653元。

日军占领汕头后,台湾总督府命令从7月上旬开始,原基隆至厦门海上航班每月4次延长至汕头,同时高雄至广州海上航班每月2次停靠汕头。从8月上旬开始,原基隆至香港海上航班每月2次停靠汕头。台湾总督府还向有关日系船业公司下令,当原汕头日侨(主要为台湾人)要从台湾或日本迁回汕头时,只要是乘三等舱,一律只收五分之一船费。

由于日军攻占汕头时造成的自来水破坏,遂向台湾总督府要求协助修复,6月26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派了在广州的两名自来水职员做为军嘱托来汕头,7月10日又不分昼夜急派了修复班5人来汕头,于同月17日举行了通水式。该供水系统一天的过滤量为78万加仑,但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而显得不足,遂在不停水的情况下积极设法改进,至同年底已提出了增加至一天156万加仑的计划。日军一占领汕头,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还派了在广州出張所的数名职员来汕头,一方面慰问日军和协助进行宣抚工作,还鉴于汕头港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帮助新设计了3个栈桥所。至7月25日,正式下令在上述3个栈桥所内为自己的会社建第二号埠头栈桥及上屋,另各为大阪商船及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各建1个。由于栈桥要走汽车,需要坚固的材料,而这些又是重要的军用物资,十分紧张,所以设法找了代用品。与台湾总督府协议,8月4日从该府交通局派了技师吉村善臣及工事员数人来汕头,作了精密调查,着手在海岸建2000坪的基础工程。三个会社的工程由吉

村技师主任,同局技师松本虎太及图子武八千与指导设计。

由于日军攻占汕头时造成的供电破坏,遂向台湾总督府要求协助修复,6月27日,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派了在广州的3名技师来汕头,发现直流蒸汽发电机100千瓦3台,200及1000千瓦各1台,计1500千瓦;交流柴油发电机820千瓦1台,176千瓦1台,计996千瓦,共计2496千瓦设备因空袭及火灾等受损,仅176千瓦的1台修理后可能可以使用。台湾电子株式会社遂派了15人的修复班来汕头,7月12日着手修理176千瓦的1台,同月29日开始向关键地区供电,至8月底可供6000盏灯的照明。发电所最高负荷为186千瓦,柴油消耗月6吨。在汕驻技师补1,书记2,技手补2,工手13,计18人。1939年9月7日又增送了内外线材料11吨,可供1000盏灯用。

1939年,台湾总督府派出了由台东厅庶务课长那须重德率领的台东厅慰问团,带着演艺人员9名及烟酒和唱机唱片等于10月29日至广州,又至厦门,后又来汕头慰问日军,12月7日离去。同月不久,台湾总督府又派出了由白坂笃率领的交通局慰问团,带着演艺人员40名,交通局相扑部员16人及野球(棒球)和钓鱼器具、毛巾、棋盘、将棋、烟酒等,于12月8日至厦门后又来汕头慰问日军,同月20日离去。

1942年时,总部位于东京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的汕头出張所为山边二郎,住在所内。山边二郎1894年生于长崎县,192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科(商学部),后入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在基隆出張所工作,1939年8月该会社创建时从大阪商船入该会社^①。

四、对华侨的控制及拉拢

陈植芳先生在《汕头文史》1995年第十三辑发表的《漫谈潮汕

民间侨汇业》是一篇很有份量的长文,但由于日占时期他主要在中越边境一带(见其在《汕头文史》1991年第十辑发表的《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一文),所以对汕头的情况并不太了解,以至有些论断有误。而《潮汕百科全书》第50-52页“潮汕侨务”条对日占时期仅有以下两段记载:“1939年6月~1945年9月汕头沦陷期间,日伪政府在汕头设立侨务处(后改侨务局)。但由于当时日军封锁海港交通,华侨没有经汕头出入国境,该处(局)的日常业务只给汕头市各侨批局及其在澄海、普宁、揭阳、潮阳的联号签发一些来往通行证。”“1939年日寇侵占汕头以后,日伪政府曾组织岭东华侨协会。”伪侨务局和伪岭东华侨协会是何时成立的?该条并未言明。据1941年夏日本人的调查报告,前者是1941年4月成立的,后者是“最近成立的”,也就是在1941年上半年。虽然“由于当时日军封锁(汕头)海港交通,”但华侨仍经汕头出入国境。实际情况是:当时日军不许外国船进出汕头港,但为了华侨的进出方便,专门准许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的船进出汕头港,该会的船载着华侨来往于汕头和厦门间。当时厦门有船通南洋。而“该(伪汕头侨务)处(局)的日常业务”并非“只给汕头市各侨批局及其在澄海、普宁、揭阳、潮阳的联号签发一些来往通行证”,还做了许多工作。很显然,由于汕头方面对当时的日文资料掌握较少,所以在此有必要据当时的日本人档案做些补充。

应当指出的是,日军占领汕头后,一度造成了华侨进出和侨汇的停止,由于日军要恢复占领区经济,所以要争取和控制侨汇,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侨汇为我抗日力量所用,故日军绞尽脑汁,在占领之初即着手对华侨抚慰,并对华侨的进出提供种种方便,以期争取侨汇和暗中控制。1940年,潮汕一带经由汕头出国华侨有7357人

(去泰国 3260 人,占 44.1%;去新加坡 2445 人,占 33.2%;去安南 1421 人,占 19.3%;杂港 231 人,占 3.4%),1941 年 1 月至 5 月有 12747 人。

申请出国者要种痘、防疫注射和身体检查,经对所带物品检查后,由伪汕头市政府发给渡航证明书,交手续费军票 1 元。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南洋华侨所在地已尽在日军占领中,华侨已无利用价值,日军才撕下了假面具。

据 1941 年夏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学生高屋考之来汕头在当地日本军政侵略机关及伪政权的配合下进行了调查,当时汕头专门对华侨进行宣传的日伪报刊有伪侨务局发行的《侨务特刊》和《华侨报》(旬刊);其他的《潮声》(潮声社发行;《潮汕百科全书》第 55 页有《潮声》条,但仅言 1988 年命名为此的文学杂志)、《东亚月刊》(东亚联盟发行)、《社会月刊》(伪社会局发行)、《岭东画报》(共荣会馆发行)杂志也重视发表这方面的内容报导。

伪侨务局对华侨的宣传活动由日军报道部指导,而具体的工作则由日军政务部指导;该局除了发行《侨务特刊》,监督旅业公会及各客栈,还发放渡航证明证。为了方便工作,该局积极进行各种统计和制作表格,并于 1940 年 8 月开设了侨务训练所,培养专门的工作人员;还创设了华侨招待所,对进出的华侨百般抚慰,如由伪市长或伪侨务局长亲自讲演,以示重视,还举办电影会,赠送纪念品等。

1940 年 3 月至 1941 年 3 月一年间潮汕及北部梅州地区各地向汕头日伪政府办理华侨手续(回国华侨要提交居留地商会或其他法定社团的回国证明书,由汕头市伪政权侨务部门接待)的人数(1940 年有 8365 人)如下表:

地点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澄海	73	117	154	154	103	85	48	66	53	54	28	51	89
饶平	45	97	39	8	26	7	5	25	15	11	6	14	91
揭阳	60	210	146	4	100	2	15				29	169	66
潮阳	206	331	312	3	238	11	5	1	2	8	75	191	259
普宁	160	138	180	6	134	5	3	13	16	10	113	134	285
潮安	191	336	205	15	269			122			42	157	94
大埔	1		15	232		117	143	163	191	164			279
梅县	2	4	12	235	20	116	178	125	71	137	11	24	187
丰顺			1	293	2	160		242	111	174		1	80
汕头				121		141	98	148	44	79		21	225
诏安	12		8	38		45	21	7	18	32		30	43
计	751	1233	1072	1109	893	689	638	790	521	669	304	792	1698

1940 年经汕头回潮汕及北部梅州地区的华侨有 10835 人;汕头的华侨有 4552 人,对其中 4051 人的统计情况为:来自泰越的 259 人,占 6.33%;来自新加坡的 384 人,占 9.472%;来自其他杂港的 3408 人,占 84.125%。回来探亲的华侨主要是对日占后的家乡情况担心。1940 年 5 月至 1941 年 5 月经汕头港回潮汕及北部梅州地区各地的华侨人数如下表(丰顺栏无人):

地点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澄海	94	173	117	64	30	44	82	52	19	78	161	141	103
诏安	3	2				23	2	3					
汕头	293	444	1388	497	603	283	431	596	412	732	1027	458	379
惠来	18	5	8		2	6	14	24	11	17	64	36	9
潮安	225	397	263	240	37	71	131	85	61	118	378	411	199
普宁	30	98	107	51	2	41	81	100	103	68	316	203	148
潮阳	328	600	626	313	204	119	279	277	105	333	656	687	313
揭阳	32	150	79	27	8	59	75	60	51	87	174	273	207
饶平	33	16	22	4		8	9	27	13	24	42	52	54
计	1056	1885	2610	1196	886	654	1104	1224	775	1457	2818	2261	1412

关于日占时期的潮汕地区的侨汇情况,《潮汕百科全书》第43页“潮汕侨汇”分条只字未提,只讲了1930年和1947年以后的数目。据1941年夏的日文史料,当时在日军政务部的监督下成立了“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加盟的公会要有日军的通行证。侨汇通货为港元,由香上和渣打两银行经手。进入国内交到收款人手中则为法币。

经由钱庄的封书式样举例如下:

表	里	封套
潮安彩塘市洋边乡山合派 家慈亲大人玉启 外寄中央币 壹百元加 吴瑞孝缄	叻实 祥泰隆信局带 文-	吉信烦送至实叻交 缄

1939年7-12月经邮局发至潮汕地区的侨汇来源及数目如下表:

月别	发送地	金额(元)
7月	南洋群岛	500
8月	同	1350
9月	同	5900
10月	同	13000
11月	泰国及南洋群岛	14000
12月	泰国、安南、南洋群岛	17000
计		51750

1940年3月至1941年3月寄回潮汕及北部梅州地区的侨汇来源及数目(元)如下表:

月份	泰国	新加坡	杂港	计
3月	3028281	3223266	1428889	7680436
4月	3234063	2711660	1745359	7691062
5月	3609074	3910966	2303118	9823158
6月	2265738	2465829	1497212	6228779
7月	3489166	5790993	2334701	11614860
8月	2080932	3255361	1423190	6759483
9月	3826520	4830579	1932343	10589442
10月	3827919	4584534	1958064	10370517
11月	2688928	3886963	1299577	7875468
12月	1434675	1926815	966545	4328035
1月	280200	6912892	2154055	9347147
2月	55160	3221749	1142315	4419224
3月	78120	5585436	853319	6516875

1940年3月至1941年3月寄回潮汕及北部梅州地区各地的侨汇数目(元)如下表:

地名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潮安	1490000	1463100	1930000	1400000	2580000	1677000
澄海	1250000	1284750	1285750	1160000	2180000	1220000
潮阳	1040000	1321200	1430000	830000	1360000	760000
揭阳	1170000	1193000	1550000	1030000	1790000	1080000
普宁	1650000	1169300	1660000	770000	1825000	940000
饶平	650000	791400	1090000	730000	1125000	660000
丰顺	90000	3900				
惠来	90000	18800				
汕头	30000	112900	190000	126000	370000	140000
其他	220425	322672	303158	182779	464860	289283
总计	7680425	7681022	9438908	6228779	11694860	6766283

地名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潮安	2460000	2200000	1760000	7900000	2662000	1205000	1940000
澄海	1960000	1780000	1260000	5300000	1370000	695000	900000
潮阳	1900000	1310000	1000000	630000	1286000	707000	960000
揭阳	1590000	1480000	1120000	700000	1473000	635000	1160000
普宁	1300000	1570000	990000	670000	837000	580000	700000
饶平	1390000	1440000	1270000	760000	995000	226000	650000
汕头	260000	210000	220000	100000	255000	155000	360000
其他	439442	344517	233477	248035	502147	216000	150000
总计	11299442	10334517	7853477	16308035	9380147	4419000	6820000

五、台湾人张鸣

本世纪20年代,在潮汕地区活动过的台湾人中,值得一提的是张鸣其人。张鸣,有时作张铭,始号金声或六乘,1931年南下广东之际从其岳父居正(1876-1951年,国民党元老)之劝改作惊声,后多用之;后年又有用吴佩孚所取不惊之号。张鸣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正月二日生于台湾宜兰县罗东镇,祖父庆茂,父有土,母黄氏秀。祖上为福建漳浦望族,出于明末名吏张若仲,其墓过去在漳浦郊外,解放前仍存在。张鸣从淡水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淡江中学肄业后,英日文已较佳。他决定去大陆发展,遂渡海至厦门集美学校。1923年,17岁的张鸣来到北京,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该校的校长名义上是蔡元培,实际掌权的是下面的行政人员。副校长是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与张继、李石曾和吴稚辉并称,他对张鸣的影响很大。张鸣在学校接受了新思潮,是个造反派。1924年底,他经同窗陈宝琛之子的介绍与其父相识,陈宝琛是个复辟清室的狂热派,当时正策划提供军火费50万元资助福建民军统领卢兴邦驱逐福建督军周荫人,以为清室复辟的据点,是为福建第一次独立运动。张鸣有福建闽侯王之志,遂参与其间。经卢兴邦代理吴玄的介绍与幕后策划的日本公使馆副武官板垣征四郎中佐(后来成了侵华的急先锋,,1885-1948年在世)会面,迈出了他与日本人勾结的第一步。1925年4月2日,19岁的张鸣跟随吴玄,拿着板垣的介绍信渡往台湾,经与台湾日本军部联系,安排好了50万元武器购入事宜。随后来到福州,周荫人已闻知此事,发出了对吴张二人的逮捕令,各悬赏2000元要二人的首级。吴玄吓得逃回了北京,张鸣却冒死潜往卢兴邦的根据地尤溪。等见到卢氏后,张鸣发现他空言无实,遂拿着卢氏的百元路费回到了福州,后于路上见到了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他乘鹭江号来到厦门。不久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事件爆发,五卅运动在全国展开,到处组织了学生军,热衷于军训,厦门中华中学校长陈金芳也组织了学生军,张鸣投身了进去。10月,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东江时,张鸣来到了汕头西北的揭阳,加入了远亲张贞的新闻同志社。

1926年1月,张鸣作为张贞的幕僚随同攻入福建,进入诏安

城。3月,张贞给了张鸣50元路费,张鸣去了汕头东北的柘林(今饶平县一镇名),这时苏联大使卡拉汗从北京打电报给广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结果广东政府发出了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反国民党、反共产主义、复辟清室的张鸣的逮捕令。柘林驻扎的是卢振柳部。4月15日,张鸣与友人曾强和林先立(两人此前均为孙中山卫队首领)借卢部兵500名,征讨南澳岛海盗吴品三,他们乘3艘小蒸汽船先至东澳,再乘小船去南澳。但到了南澳岛,他们就与和代战,准备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王国。该岛当时约有3万人,为海运之要冲,自明代以来海盗常据为巢穴。林先立军法严明,违者处死,岛上常响起处决的枪声,这引起了张鸣的不满,认为会有幽灵缠身。一天,张鸣在岛上正站着思考问题,看见一位士兵拿着一块石头,看上去不是一般的石头,张鸣将其送往基隆的台湾水产会社,经检验为钨矿。张鸣大为激动,以为找到了富源。日本人森田甚吉带着温敬贤也为此来该岛探矿,结果一无所得,经调查矿石原来是从去年秋天一艘外来的因暴风在近处搁浅的船上拾得,空欢喜一场。张鸣这时感慨赋诗:

深深的海底不知藏着多少的宝玉珍珠?

人迹踏不到的山边山谷不知有多少的野花开着?

这些花放了清香在荒芜的空气里,啊!多可怜,没人来赞美他!

如此在这村里不知有几多的天才者呢——

诗人? 预言者? 人道者?

种种的浪费中唯有天才的浪费最悲惨啊!

这时何应钦开始了对吴品三的讨伐,相继攻占了东澳和西澳。等炮弹落到南澳时,岛上的张鸣一伙人就逃散了。(据当年参加剿匪的蔡义轲的回忆录及林先立生平资料等史料,上南澳岛剿匪时间是1927年4月,具体人数经过也与此处记载不尽相同,谨多说

并存,以备考查——编者)

张鸣乘小船先回到了柘林,后又潜至汕头,在报纸上发现了捉拿他的照片,他遂于11月底去厦门。在汕头时,他组织了汕头远东分社,教青年世界语。后从厦门去了新加坡,于6月27日上岸,这时作为天涯孤客的张鸣,身上只有10余元钱。他应征当《新国民日报》的记者,月薪150元。他教世界语、英语和日语,作讲演和记录,忙得不亦乐乎。出版《英文法初步》时,他赴加尔各答访问了甘地,他对甘地说:“待中国革命成功,我将率军队来援助阁下的独立运动!”甘地听了微笑与他而别。他没有回新加坡的路费,就花了两分钱买了笔墨,在巡查面前将“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大写在电线杆上,结果被捕,用二等汽船遣返新加坡。他戏称为“官费旅行”。在《新国民日报》的帮助下,他于11月去了北伯尔尼奥的咪哩民国华侨小学校任教。张鸣在学校附近组织了远东分社,教华侨青年世界语。他是在北京参加世界语研究会的。1927年1月29日,他辞去教职离开了咪哩。两个月后,他回到了福州。周荫人已下台,卢振柳任福州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干部学校校长,张鸣在该校教语言。几个月后,张鸣辞去教职,经厦门去了汕头,后又重访南澳。以后他参加了第二次福建独立运动,结果又未成功。

到1928年,张鸣去了南京,拜会2月在第四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烈钧,受其命与姚以价(前晋北宣抚使,1881—1947年在世)以国民政府派遣南洋华侨视察使的身份于11月赴新加坡,拟向华侨募捐20万元。他们受到了陈嘉庚的迎接,还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翌年1月,张鸣从新加坡回到江西武宁李烈钧处,在此见到了日本人井上谦吉。3月,在李的安排下,他又赴朝鲜慰问当地华侨。4月23日的《非非》报纸是这样报导的:“前年朝鲜侨胞,受无知韩人所排斥

殴击,死伤多名,损失巨大。政府呈隔岸观火之象,国人无披发往救之谊。”“直至最近,有人建议出售领事馆地皮,以抚恤侨胞。侨务委员会因派定前往视察。受委之后适值足病后发。”“乃遣学生张鸣代表赴韩。因其通日语,且明了侨民情形故,乃其调查归国报告到韩情形。”“最令人兴感者,即侨胞对张鸣之来,非常感动,含悲忍泪曰,我辈侨民,得蒙政府垂怜,派员亲来视察,为从来所未有,实深感铭。其词悲痛绝伦,张亦不禁忍泪听毕。”“以最诚恳之态度,告侨胞以国内现状,及政府与侨务委员会之德意,与此后保护侨民之计划。侨胞极为满意。”

同年夏,张鸣随李烈钧和景梅九去庐山避暑,避暑结束后,在庐山下经景氏介绍,结识了田桐和居正。在田桐的怂恿下加入了国民党西山派。

1929年10月,张鸣又参加了第三次福建独立运动,先去尤溪见了卢兴邦。但不久张鸣被抓,押至厦门,后释放。此次又失败。1930年,他从厦门给田桐去了封信,2月,田桐回复,言事很急,速来沪!张鸣从厦门去上海,参加国民党反蒋运动。

1931年5月底,张鸣患病,住进了广东博爱会医院。10月,日本人山田来看望,病愈后张鸣与陈中孚随其走海路去了奉天(今沈阳),迈出了日后与日本勾结的第一步。同月底他回上海,与居正相见。11月15日,他创办的由胡汉民题报名的《阿舍日报》第一号在沪问世。他以“惊声”为笔名写了发刊词。“阿舍”为佛教语言,乃小乘教法,取“小乘开治道”之意,但办到12月就停刊了。1932年,他在南京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鸣鸣通讯社,还在上海集资办了《新亚洲日报》。1933年8月,张鸣从香港去日本,取了化名六条太郎。六条乃其号六乘之变。上岸时被日本宪兵识破。日本人山田纯三郎接到电话乘飞机救出了他。回国后,他又

参加了第四次福建独立运动,当然又未成功。1934年,他经居正的介绍找到了萱野长知,12月11日到了东京,16日见到了萱野21岁的养女萱野华惠,她是居正在日本时与继室钟明志所生,名居瀛玖,高等女学校刚毕业,长得很秀气。瀛乃东瀛(日本)之意,张鸣对她一见倾心。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非萱野亲生,根本不会讲汉语。1935年1月8日,张鸣向她透露了她的身世,两人的关系进了一层。也就是在此月9日,张鸣获准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入神川彦松的研究室,埋头于国际法和世界外交史的学习。这时,他写了《中日外交调整并中国内政改革意见书》送交居正,其中充满了彻头彻尾的汉奸论调。7月,张鸣在上海出现,10月返东京,11月去了伪满洲国,翌年1月返东京。1936年6月2日,由日本侵略中国的早期组织黑龙会巨头头山满作媒,张鸣与瀛玖在饭田町大神宫隆重举行了婚礼。7月2日,东京《朝日新闻》报导了这一消息,不过错把张鸣称为实业界新人。两人经大阪和上海去南京作新婚旅行,见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和钟夫人。新娘因旅行得病,8月8日两人动身返东京,瀛玖住进了女子专门医院,张鸣于20日又去了上海。9月上旬,张鸣经朝鲜返东京,月底又去上海,不久又去了北京,从事反蒋活动。这时陈中孚出任了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他要为张鸣安排职位。张鸣在此遇相识的日本T中佐,随他去其任地内蒙古德化。

当时德王正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闹内蒙古独立运动,30岁的张鸣从德化去了苏尼特王府,与比他大5岁的德王相见,意气颇投。张鸣参加了德王一派的驻商都的王英汉人部队,任政治部长。王英部队时有步兵2000、骑兵200,加上其他人员,有5000余众、两门炮,号称“大汉义军”和“蒙汉防共自治军第一军”。11月3日,日本人K氏来到德化,将第一军、第二军和王英部队统归其节度之

下,设总司令部于商都,准备蒙古军的南下。张鸣随“大汉义军”去了包头北部的阴山,参加了与傅作义的百灵庙争夺战,还写了致傅作义的劝降书。12月9日,张鸣在锡拉木楞梦中被傅作义军俘虏,押往绥远,被手执劝降书愤怒的傅作义判处死刑。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鸣在冰冷的牢房里等死,这时,他的旧友王锡周出现了。王氏时任《绥远日报》社社长,他设法延缓了处死,向居正急报此事,居正向阎锡山赶快发了电报,阎氏又向傅作义发了救命电报,傅作义只好答应,但以不许去日本为条件,且以王锡周为保证人。关了两个多月的张鸣被王锡周送往北京。这时陈中孚已被中央免职,不在北京。他向朋友的女儿借了钱才经汉口去了广东,后经香港至上海。他于1937年4月去了东京,住在蒲田,11月又去了上海,翌年2月返东京。3月14日,他又来到了上海,5月24日与日本海军中佐田尻从上海飞往厦门。几年来,他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中国复兴社,自任社长,以黄底黑白太极为徽章。他一到厦门,即与当地日本海军当局筹商成立伪维持会,磋商数日,始获就绪。6月3日他赴鼓浪屿召集谢长琪、周文友、洪月楷、卢用川(1889年生,浙江杭县人,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毕业)、金馥生(1898年生,浙江绍兴县人,福建公立法政专门法律科毕业)、洪范、黄士哲、陈新、许珊夫、黄宪章、许竺轩、洪立勋、李启芳(1881年生,福建安溪人),会同筹备,并由卢用川、萧炳荣(1890年生,湖北罗田县,1914年毕业于北京警察学校)两人先行至厦门,于6月4日成立伪厦门治安维持会筹备处,并以卢用川为秘书长,肖炳荣为警务科长。14日,由张鸣商请日海军当局指定维持会职员表,内列卢永枢(1892年生,厦门人,1912年毕业于福建商业专门学校)为交通科长,陈克玮(1902年生,福建海澄县人,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参事。张鸣7月16日返上海,8月发行了一名为

《五族解放》的日文小册子,内言在厦门竖立了太极旗。9月11日再至厦门。同年11月23日的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厦门特派员杉浦21日发来的报导,言张鸣为厦门治安维持会长代理,时以华南名刹南普陀住职代理觉赋为中心,为建设新厦门而迈进。同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厦门特派员竹田和新海21日发来的报导,言厦门南普陀为临济宗的名刹,随新厦门的诞生而共同复活。过去的8月,依张鸣的主张,僧侣持了戒,举行了以新文化为中心的兴隆佛教的佛教学校日语讲习会等有气氛的活动。此月14日,张鸣回上海,12月29日去东京,待了三周,于1939年1月20日回上海,着手复兴社各机关的整备强化。4月29日,社报创刊,宣传该社的主张。5月,成立复兴党,自任总裁,将社报改名为党务公报,至少发行了4期^①。

以后,张鸣往来于中日之间,抗战胜利后被定为大汉奸,时住上海永嘉路(旧名西爱咸斯路)411号,但又依靠其台湾人的身份及居正的努力获免。1948年去台湾。居正翌年4月抵台湾,不久又陪张鸣回广州看病,解放前不久回台湾。张鸣1951年3月在日本死于肿瘤,年仅45岁。瀛玖与他结婚后可能没几年因怀孕失败被割除子宫,所以他没有子女,先从其弟处过继一子,名张建邦(1929年1月15日生于台湾宜兰罗东镇,1930年从台湾迁沪,著述颇多,现为台湾政界显赫要人);抗战时期又将其夫人的妹妹居瀛棣的第二个儿子祁懿年过继为子,改名张建国(现在美国定居)。瀛玖因与继子张建邦的夫人发生争吵,于1969年3月15日清晨在台北寓所悬梁自尽。张鸣及夫人均不得善终,下场可谓凄凉^②。

六、汕头市伪政府与东亚联盟汕头支会

1942年汕头市伪政府的班子及人员简历如下:

市长许少荣:1896年生,广东中山人,日本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广东三水县会计科长、石桥盐场场长、开洋兴业公司海南岛矿务主任、西沙岛磷矿公司董事、江苏烟酒税局局长、西路讨贼军第十一师师长、广东治安维持会复兴处处长、广州市财政处处长等职。1940年加入伪政府,任市长。编有《汕头事情》(台北,1940年,日文本小册子)。据70年代末日本驻广州某外交官所讲,许战后逃至日本,客死于东京。

秘书长何丽闻:1893年生,广东番禺人。

参事齐善才:1909年生,中山人。

秘书范燮:1901年生,福建闽侯人。

秘书凌福文:1896年生,番禺人。

秘书冯传宗:1899年生,汕头人。

秘书罗梓江:1898年生,广东南海人。

第一科长:范燮(兼)。

第二科长陈宏孝:1907年生,广东顺德人。

第三科长褚寿耆:1906年生,番禺人。

警察局长黄汉民:1892年生,广东五华人。

警察局副局长熊筠:1904年生,广东惠阳人。

建设局长闾肇恩:1893年生,南海人,兼伪市政府参事。

财政局长雷一峰:1899年生,番禺人。

社会局长陈立恒:1897年生,广东澄海人。纽约大学经济硕士,信奉佛教,研究金融财政,著有《最新银行币制策略》一书。

电力厂监督丘聚南:1878年生,广东大埔人,丘工厘之子。前清优廪生,惠潮嘉师范学校毕业。历任福建汀州府官立中学教授;南洋端蒙、启发,海阳明达等学校教习;汕头公言报、潮州仁州报、星洲中兴、南侨等报主笔;驻星洲中国同盟会总秘书兼代会长;国

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北京华侨参议院议员选举会星洲代表;广东饶平县政府秘书、代理县长;汕头市政厅总务科科长、警察局顾问;汕头善后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局局长、市政府参事等职。著有:《鸿雪寄庐诗集》、《可怜儿女》、《大埔方言》、《载鬼车》等。1940年加入伪政府,时住棉安街34号。奉儒教。妻杨氏、陈氏,有4子^⑧。

东亚联盟运动是1940年春华北新民会副会长、大汉奸缪斌发起的附逆运动,不久,汕头的汉奸刘善才和许士达(1907年生,潮安人,后任伪汕头市政府财政局长)赴日访问东亚联盟协会,带回了参考书籍。后由施静鸣(1900年11月生,福建晋江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东方大学研究科社会学系,历任国民代表会议菲律宾华侨代表、北京侨务局顾问、北京侨务局特派调查台湾侨务专员、北京侨务局评议、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司令部秘书、福建安溪县长、南安县长、汕头市善后委员会总务局长兼实业局长、伪汕头市政府总务局长、秘书长。兴趣是读书写字,1942年时任汪伪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住在上海)任筹备主任,刘善才、许士达、凌福文、陈瑞图、陈建志、李宪、张纯荪7人任筹备委员。1940年10月21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虚张声势的成立大会,号称有会员1200人,另外有一般民众3万余人^⑨。

结 语

纵观近代日本在潮汕地区的非军事史,可以看出,日本对潮汕地区的文化渗透和经济侵略,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其中台湾总督府起了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搜集潮汕地区的情报,留下了一些秘密报告。近代大陆人移民台湾,虽以福建人为主,但其次就是潮汕地区,这就是当时活跃在潮汕地区的所谓日系台湾人。日本台湾总督府一直企图利用这些人做为侵略工具,在1939年夏日军攻

陷潮汕地区时,主要的军事地理资料是由台湾总督府提供的,而帮助刺探情报者则多是日系台湾人。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条例最初是包括了日系台湾人的,但后来遭到了台湾人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考虑到台湾早在1895年就被迫割让给了日本这一事实,决定不追究台湾人的汉奸责任。总之,潮汕地区的日系台湾人仍是一个今后值得认真研究的复杂课题。目前日本方面正在与台湾方面合作,开发台湾总督府的日文史料,已整理出了一些目录,相信其中的有关潮汕地区部分,将对重建当时的潮汕地区史提供一定的助益。目前韩国由于经济上的实力,愿意提供充足的资金研究大陆的朝鲜人,而潮汕地区朝鲜人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目前潮汕地区是否还有这方面的史料遗存?这些都是国外学者所关心的。

注释:

①台湾总督府官房外事课:《台湾と南支那》(台北,1937年),第15页。

②外务省通商局:《在支本邦人进势概览》(东京,1915年12月)，“南部支那ノ部”，第20-21页。

③东亚研究所:《日本在支の文化事业(未定稿)》(1940年7月,东京16开打印本),第51页前表,第57-59、115-116、210页。

④见当时在广东的其兄谢东闽(1908年生,战后回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和副总统)所著自传《归返》(台北,1988年),第120页。敏初1931年从台湾来广东学农,不几年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日本人在台湾培植的尚在试验阶段的高产甘蔗品种引进汕头地区,为当地造福不少。

⑤上海居留民团:《昭和十八年度 第三十六回上海居留民会书类》,第93-97页。

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沪友会[该大学校友会]发行,1955年,第338页,32开,非卖品),及《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创立八十周年纪念志》(沪友会发行,1982年,第775页,16开,非卖品)。

⑦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华中华南、北中美居住之朝鲜人概况》(1940年)。

⑧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中华民国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国人口概计表》(1941年4月1日)。

⑨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中华民国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国人口概计表》(1943年10月1日)。

⑩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支那事变ニ伴フ对南支施策状况》(1940年1月,封面右上角印有红色竖椭圆形章,上下为极秘二字),第189-195页“汕头”章。

⑪玉江恒平著:《中国现代史と张鸣君》(东京,1939年)。

⑫居浩然:《哭攻姐》(载台北《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第63-65页。

⑬满蒙资料协会:《中国绅士录》(东京,1942年)。满蒙资料协会:《满华职员录》(东京,1942年),第901-902页。

⑭东亚联盟汕头支会:《汕头市に於ける一年来の东亚联盟运动》(汕头,1941年10月)。

记汕头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秦梓高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政权日趋崩溃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特别是中下层人员,更感到前途暗淡,思想斗争激烈。中共汕头党组织为了配合潮汕解放战争的进行,把策动国民党人员起义,作为削弱敌人力量、变阻力为助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出路,有效地瓦解了敌人的营垒。

中共潮汕地委非常重视策反这项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二支队政治部就先后建立了敌工科和策反委员会,并连续发布《告蒋军官兵书》、《告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员书》、《告国民党公务员书》,为汕头市开展策反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由于多方力量配合,对敌策反工作进行得很成功,效果很显著。

1948年5月,莫胜春由原十九路军抗日将领翁照垣的介绍,到潮阳关埠警察所任巡官。在形势教育下,莫不愿为反动派效劳,想弃暗投明,他与中共党员郭克接上关系,要求带武警起义。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考虑到关埠前后仍是敌控区,那里没有党组织,群众基础差,是个孤悬地带,接应有困难,决定接受莫的秘密起

义,说服他留下来当内线。关埠是汕头通往西南的一个转运站、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莫除了把关埠镇内国民党自卫大队、区署、镇公所、警察所的方位及武器配备等情况告诉我方外,还经常把敌人过往情报送给我方,而且在所内发展督察肖家德,警长黄雄、张运波,警士李七等人参加起义工作。莫还利用其特殊身份护送我方过往人员传递文件、运送宣传品。传递材料时,莫身着警服,佩上肩章,挂上证章,把文件夹在公文袋里,堂堂皇皇送到目的地。当印刷品多时,如地委的《团结报》、边纵二支的宣传品,莫就把它装入布装,写上送潮阳县府字样,再贴上警察所的封条,莫带着爱人,警士李七提着布袋在后面跟随。由于举止大方、行动自如,闯过关卡,安全地把成捆成捆宣传品送到汕头市,从没有出过事,成为我方地下的“运输大臣”。

1948年3月,中共汕头地下工作团党员干部张文序认识了陈楚明(即陈士美),了解到陈曾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后因找不到联系人失去关系,曾在汕头市府户籍科任事务员,因不愿为反动派卖力,只上三个月班就在家“养病”。张与陈接触过程中,感到陈对革命一如初衷,热切期望和党重新恢复联系,并表示只要党组织需要,她同意重回市政府工作,为革命效劳。从此陈重新到户籍科上班,并在张文序领导下开展工作。那时汕头市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不时宵禁戒严,到处严查身份证,而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潮汕各地党员干部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出入汕头,如没有身份证便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于是,张文序通过陈楚明,利用工作之便多次为来往的同志做身份证。陈又把汕头市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住址提供给我方,还把敌人要抽查户口的时间和地区提前告诉党组织,以便我及时转移。陈楚明还在陈雪影(边纵二支政治部)与张文序的指导下,策动其朋友喻英奇部队321师少校副官卓鉴英起义。卓抗

日时期曾参加中共领导的“青抗会”，在国民党军任职中曾营救过共产党员，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国民党有不满情绪，有弃邪归正的可能。经过陈楚明的讲形势、讲前途、指出路等一系列的深入细致思想工作后，卓终于决心投靠人民，并利用他是检查站站长的有利条件，为我方提供敌军调防及喻英奇部与胡璉部矛盾情况。在321师调离汕时，陈劝卓留下并打入汕头市警察总局当科长。卓还对警察总局督察、警察三分局局长、四分局局长等人策反，并提供警察市局和各分局的枪支弹药、仓库物资情况及敌产楼房70多座、航空油百余桶、麻袋80万条等资料，为汕头解放后顺利接管警察局提供情况。

1949年夏，张文序在与汕头水、电两公司顾问林忠俊商谈保护水、电厂过程中，认识了进步青年店员陈仕华。经启发教育，陈进步很快，多次帮助搜集情报，被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联系过程中，陈汇报其同乡陈遇南系敌军工兵营长，后任汕头市军事构筑委员会委员兼构筑组长，住在他家4楼。张文序要陈仕华设法搞到军事建设图。陈经过观察了解，在掌握陈遇南的生活规律后，乘他外出之机设法进其房间，从陈遇南的手提袋中取出军事构筑图纸二幅。张陈两人连夜复制后，由张交给党组织派人送入解放区。后来经组织研究，认为要取得更重要军工图，最理想是策动陈遇南起义。陈仕华多次与陈遇南座谈接触，阐明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计较利害、指明前途，陈遇南考虑再三后，表示愿意起义反正，并把机密程度较高的“汕头市军事战备要图”献交。得图后，张文序即交给领导，由中共汕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郑瑁派政治交通员张明，过山涉水火速送往边防二支司令部，使我作战指挥机关，更加了解汕头市敌军的构筑设施和军事部署。

1949年4月，由中共韩江地委委员陈谦转来汕头港口引水业

务所主任沈饶生的联系线索。汕头党组织即派地下工作者许乔与沈接触。许经常到怀安街3号4楼沈家座谈，了解他的思想动态。沈过去曾接触我党同志，同情共产党，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在许启发引导下，沈答应为革命出力。沈先反映了汕头港口设施、敌运情况，以及海关、航政等情报，然后又把汕头港航道图等重要资料送来。同时还对时任引水员的原国民党退役海军少将、粤桂江防司令黄文田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为人民做事。当敌军逃离汕头时，沈、黄设法保存好港口全套引水设备和特级引水船。解放初他们还还为扫除敌军布在汕头港外航道的水雷立下功劳，使汕头港能够继续通航使用。

1949年7月，边纵二支政治部敌工科派已起义的原国民党156师一等军需官侯辛来汕头开展策反工作。侯遇到旧友原国民党潮普惠南“清剿”司令部主任参谋唐展。唐此时已起义并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来汕进行策反。经请示上级同意，侯、唐遂与隐藏在汕头的陈益，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蓝名雄，民主人士邱芝圃，地下联络站的孙敬森，在香港的蓝洋、谢一心等人组成“潮汕待解放行动组”，直接受二支政治部领导。政治部还指定中共党员姚绍文为“行动组”的联络员。为策动汕头市警察局人员起义，唐利用与汕头市长方少云和警察局代局长吴锡桥的关系，10月出任汕头警察第一分局代局长。唐到职后积极物色对象，以“投石问路”的方式掌握警方思想动态。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与政策攻心后，一些有爱国心和思乡之情的警察分局局长表示愿弃暗投明，不跟蒋介石跑。在唐的努力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影响下，当国民党军溃逃台湾之际、吴锡桥弃职逃离之时，唐代理了汕头警察总局局长职务。10月23日“潮汕待解放行动组”获悉闽粤赣边纵队已进军汕头时，唐遂率领汕头市警察局及其所属分局干警480多人枪起

义,并在我军尚未进城,汕头处于真空状态,盗匪出没情况下,积极协助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遏止了一批流氓土匪窜入市区趁机打劫的企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了社会治安。

此外,中共汕头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关系,成功地争取了汕头警训所学警中队长卓积基率全体学警 79 人枪起义。还争取了军统局闽粤边区特工队骨干,汕头警察总局督察,汕头市党部执委,第七区专员公署科员,南山管理局科长,潮阳棉城镇乡长,联勤部广州港口司令部汕头办事处上尉联络官,汕头市政府人事股长、会计股长,汕头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澄海谍报队成员等一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些人起义后,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

汕头解放前夕,中共党员张庚人通过邓慧做潮桥盐务大队大队长余振群的工作。在我军即将进城之际,余集结潮汕各地盐警 300 多人枪在汕头起义。这时溃退来汕的保安 6 团二个营、保安 4 团 1 个营、揭阳保安营(80 多人)、挺进队第一纵队 4 个营,也相继起义。国民党陆军第 27 医院医护人员 245 人、伤病员 904 人在院长率领下向我军投诚。被胡琏、方天遗弃的官兵及其家属和其它国民党军政人员 2000 多人也向我进城部队投降。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瓦解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队。为汕头市数十万人民性命财产免受炮火的摧残,为汕头解放初期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试谈民国时期普宁货币的沿革

黄振坤

民国时期(1912-1949)普宁流通使用的货币,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现将这 38 年分为三个阶段:一、民国初期和前期使用金属硬币为主阶段;二、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时期使用纸币为主阶段;三、抗战后解放战争时期和国共货币混合流通阶段。根据部分资料、货币实物和口述材料,辑录于下,供作参考。

一、民国初期和前期使用金属硬币为主阶段(1912-1935)。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定 1912 年为民国元年。民国建立后普宁流通使用的货币:一是沿用清代遗留下来的金属硬币——银圆、银毫、铜辅、铜钱;二是民国时期新铸造以上 4 种金属硬币;三是官方的广东省银行(时属中央的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四是民间私人钱庄、商号发行的纸币。

民国二十二年(1933)之前,市场以银元(圆,以下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大宗交易仍习惯以银两为计价标准,且银元也有每个 1 两和 7 钱 2 分的,故侨汇计送交收时既算元又算两(一般较多以 100 元 72 两计),保持以“两”和“元”并存的局面。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正式规定以银元每个 7 钱 2 分为本位币,禁止再以银两作为货币单位。这种改变在当时

来说,对两种价格标准的混乱状态有所改善,但仍不能缓和银价暴跌对中国货币流通的冲击。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三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一般称国币),并集中发行,同时宣布停止银元(包括银毫)在市面行使。以纸币1元兑收银元1元(同值)回归国库。下列为此前普宁较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银圆,又称银元、龙银、白银、大洋、光洋。银元有本国铸造和外国输入两大类。18世纪末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外国银币陆续流入我国,与我国的银锭、纹银同时流通。时称外国银元为“洋银”。最先是英国的“花边”、“持叉”,法国的“佛边”,墨西哥的“飞鹰”,后又有日本的“龙银”和杂港银输入。但批局计汇多用英银和日银分发批款。中国自己铸造银元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先在广州铸造,后又有其它币厂铸造。清币正面大多图案为“龙”,背面铸“光绪元宝”或“大清银币”。大多为库平七钱二分,也有铸一两和“壹圆”的。广东造的有的铸库平七钱三分。民国时期铸造的银元主要是孙中山头像,如开国纪念币和背面铸帆船的。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北洋政府先在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后江南(南京)、武昌、杭州三币厂继之。其中大头像俗称“大头袁”。我国在自铸银元之后,一些“洋银”逐渐退出,最后是英银和日银流通较久。

银毫,又称毫只、银毫只。一般较普遍流通是1毫币和2毫币。1毫称单毫,2毫称双毫。我国银毫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才在广东钱局开始铸造,后各省继之,但面额有大小,广东铸有半毫、1毫、2毫和5毫(外省也有铸2毫半的)。币正面为“龙”,背面铸“光绪元宝”,币额半毫铸“库平三分六厘五”,1毫铸“库平七分二厘(也有七分三厘的)”,2毫铸“库平一钱四分四厘(也有一钱四分

六厘的)”。币面不铸“毫”,只铸重量。民国时期有孙中山头像的“貳毫”,称中山毫和“10”、“20”的“壹毫银币”和“貳毫银币”(均指广东省造)。银毫币值为每毫10分,即10枚铜镞或铜钱100文。10毫兑换银元1个。

铜镞,简称镞,又称铜元,铜仙、铜板,用铜铸造。铜镞最初由外国传入,光绪十六年(1890)广东钱局仿照香港铜仙开始铸造,及后各省及地方造币厂也多开铸,清币正面一般为“龙”,背面为“光绪元宝”或“大清铜币”,以及造币厂名称,“当制钱十文”,“每枚当制钱十文”,“当十”等。民国时期各省铸的铜镞图案更是五花八门,大多正面为当时的国旗——五色旗。背面有铸“壹枚”、“十文”、“当十铜元”的,广东、广西的“壹仙铜币”,湖南的“湖南铜元”,江西的“江西铜元”等。民国七年(1918)又开铸每枚2仙的,即1枚币值为2仙,宽度及重量都比1仙的大。2仙的直径32毫米,比1仙28毫米大4毫米,重量为2钱8分,比1仙的2钱重8分,但1枚作铜钱20文使用,这种1枚2仙的铜钱市面很少。民国二十四年(1935)发行纸币角票之后,铜镞仍与角票混合流通,币值每枚为1分,10枚为1角。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941-1942)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铜镞比值失常,加上数量多携带不便,于是出现1角换10多枚至20多枚铜镞的,最后因脱离货币地位而自然停止流通(注:脱离货币地位如1升米10元,那么,最少要带1000个以上的铜镞才可买,纸币则不同)。

铜钱,又称制钱、铜箔钱,因中间有一个四方小孔故又称方孔钱。铜钱每个称1文。民国时期流通的铜钱多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包括极少数宋钱、明钱和“太平天国圣宝”。民国初年福建铸造的“福建通宝”,北洋造的“民国通宝”,但数量不多。铜钱的币值10文兑换1个铜镞。铜钱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废除复杂币

制后,统一铸圆形中央方孔的钱币作为全国通用货币。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以5铢钱为标准铸造“开元通宝”,中国钱币从开元起使用“通宝”、“重宝”、“元宝”,直至明、清各朝尚袭用未有大变。自秦到清2000多年方孔钱一直是我国历代主要货币之一,到光绪年间才被机制铜镞逐步取代。铜钱直径在24毫米至28毫米之间,清初每文重1钱4分,乾隆、嘉庆时铸的较细,仅存十分之八,道光、咸丰、同治时铸的更细,广东造的每文重1钱,不久又改为8分,后来更细,直径只有16毫米至18毫米,重量为3分2厘,被俗称“铜钱丕”,与历代铜钱混参流通使用,故俗语有“铜钱丕、百百参”之句。据传说,民国三年(1914)市场小食摊卖的面汤、粿条汤每碗一般价铜钱4枚,单蒸白酒每筒(约半市斤)铜钱14文。至民国十三年(1924)前后,面汤、粿条汤每碗铜镞4枚(即铜钱40文),单蒸白酒每筒铜镞14枚。民国十三年(1924)国民政府宣布废用铜钱,相袭2000多年的铜钱流通到此结束(注:太平天国钱币的“国”字中间是“王”,不是“玉”)。

纸币。在使用硬币的同时,普宁流通行使的纸币主要有:(一)大洋券(包括银毫券和兑换券)。因该币颜色为青色,故俗称“青纸”,即“凭券兑换大洋”,它是官方广东省银行发行的。该行是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十六日孙中山创建的中央银行。民国十八年(1929)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后将其改组命名为“广东中央银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再改组为地方的广东省银行。该行民国十五年(1926)开始在潮汕发行其钞票,面额为2毫、1元、5元、10元(钞票印为圆、即元,以下同),该大洋券行使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才停止流通。(二)大革命时期普宁发行的纸币。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在中共普宁支部的领导下,县农民协会在附城乌黎塔脚建立自由市,设立银庄3家,当地人称为银行。这3家钱

庄即集和源、同德昌、三合兴。其中集和源为公开招股开设,农民缴股金便可入股。集和源发行的纸币,分镞票和银票2种,镞票面额为30镞和50镞,银票每张面额1元。该货币当时不仅在普宁县内流通,还远及潮州、汤坑(今丰顺)等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进攻塔脚,自由市被烧抢一空,集和源等3家钱庄随之倒闭。(三)私人钱庄、商号发行的纸币。民国初年,潮汕政局动荡,主政者不时变更,金融混乱。一些钱庄、商号乘机发行“兑票”、“镖票”之类的纸币,从中渔利。这些纸币的发行,一些既无限额,又无一定储备金,其流通也有地区局限性,信誉好的流通较广且时间较长,反之则范围小且时间短。据《潮州志》载:“普宁发行纸币商号以县城(注:今洪阳镇)为最多,计行使镞票达90余家,甚有以冥强店(潮发)资本不及百元而发出镞票数百元,其流弊滋生,自不待言。”到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在今占陇镇的乡村,较有名的有下林村陈贵合,埤塘村陈合成,西社村黄绵隆、黄集成等。黄绵隆自称有储备金光洋3600元,他与集成同行开糝铺,且两家铺面相连在一起,除各发行1元券外,绵隆发行1毫券,集成发行2毫券,纸币印制精巧美观,票面印“凭票向本号兑换大洋××”。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普宁县政府严令无资本商号具结限期收回,然日久玩生,故态复萌。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五日县政府再下令各商号于2个月内全数收回,8月期满未收回将严厉取缔。

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五这7年间,市场物价较为稳定,农产品价格基本保持在同等水平。以鲤湖米市为例:每年夏收季节大米每百斤(斗折市斤),1930年6.88元,1931年5.71元,1932年5.67元,1933年5.39元,1934年4.28元,1935年5.41元,1936年5.71元。花生油每百斤1930年24元,1936年24.4元(注:1930-1935

年为银元,1936年为钞票)。

二、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时期使用纸币为主阶段(1936-1945)。这一时期除国民政府发行一些硬分币镍币以及1942年前继续使用铜辅为硬币外,其余均为纸币。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国民政府颁令实行新币制,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停止银元流通。时广东省政府曾以广东情况特殊为由,宣布原来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券也应是法(国)币。广东省银行在兑换银元回归时也另出一招,凡持银元换其大洋券者一律加二成值,即1个银元换取1元2毫的大洋券。这样,大量银元便流入广东省银行,这是掠夺硬银元的一种伎俩。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广东还政中央,次年六月国民政府规定一律通用国币,但广东省银行的大洋券在潮汕则仍为本位币使用。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以后才改以国币为本位,以大洋券每元为国币0.833元的比值继续流通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才停止。

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主币初期为1元、5元、10元、20元(钞票元印为圆,以下同),稍后增发50元和100元。随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中央银行又发行每张面额至5000元的。民国三十年(1941)又有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元、10元、100元的钞票在普宁流通,1元和10元票还印“凭票即付国币××圆”,其币值与上列三银行的币值同等。1元币有三种版面,其中小张的被称为“农民纸仔”。这几家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发行辅币1分、5分、1角、2角。民国二十八年(1939)六月二十一日汕头市沦陷,潮汕的一部分地区也为日军占领落入敌手。时普宁属国统区,仍以国币流通。但日本侵占潮汕时,一面限制沦陷区人民使用国币,一面以其“军用手票”1比4的兑换率大量收取国币(即1元日币换4元国币)。抗日民主政府则在靠近沦陷区的地方把法币加盖“抗日

救国”4个字为记。同时,国民政府复将中国通商、中国农工、中国实业、中国垦业等8家银行的钞票投入使用,时普宁较常见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中南银行和湖南省银行的钞票,但为数不多,币值与国币同等。民国三十一年(1942)物价飞涨,货币更贬值,铜辅比值失常脱离货币单位,角票也较少,零钞短缺,于是市场上多把1元票撕为左右对半,每半张作5角使用,也有把5元币10元币撕对半使用的。此时,一些私商也发行私人纸币解决找零问题,有的只用一张白纸写上金额,盖上商号印章便使用出去。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过程中,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大米每斤(升已折为斤)8角4分,比上年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每斤4角4分涨价近倍,当年九月更涨至1元3角3分。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初大米每斗500元,最高的五月十六日为700元(注:原资料以斗为计算单位,但斗计量有大小,未说明属何地之斗)。政府的钞票已失去威信,于是市场上便以米作价,以物易物,以米的“升”为单位换取其它商品,包括向药店买药也用大米换,大米作为货币使用。但粮食奇缺,米珠薪贵,饿死人很多。时有一个约5000人的乡村,每天4个屠商合宰1头猪约100多斤,每斤价大米1升,且经常1天卖不完,只得腌上盐于次日再卖。此后,钞票统归中央银行发行。普宁大约在民国三十二年下半年才开始使用关金券,简称“关金”,它是海关以金为单位兑换券的简称,是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民国三十年(1941)国民政府为增加筹码,将前用于关税的关金券拨出使用,其比值是关金1元折合国币20元,关金与法币并行流通。关金初投入市场使用时面额为1元、5元、10元3种,后随巨额法币的发行,关金面额增至50元、100元、1000元,10000元,最高为25万元一张。但关金印制都是直版,印孙中山头

像,有的加印“上海”。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发行金圆券后才与国币同时停止流通(注:法币和关金印制多是外国,如美国钞票公司,英商保安钞票公司,英国华德路公司、德纳罗印钞公司。中国自己印制的有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如中央银行的5元票(1941年版),小票张,长宽为65×130毫米,便是中华书局印的)。

三、抗战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货币混合流通阶段(1946—1949)。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开始。时各种硬币已全部废止,市场仍以国币和关金流通,但货币更加急速贬值。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大米每斤国币80元;民国三十六年二月每斤909元;民国三十七年二月每斤上涨至9525元;八月十二日每斤为71.43万元。市场常出现拒收国币现象,钞票几乎成为废纸。当天,国民政府颁发《财政紧急处分令》,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简称“金圆”,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并以1比300万的比率兑收原国币和关金;不准用黄金为单位作货币进行交易(因货币动荡,急速贬值,商品大宗便以黄金两为单位作价格买卖)。金圆发行时辅币有1角、2角,还有硬币1分、5分、10分、20分、50分。但金圆券一发行便贬值,故市场似乎未见过该辅币,尤其是硬币。主币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按官方规定比率为金圆7角5分兑换港币1元。金圆于八月十二日发行,九月二十六日大米每斤金圆(以下同)为1角,折原国币30万元,十月三日每斤3角,7天上涨2倍。十二月六日每斤2元。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一日每斤3元4角。从年初起大面额金圆券陆续出笼,从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到每张100万元。物价如飞,至二月四日大米每斤30元3角,三月一日每斤200元,四月十三日每斤1695元,五月五日每斤20万元,五月八日每斤50万元。7个多月上涨499万倍。市场拒收金圆券,称金

圆券为“臭纸”、“今年券”、“今完券”。至七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兑换券,简称“银圆券”。此时,普宁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市场主要流通使用“裕民券”,市场未见银圆券。但国民党台湾新军和胡璉兵团窜扰普宁时,一些军队持的是光洋(白银),个别要向小商贩买香烟、糖果之类,一是小贩不敢用裕民币与其找零(其实也没有比值),二是军队到处抓丁、勒粮、抢物,故没有逃难的老弱病残小贩,货物只能任其拿去,或闭门大吉。

金圆券急速贬值时,港币乘机流入,群众称该币为“牛”,从1949年4月份起,市场一是裕民币,二是金圆,三是港币,四是私人及团体发行的纸币,形成国共货币、官民货币、香港货币混合流通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自身难保,社会上商号、团体乘机印制纸币投放市场。如洪江中学(建新中学前身)时正在建,主持者便以“长寿社”的名义印制纸币购买建筑材料,付还工程款等。商号印纸币行使从中渔利,有打条子盖上印章的,有钢板刻印的,有机印的。如一地方一个叫“快合公司”印的钱票很简单,票中间印“壹圆”(空壳字)上印“快合公司”,下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谷印^契启”。全张色印章为19个字。另一叫“南记”,印的中间面额为“伍角”(空壳字),上印“南记通知书”,下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印印章^启”,左侧二直行印“所存本号货项尾数”,左侧分三直行印“提足伍拾角向本号换取金圆券伍圆”(每行5个字)。此时市场也有少数以米来作价,以物易物,但主要还是各种货币混合流通。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解放区的扩大,共产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在潮汕解放区先后发行三种货币:

(一)丰年银行币,简称“丰年券”。这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在中国共产党潮汕地委的领导下,潮揭丰人民行政委员会在揭阳南山圩(今属揭西)开办丰年银行,发行的“丰年银行币”。票面

“丰年银行”是时任潮揭丰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何绍宽所书。因条件限制,钞票由时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党支部书记黄树坚(普宁人)负责设计和印制,用钢笔蜡纸刻版,牛皮纸彩油印刷,面额为5角、1元、2元三种,共印制交发行36471张,在解放区取代国民党的货币的流通,信誉很好,未发生拒收情况。其币值为2元兑换港币1元。因印制发行数量不多,且时间较短,据说普宁只有西部与揭阳(今揭西)毗邻的一些乡村农民过境交易时持有。此后“裕民币”发行,丰年银行币便兑换收回停止使用。

(二)裕民银行币,又称“裕民银行流通券”,简称“裕民券”。裕民银行总行设于南山圩(现属揭西县),并先后于普宁的鲤湖、流沙设二个办事处,直属闽粤赣边区财经会管辖,同时接受潮汕地委领导。裕民券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二月十六日发行。主币面额为1元、5元、10元,辅币为1角、2角、5角。发行时规定其币值为2元兑换港币1元。它流通于潮汕解放区和部分游击区。该行于当年7月8日并入南方人民银行。解放后裕民币与“南方券”和人民币(旧版)同时流通至1950年上半年,下半年收回停止使用。裕民券与旧人民币的兑换比值为1比250。

(三)南方人民银行币,简称“南方券”。1949年7月8日,中共华南分局在潮汕解放区河婆镇,建立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发行华南解放区使用的本位币——南方人民银行币,主币为1元、5元、10元,辅币为1角、2角、5角。“南方券”与“裕民券”比值相等,2元换港币1元。使用至1950年上半年,下半年与裕民币同时停止使用,并以1比250的比值兑换旧人民币。

此外,民国三十三年底至三十四年五月(1944-1945),日军曾三次袭扰普宁,并在个别地方扶植其傀儡——维持会,此数月间普宁沦入敌手的地方曾否流通使用其货币——储备券未考。但见过

个别普宁籍往汕头沦陷区经商的商人曾持有该伪币入境,有一商户数量还不少,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该商人沮丧地将其焚烧了。该币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十三日伪当局发行的“中国储备银行”钞票,票面均印孙中山头像,上印“中央储备银行”,中部印面额。但不同的一是钞票边横排第一行即“中华民国国币××圆”,第二行印“中华民国×××年印”;二是100元以上面额的钞票“佰”字为小写,没有“亻”旁的“百”。如500元印为“伍百圆”。

(1995年11月20日)

征集汕头岩石风景区 摩崖石刻墨宝纪实

刘麒子

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建设美化汕头,进一步提高汕头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从1984年起,汕头市委、市政府在配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同时,致力策划建设市区人文景观的风景区和风景点,力求在既弘扬潮汕文化,又和现代城市美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设景区景点,提高城市的品位和档次,更好地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经济的腾飞发展。在逐步扩大城市规模,拓宽修整道路的同时,市区先后建设了海滨长廊、月眉翠堤等一批景观、景点,并配套了若干新型城市雕塑和亭台楼阁。特别是着重加快岩石风景区的景区、景点建设,其中尤以岩石当代摩崖石刻别具影响而名闻遐迩。

岩石风景区位于与老市区隔海相望的南区,因山海相依,林木苍郁、怪石嵯峨而独秀南天,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省级重点旅游风景区。汕头开埠后曾有10多个国家在汕头设领事馆,有的领事馆选址岩石,外国传教士也来岩石办教堂传教,不少外国人还在此建别墅消夏避暑。50年代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来汕渡假,对岩石这一天然胜地与山海风光流连忘返,认为岩石必须建成广东一大旅游风景区。董必武、郭沫若浏览岩石之后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汕头市委、市政府从潮汕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岩石雄奇秀丽的风光这两者的凝汇点着眼,决定在岩石山天然巨石上建设现代摩崖石刻群。因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曾被市委、市政府派赴全国各地征集韩祠碑林墨宝,1987年初,协助郭斯锃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副秘书长黄赞发向我转达市领导兴建岩石摩崖石刻的设想,提出参照韩祠碑林征集墨宝的做法,继续征请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和全国各地名家题词作书,要求我负责这一工作。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市委副书记陈厚实、副市长郭斯锃商定了方案并把摩崖碑刻的筹建工作落实由市城建局负责。陈厚实同志向林兴胜书记汇报,决定以汕头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具请柬,派我前往北京和全国各地征集岩石当代摩崖石刻群的名家墨宝,内容一是原岩石风景区的景点、景名和正在规划建设中的景点、景名;二是古代和当代潮汕籍诗人或来过潮汕的诗人,赞美讴歌潮汕的诗词题句;三是潮汕各地景观景点名称,革命历史胜迹和文化遗址;四是赞美汕头两个文明建设,歌颂改革开放。

刚刚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为潮州韩文公祠碑林征集墨宝一事,又接受市政府的这一派遣,应该说这是市领导的信任与重托,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为,征请国家领导人题词作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征请全国各地名人书法家挥毫作书更难,更何况当时也没有给予分文报酬。韩祠碑林能够征得680多幅墨宝,主要是得到曾在广东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以及陆定一、方毅、张爱萍、朱穆之等领导同志的支持帮助,我请了国画大师刘海粟、王个簃,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容庚、麦华三写信给中国书协和有关名家。我的老师麦华三先生建国前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与王昆仑、胡愈之、叶恭绰等交谊甚笃,因他们后来都在京工作,遂又认识京中一些名流,旧雨新知,彼此间常有

书卷往来。麦老除了专门给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舒同、启功、陈叔亮、林林等写信，还亲自和我上京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楚图南、王任重，中央顾委副主任王首道，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文化部长朱穆之、副部长夏衍、周而复，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等，事后由这些领导同志介绍，我两度上京拜会了在京的若干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知名书法家，又通过国家文化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介绍，跑遍了全国（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各省市的知名书法家，都为韩祠碑林留下了可贵的墨宝。事隔不久，又要上京并到全国各地请领导同志和名家挥毫，确实难以启齿。为了征集岩石摩崖石刻墨宝，我专门拜访了习仲勋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不过你们重建韩祠碑林刚请那么多领导同志和名家写字，名家的字贵少不贵多，古人说过‘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不要难为人家了，这一次我不写也不好出面了。”当时容庚、麦华三先生患病刚相继去世，失去了几十年的忘年之交和亲同父辈的良师，悲痛之心，无以言喻，再次上京和赴全国各地征集名家真迹，的确心中有点茫然。我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被省借用，陪同有关名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学术交流，也曾协助编写《中日书法交流史》等书，和一些名家有过交往和接触，我决心凭此关系闯开一条路子。出乎意料之外，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名家，虽已年过古稀，而且饱经风霜，经历了文革的摧残迫害，但他们却仍是刚肠热血，平易近人。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顾问，对书法深有研究，尤其精于行草，落笔如舞龙蛇，以前我和麦华三先生几度赴京，曾多次到地安门他的住处拜访他，这位百战沙场的将军虚怀若谷，没有半点架子。这次到京专诚前往拜候，当他知道汕头岩石要建摩崖石刻一事，不仅亲笔写了“南疆独秀望云崖”的条幅，而且还打电话给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和名家，请他们书

写了好几幅字。更值得一提的是，家住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廖沫沙先生是“文革”恶浪冲击首当其冲的“三家村”唯一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村”，他和夫人陈海云在大革命时期曾到过汕头，对汕头很有感情，我过去曾多次写信写诗请教过他，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直爽地说，我当了多年的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和名人书法家多有接触，可以帮点忙。当我请他挥毫时他谦逊地说，我不是书法家，可以学写几张挑选一张凑凑热闹。老人给全国文联主席阳翰笙、人民政协报社长萨空了等写信，给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打电话，还介绍我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全国政协常委溥杰等。我还上门拜访了曾在汕头工作过的司法部长邹瑜。邹部长热情地挥毫作书，还请北京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等挥毫。当代诗坛元老、著名诗人臧克家也写信请几位名家题字。在中国书协启功、赵朴初、陈叔亮、林林、李长路等名家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书法家协会除了发动在京书法家书写碑稿外，还请各省市书法家协会发动名书法家挥毫作书。各地书坛巨星、墨林硕俊，平时千金难求一字，其中不少人刚为韩文公祠碑林挥毫作书，又再慷慨赐墨，如千家驹、山之南、仲贞子、肖龙士、沙孟海、林散之、刘海粟、叶君健、熊复、溥杰、肖芳、董寿平、柳倩、尹瘦石、王朝瑞、启功、关山月、费新我、陆俨少、唐云、方济众、魏启后、于安澜、高小岩、王遐举、游寿、秦萼生、张辛稼、饶宗颐、赖少其、陈大羽、亚明、黎雄才、潘主兰、娄师白、江友樵、徐无闻、方绍武、徐本一、申西岚、帅立志、谢孝思、谭右铭、陶博吾、李宗海、龚望、任政、黎凡、黎泉、单体乾、欧阳中石、周志高、颜家龙、陈景舒、刘江、王冬龄、黄继龄、陈清狂、崔护、庄久达、郑餐霞、邱陶峰、刘夜烽、王善清、田原、王海岑、孔伟心、杨之光、利化、司徒越、舒炯、苏华、王一羽、关晓峰、邓明阁、张望、葛鸿禛、杨和明、傅宗堃、邓白、涂夫、林坚章、郑春松、张玉龙、张颌、张趋等。这

些中外景仰的名家,现十之七八已经作古,令人思之犹肃然起敬,顿添感慨。留下来的墨宝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回顾征集岩石摩崖碑刻名家墨迹,出自对历史上誉为海滨邹鲁、现为对外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和海滨城市汕头的深厚感情,牵动了数十名国家领导人的热心关注和支持,有近200位驰骋书坛的名流硕彦以挚热之心,热情地为锦绣潮汕讴歌,为汕头的腾飞发展笔走龙蛇。不少名家抱病临池,过去曾为韩祠碑林题词作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王任重、王首道、陆定一、张爱萍、朱学范、周培源、严济慈、楚国南、周谷城、钱昌照、屈武等再次挥毫泼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曹里怀、海军政治部政委郭开锋、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张西帆等亲笔题词;原湖北省省长李尔重,黑龙江省省长陈雷,中顾委委员、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都留下了宝贵的墨宝;南京著名书法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丁吉甫因年事已高,书完墨宝当天就离开人世。一代书家、百岁老人肖龙士,身患沉疴,让儿媳扶着,书写下“天池”、“山海奇观”两帧条幅,情景至为感人。听说岩石山有全国独特的花岗岩石构成的“连环洞”,很具特色,既是一代名书家,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楚图南振笔写下“南海奇岩”和“山海奇观”两幅大字。71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把汕头喻同“海天晨韵”,前景无限。80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培源写下“百载高埠,楼船万国”,把汕头开埠百余年的历史描绘于如椽巨笔之下。北京一代书法名家王遐举挥笔直书“海纳三江、气吞百粤”,形容改革开放中汕头人的深泓气度和欲干云汉的英雄气概。病眼近盲的四川书坛硕彦江友樵挥笔以“何处春常驻,海天岩石山”,讴歌独秀南天的岩石风光。中国文坛巨星阳翰笙先生在他家中劲笔疾书“邹鲁之邦”四个大字后对我说:“你们潮汕历史上文化人很多,古人说是海滨邹

鲁。老舍去过汕头,写过汕头是邹鲁之邦,他的字不知是否保留下来。文革老舍先走了,我还是写这四个字吧,也算是对老舍的纪念。”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说:“汕头是全国经济特区,应先腾飞起来。”他健笔疾飞,写下“百里繁华”四个大字。国家级书画大师何海霞挥起铁腕银毫,写下“春潮八百里,南国第一州”,形容汕头特区在滚滚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奋起向前,起着特区应有的龙头作用,寄望汕头要敢为南国之先!诗书画名气远播中外,年已九十四岁的北京中国书画研究会会长肖劳对我说:“我青年时到过潮汕,那里是气候温和的鱼米之乡,如今建经济特区,经济先发展起来,相信今后会更繁荣。”他深情地写下“潮人福境”横幅。老人把对潮汕人的无限深情,融汇在这四字之中。誉为当代书坛北斗的沙孟海写下“海不扬波”四个大字。海不扬波是风调雨顺的征兆,四个字寄托着这位中外景仰的长者对潮汕人民的万千情意!山西名书法家邓明阁用“丽日南天春不老,笔歌墨舞赞潮汕”概括了全国名家对潮汕地区如日初升、欣欣向荣的赞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天、省顾委主任寇庆延为建汕头摩崖石刻一事亲笔题词。更感人的是: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在穗再三叮嘱我转告郭斯锷副市长,将他书写悬挂在广东潮剧院的已故名作家老舍来汕头的诗作为碑刻。诗曰: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后来,他亲自来汕郑重其事地将此诗重写了一帧,并亲自在岩石山上选址择石镌刻,借以表示对汕头别有一番深情的老舍先生的怀念与景仰。

上述这些墨宝都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在汕头以至大潮汕的文化史和名胜风景区的建设史上,将永远闪烁着无比的光辉。1989年市政府决定由市城建局负责将这些墨宝选择200余帧影印成册,书为8开本,定名为《全国名家赞潮汕》。郭斯锷副市长亲自题写书名,郭斯锷副市长和我撰写前言。此书在80年代的两次春茗联谊会上以及大型外事活动中赠送海内外潮籍乡亲和有关部门,并寄赠每位挥毫赐墨的名家每人手二册留念,影响颇大,反映甚好。

完成这次任务,为岩石摩崖石刻征集的墨宝280余帧、国画若干件均列编在册,墨宝原件由市城建局和市岩石风景区管理局负责整理装裱。市领导曾决定整理装裱后存交市博物馆珍藏(听说现仍暂存于市建委档案馆),并拨专款在岩石风景区天然巨石上摩崖镌刻。现垂虹洞(或称连环洞)周围可见已刻有四、五十帧巨额镌刻,吸引不少游客观光。大型碑刻尚在继续筹划中。

1997年春,汕头市岩石风景区管理局因风景区内规划、建设塔山、焰峰风景区,要求帮助请国内名书法家补写部份景区、景点名称和诗词联句点缀景区,我又专门赴京、津、沪、苏、杭等地,几经周折,想方设法请了何海霞、孙轶青、刘炳森、赵家熹、张旭、苏适、曹柏昆、宁书纶、王千、袁健民、谢海燕、钱君匋、郭仲选、陈大羽、高小岩、钱太初、吴进贤、俞建华、刘夜烽、朱关田、宋涛等数十位名书法家,补写了60多帧条幅、诗词、联对。这些真迹,不仅使山川增色,也将使汕头在当代人和后代人心眼中增添一定的份量。

先父姚华萼生平追忆

姚祥智

先父姚华萼,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毕业后,他一直从事于教育事业,人们称他是潮汕知名的教育家。

1994年是先父诞辰100周年(1894-1994)。我曾约请几位对先父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写怀念文章题词,收集他的同事、学生写的纪念文章,用书法艺术形式,书写成文并以《千思录》为书名,编辑出版一本纪念专集。

在题词中,有陈谦同志的“谨持大节作人师”,林川同志的“大义凛然,刚直不阿,师尊师表,后人足式”,有学生刘世静的“校长容犹在,赞叹治学严师,先辈风范长存,堪称民族楷模”,陈大羽教授作为乡亲的题词是:“培育英才,振我桑梓”。

郑觉同志在《姚华萼校长办学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指出:“一九三八年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分委统战部长马士纯同志称姚校长为‘国民党自治派’。姚校长爱国、政治开明,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权势,愿意做有益于地方人民的事业,是教育界名流。”还有郑餐霞同志(原潮阳县立一中学生),看了郑觉同志悼念文章之后,给郑觉同志的信中指出:“当年教育界两种类型的教育家,一种是官僚政客型的教育家,另一种如姚校长,是一位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学者

型的教育家。”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在我的书法专集《千思录》一书中，蔡起贤先生的题词是“书艺凝千思”，这个“千思”是众多熟知先父的老同志、老同事和他的学生的“思念”，本文所写的是这些“思念”的凝聚。故本文也可称为“一文凝千思”，是《千思录》的姐妹篇。

一、爱国、进步的青年时代

我祖父是一位勤俭治家的家长，他是从小手工艺做起而至开办干果店的生意人。据母亲说，祖父从14岁起就上门给人家做小裁缝，一点一点的积累，逐步做起小生意，后来开干果店而起家的。

祖父有三个儿子，先父排行第二，是次子，也是祖父最爱惜的。先父从小喜欢读书，有天赋，学业成绩好，深得祖父的重视和关注。当年，祖父也出于那种“读书望贵”的念头，老是俭吃俭用，支持他读书；重要的是当年祖父的生意还顺利，购置一点地产，收点地租。祖父逝世后，家境逐步冷落。父亲北大毕业后，有教书的收入，后来分了家，家庭的生活就靠父亲的教书薪水维持。

1910年，父亲在潮阳棉城五都小学毕业。这时，正处在辛亥革命前夕，时局不宁，人心惶惶，他毕业后便停学在家，帮助祖父料理店务。1914年，先父才赴广州旅省中学读书。

在校读书期间，国家内忧外患，灾难重重。大小军阀占地争霸，对内篡权夺利，鱼肉人民；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现实生活的灾难激起热血青年的爱国热忱，先父当年曾与同学一起，参加反对军阀龙济光的斗争。此次斗争虽因事泄失败，但父亲却是受了一次深刻的民主革命的教育。

1917年，父亲跟杜国庠一起前往日本求学。由杜国庠介绍进东京高等学校读书。在日本期间，正是国人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

涌的时期。

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留日爱国学生又发起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青岛的运动，1918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游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归还青岛，100多人因此被捕。先父参加了这次运动，并与大批留日同学一起愤然罢学回国。

先父从日本回国后进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当年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强阵地。

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新文化运动初期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还有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和经济学教授的李大钊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北大很自然地成为传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两面旗帜。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把两者譬之为车上的两个轮子，当并重，缺一不可。提倡民主，就要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科学，就要反对迷信、盲从、武断、旧教条、旧八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促使人们更加憎恶封建军阀腐败卖国的反动统治，更加逼切地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薰陶之下，先父作为一个具有爱国、进步和民主思想的青年，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洪流中。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下午，浩浩荡荡的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队伍，冲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

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等口号。集会之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兴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示威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先父就是在参加火烧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行动中遭到逮捕的32名学生之一。他被囚禁在北京警厅约二个多月之久,而且右臂受伤,伤疤留迹终生。出狱后,先父仍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并于1924年临毕业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国民党。

二、献身教育,兴学育才

教育是先父的终生事业。北大毕业后,他一回家乡就以教育为业。任潮阳五都中学教导主任。不久,广东革命政府先后举行第一、二次东征,消灭盘踞粤东的军阀势力,先父积极配合,大力宣传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协助改组国民党潮阳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1926年被聘为汕头高级中学教导主任。1927年,因教育有方,声誉日高,被家乡父老士绅推荐任潮阳东山中学校长。1928年选为国民党潮阳县党部监委。是年末,因联名向省政府控告县长陈权非法抽捐而被陈权撤去校长职务,翌年,陈权被查办罢免,先父复出,被任命为潮阳县教育局局长。在职期间,他认真负责,切实清理学租,解决拖欠教师工薪积案,主持倡导中学及高小学生较艺,革除弊端,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但是,他这种忠于职守的做法,反而惹来了同僚的嫉妒。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极尽打击、倾轧之能事,父亲深感仕途艰难,于1930年12月愤然辞职,仍然做东山中学校长。

1932年,先父被汕头私立大中学校聘为教导主任。1933年2月,再次被家乡父老迎回潮阳,筹备和创办潮阳一中,并担任校长。

1941年6月至1942年任普宁梅峰中学校长。1942年8月至1949年7月聘为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校长。1950年2月被潮阳县人民政府任命为潮阳县一中校长。

郑觉同志在怀念文章《姚华尊校长办学的历史贡献》中较为详细地评述先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说:“姚华尊校长从事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刚正不阿,无意当教育长官,将大部份年华致力于办普通中学。但局限当年的时代背景,虽然形式上推行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但是实际上推行的却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坚持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体现爱民族、爱国家、爱民主、爱科学思想和意向。他十分重视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教学制度正规,学籍管理严格;他深识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教师的聘请!器重思想进步、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支持他们的教学,发挥他们的专长,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或结合课内外启蒙学生的思想品德等。尤其是在他任职校长之后,更能体现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潮阳县立第一中学历史悠久,学生富有革命传统,人才辈出。这与姚华尊校长任职期间的培养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姚华尊校长一贯以来的政治开明、尊重教师的思想,他那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品格和才识等是有着深远影响。

姚华尊校长任职一中学校初期,学生运动一度沉寂。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及其影响之下,一中学生运动才得到逐步发展。姚校长积极支持当时少数教师指导学生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宣传活动(这在当时周围某些学校是不敢采取的,而是受禁止的,甚至开除少数活动份子,给予处罚)。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

展；八月，潮阳县青年救总同志会成立，主要是在小学教师、一中师生中发展组织的。后来，汕头抗日义勇军、青抗会成员王孟泽同志回潮阳与王维礼（县青抗会负责人）和其他积极份子联系，取得了姚校长的赞许和支持，在一中师生中开展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全县学生联合会成立，一中学生成为全县学联重要组成部份和中坚力量。姚校长的长子姚祥礼是该校学生会的骨干，后被青抗会会员大会选为干事，负责开展一中学生工作。他参加抗日演剧宣传活动，有时离校参加社会上的抗日救亡宣传，均受到姚校长的爱护和支持。”

三、拒当汉奸，支持革命

危难关头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行和气节，我的父亲正是在危难时刻显示他高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

1941年3月间，日寇占领潮阳棉城。我们家住棉城，父亲一时不及退避离家。当时，日伪当局急于物色人选任县维持会长。沦陷数天之后，突有日伪人员林膺等上门找我父亲，说父亲曾留学日本，资深望高，胁迫他出任潮阳县维持会长。当时，父亲内心十分愤慨，但表面佯作应付，施行缓兵之计，以考虑对策。事后他走访有关亲友，观察情势，麻痹日伪当局，寻求脱身之计。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在女婿肖思敏的陪伴下，他化装离家前往内地。是时春雨绵绵，泥泞路滑，他们抄城郊小道，避过日伪哨站，从双树岭口尾村经和平乡往港头，赤足徒步数十里，安全抵达港头乡潮阳县政府所在地，找到县长沈梓卿，陈述脱险经过。得知父亲出走，日伪当局查封了我们棉城住宅，家人分散逃居亲友家，隐蔽起来。

父亲脱险之后，他拒绝出任县维持会长，坚持爱国民族气节的精神和行为，深得潮人的赞扬和尊敬，一时名扬潮汕。

后来，父亲与李起藩老师谈及此事时，他曾说：“我国历史上各朝代更迭都出现多少忠臣烈士，为我们树立榜样；而中国与日本乃国与国之间，是深沟壁垒，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是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我们更应树立中华民族之大节，那些屈膝服侍日寇的人，真正是汉奸、卖国贼，与历史上之改朝换代更不能混为一谈。”他又感慨地说：“可叹当日伪胁迫我出任伪职时，我处境狼狈惶惶，不可终日，而走访亲友时，却也有个别劝我接受伪职。有些人倒希望我能出任伪职后可攀附依赖于我。这些人意识卑鄙，完全丧失了民族之气节，可叹又可悲。”

李起藩老师告诉我：“你父亲说话时态度严肃，语重心长，至今令人追思不已。”

方丹同志曾同我谈及父亲时说：“当年你的父亲处境是十分复杂的，面对着三种力量斗争的深刻考验。日伪要利用他，要他当县维持会长；国民党也要用他。他的朋友很多，他与当时揭阳县长林先立也是要好的朋友，他住在揭阳榕城，是由林先立安排的。你的父亲是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显示了高尚的气质和政治素质，他选择了支持革命的道路。”

方丹同志在怀念文章《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坚贞》一文中指出：“此时，正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时刻，不顾民族危难，一次又一次制造反共磨擦。在潮汕地区，早于一九四〇年各市（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先后被迫解散；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南侨中学被着令停办；著称抗日救亡运动摇篮的普宁梅峰中学也屡遭迫害，两位校长被迫离校。……当此梅峰中学最困难的时刻，潮汕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指示，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阵地（梅峰中学）保存下来。一九四一年暑假，教务主任余永端，经请示党的领导机关的同意，邀请已经离校的郑淳、许雄定等，并由

郑淳约定在揭阳秘密召开碰头会议。共同研究继续办好这个学校,坚持梅峰这个革命阵地以及聘请新校长等有关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在新的政治逆流中,应该把梅峰办得更加灰色,能做到‘白皮红心’更好,对党的隐蔽斗争更为有利。有关新校长人选问题,郑淳提出想办法聘请姚华萼先生为校长,并说明姚是国民党中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儿子(姚祥礼)是共产党员。他原是潮汕一中校长,潮汕沦陷时,化装逃脱,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学者,潮汕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果聘他为校长,估计国民党中容易通过,也可望缓和与我们同顽固派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对我们的工作也将能得到更好的掩护。与会同志完全同意郑的意见,便分头进行工作,一方面余永端回梅峰,商得乡长李志祥和校董会同意,向姚华萼先生发出聘请书;一方面通过姚祥礼(中共党员,当时任中共揭阳第一区工委委员)做他父亲的工作,劝他接受聘请。后来,姚先生欣然接受聘书。一九四一年秋,姚华萼先生正式出任南光(梅峰改名为南光)中学校长。当他上任后,继续聘用大批进步教师,由郑有涯任教导主任,保留原有行政管理制度(即总校领导分校的体制)以及一些进步措施,课程设置按正规中学办事,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不干预。如所预料,学校变得灰色一些,学校获得县政府批准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我们一大批教师党员、学生党员隐蔽下来,继续坚持地下革命斗争。事实证明,以姚老先生的声望,使我们的斗争得到很好的掩护。姚校长在梅峰的时间仅一年,但他宽厚待人,严谨治学办校的精神,却永远得到人们的怀念。”

在危难的时刻,一是拒绝日伪当局出任县维持会长;一是接受共产党的聘请,任职梅峰中学校长,掩护支持革命。这两个行为本身充分表明他的大智大勇,高尚的民族气节。正如方丹同志怀念文章的标题所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坚贞”。

四、光辉的联中年代

潮汕棉城自从日寇入侵之后,学校停办。转移内地的潮阳县政府决定恢复潮阳县立一中和简易师范学校,合并创办联合中学,又分部办学,即分设普通中学部和师范部。潮阳县政府在潮汕有关人士极力推荐之下,聘请父亲为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校长。于是,他只好离开梅峰中学,回潮汕筹办联合中学。在父亲主持下,仅用了二个多月时间,在1942年的暑假就基本完成联中的筹办工作,并于1942年秋季开学。

父亲任职联中校长,时约6年多,历经抗日战争后3年和人民解放战争3年。这个时期既是政治斗争最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父亲最光辉的、才智发挥最充分的年代。

6年的经历是十分艰难的。他依靠他潮汕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他的社会地位,依靠一批进步的同事和社会人士,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复杂的斗争,坚持办学,保护学校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掩护和保护革命力量,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

父亲在梅峰中学任职期间,与中共党员合作共事,教育思想有所改变,对共产党的认识加深了,更重视任用中共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父亲的表现深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称赞,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方明生、郑流阳于上练公学一次会晤谈叙间曾谈到,虽然潮普惠党组织还处于停止组织活动期间,但我们对姚华萼校长筹办联中应予支持,尽可能通过郑有涯等为姚校长所信任的关系,介绍一批能够担当中学教师的地下党员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到联中工作,帮助姚校长办好学校,以便通过该校培养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分头参加乡村地下革命工作,为地下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条件。

严格治校,培养人才是先父一贯办学的宗旨。他在校门的两侧写上“师道如山”、“校纪如铁”八个大字的校训,并身体力行,倾力培育一个良好的校风。父亲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严格课堂秩序,经常亲自巡视课堂。当发现有教而不严,或学而不勤、听讲不专等现象,即找教师或学生个别谈话,晓以大义,以提高教学质量。

要严格治校,一定要有一支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思想水平的教师队伍,要支持、信任、关怀、爱护他们。回忆我在联中就读时的老师,尤其是一批进步的革命的教师,他们既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又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者气质,既是知识传播者,又是革命的启蒙者和组织者。卢维华老师是我们十分尊敬的老师之一。他是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学识渊博,教学上讲课概念简明,释义明白,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他还借教发挥,传播为人之道,宣扬正义,抨击时政,启发革命意识;他严格要求,又平易近人,深得学生的敬仰。还有张观澜、李少熙老师的生物理化教学,刘斌、郑有涯、李鸿基、林安达等老师的语文教学、郭茂垂老师等的数学教学,谢晋吟、刘朝瀚老师的动植物教学,姚一新老师的物理、英文教学,蔡非、姚祥礼老师的音乐、美术教学都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最令人难忘的是,当时的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良师,又是同学的益友,师生之间十分融洽。这样的环境,既有利于老师的启蒙、引导,特别是老师身教的无形影响就更深刻;也令老师更能得到学生的信仰和尊敬。学校的严格管理,老师认真的传授知识,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中进步力量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形成了一个勤奋读书、好学向上、追求进步、艰苦俭朴、遵守纪律、朝气蓬勃的良好校风。

正是有了好的校长、好的教师和好的校风,学校自然有了好的成绩。1943年初夏,举行全县初中生校艺会。全县参加的学校有

五都、联中、砺青、震南和汕头迁来的大中共五所中学。此时联中才创办一年,仅有初中一年级。校艺会考试的结果,联中初一上、初一下班级均获第一名,初一下前八名除第二名外,均为联中生获得。此次校艺之后,联中声誉大振,威信更高。此后,全县又举办中学生国语演讲比赛,获榜首者也是联中学生。

我的父亲在治校的同时,还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应付国民党顽固势力对学校的干扰和破坏,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联中迁校棉城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反动政策和恐怖手段,学校遭受了更大的政治压力。

1944年间,联中在壬屿时,就曾发生县政府派军警来校逮捕老师林西园、李鸿基(均为中共党员)的事件,是父亲机智周旋,告知郑有涯老师通知林、李两老师,他们才得以脱险,安全转移。

但是,自从迁校潮阳棉城之后,斗争更是频繁、尖锐、复杂了。

1946年春,国民党派许铁魂到棉城联中分校任训育主任。他与县三青团干事长陈邦直接挂钩,并企图在联中设立三青团区分部,1946年秋,联中学校全部从壬屿迁回棉城。许铁魂再借招生机会登记三青团,并按班编队。1947年春,许自任三青团区队长,并拟举行成立典礼。他背着先父,邀请县长余建中、县党部书记刘寄超及县三青团干事长陈邦前来参加,还在会上高呼“团长万岁”。

父亲得知后,严斥许铁魂:“你来联中已有一年了,还不知学校的规矩。行政历没写的,不能妄自安排。行政历没有写成立青年团体这一条,你还请来余县长,使我失迎接,这成何体统?……你们三人还当区队长、区队副,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们三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算青年吗?!……这个青年团体,今后交学生自治会去管就是了。”自此之后,许等再也不敢以三青团名义进行活动。

是年秋,国民党为挽救其江河日下的统治,搞什么“党团合

并”，企图把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员。先父得此消息后，与郑有涯商定了联中抵制的原则。

许铁魂自从上次三青团区分部成立之事被先父斥责之后，不敢再妄自施行，对“党团合并”一事，不得不向姚校长请示。先父则严肃告诉他：“你自己思量，什么‘党团合并’，联中从来没有国民党机构，根本不存在合并。你前年登记加入青年团体的学生，多已毕业，剩下的有多少人，且都不满18岁，可以欺负他们年幼无知、并为国民党员吗？我再提醒你，学校行政历没有写明要办这件事。你何必来问我。”

许铁魂早知此事行不通，也没有作出具体部署，后来仅在朝会上作了一次布置就结束。这样，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急于补充兵源，下令强行征兵，按丁抽签。乡政府企图中饱私囊，增加兵额，不征兵者要派款，不派款者则抓丁，因而出现了半夜抓丁的恐怖现象。父亲十分不满，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时有该校童军教员，想显露威风，混水摸鱼，借官横发，经一番经营，兼上了棉城一个乡的乡长。有一天，当上司派军警来乡公所催征兵和兵款时，他亲自带军警到处抓人，勒索钱财。这次却把在校读书的联中学生赵伟剑作为征兵对象抓去了。学生家长到校向校长哭诉，全校师生得知此消息，愤然群起，掀起了营救同学的学潮，从学校至乡公所相距千米左右的大街小巷满是联中师生。

父亲也挺身而出，支持师生行动。他即着校工通知童军教师到校说明清楚。见到这个兼乡长的童军教师，他大发雷霆拍案而说：“你抓联中学生作征兵是何道理？公教人员和学生是不用当兵的。他还年不满18岁，是孩子，是学生。你即刻放人。否则，我决不罢休！学生罢课闹学潮，你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吗？你既然当乡

长，我要向你乡长交涉，要你放学生回校！”

乡长听后，连声认错，转身走出校门，却遭学生的围困，进退不得，最后还是由校工带他回乡公所，把学生带回学校，交还校长，学潮终于平静下来。

我的父亲支持进步活动、不避权贵的行为，招来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不满，某些地方势力也企图拆他的台，原曾是一中校长的某人就串通《棉报》社长郑月痕，撰文攻击联中，妄图取代先父职中校长职务。

郑月痕是《棉报》社长，惯用《棉报》的招牌，串衙门、拉绅贵，敲诈勒索，造谣欺骗。他曾间接要父亲聘他为教员，捞“外快”，遭拒绝。父亲答复郑的说客云：“郑有涯声名狼籍，不配当教师。”郑对此更是怀恨在心。

1949年春开学不久，《棉报》登载一篇文章，讽刺联中的教师是“冒牌货”，指斥训育主任是无从查考的中大毕业生……而且又说：因教员资浅才薄，招致学生学业日下，将陆续披露。

郑月痕中伤攻击联中的文章在《棉报》登出后，引起联中师生一片愤慨，群情激昂，喊出了“捣毁《棉报》社”的口号。

作为联中校长，我的父亲对此十分愤慨，经与郑有涯老师商量，指出“一定要回敬他！”

郑有涯老师说：“你不要出面，让许铁魂带学生去交涉，他自有办法。”父亲会意，即通知许说“看到《棉报》了吗？该你出头了。”许答应等中午告知学生，将《棉报》社踩掉。

在中午，学生纷纷提前到校，许铁魂来到初三年级教室，即说：“你们快去，把《棉报》臭报馆踩平去，打他臭蛋月痕！有事我负责！”初三级两个班学生即怒气冲冲地经南门大街奔向《棉报》社。许又另发动两个班同学奔赴现场声援。

因为是中午，报馆下班人员均回家，仅有值班的三几人在闲聊。大批学生气势汹汹地冲入报馆，高喊“郑月痕滚出来！”等口号，分散冲进电讯室、编辑室、校对室、印刷车间等，均予以捣毁。这一行动，仅花了一节课时的时间，干净利落。

数百名学生回到学校，郑有涯主任即叫校工马上敲钟上课，并亲自到各班清点学生人数，安定学生情绪，把点名簿全部划到，照常上课。

事后第二天，警察局长姚挥乙来校拜访姚校长。姚挥乙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当过舰长，屡遭贬谪，回乡屈居局长。与我父亲是同宗，一向尊重父亲的为人处事。他见到父亲后哈哈大笑说：“昨天月痕来局报案，我回复月痕说，还没接到南门大街岗警的报告……”他还有趣地说：“郑有痕真唔知死，他明知警察还怕学生，向警察局报案有何用？”

《棉报》被捣，满城称快，为学生的行动叫好。尤其是南门大街和东门一带，那些往日常遭《棉报》勒索的商家、摊贩，更是喝酒品茗，交口称赞“联中学生干得好，替大家出口气。”这表明当年联中在潮阳声誉之高、影响之广。

最为复杂和艰难的斗争是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寄超的斗争。

潮阳城沦陷前后的县党部书记长是国民党元老姚云帆，他在促使县长胡公木委任先父当联中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云帆逝世之后，先父以联中行政关系与县党部不相统属而不理睬在任的书记长刘寄超。

先父虽为国民党的元老之辈，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倒行逆施，常表不满、深恶痛绝。县党部书记长刘寄超在联中发展国民党员，莫奈姚校长不予合作，而许铁魂又被孤立，便指使属下人员卢

某到联中活动。

卢某原籍普宁，1944年在联中教书，后先父发现其言行不端而辞退。1946年，卢某进潮阳国民党县党部当干事，兼办《民报》（县党部办的）工作。

1947年初冬，卢进联中在教职员中串连发展国民党员，声言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公教人员都得参加国民党。”而且千方百计地造谣煽动，说什么“XX先生已经填表登记”等等。

后有林敬之老先生，见卢的活动频繁，将情况报告先父。先父与郑有涯商量后，认为应坚决抵制，联中要保持进步传统，不能让教职员被拉入国民党。但抵制宜软不宜硬。卢曾要求再进联中，只好答应他，把他争取过来。

原则商定之后，由郑有涯负责做卢的工作。郑有涯通知卢，告知姚校长答应聘他到联中任教。卢非常高兴，感谢校长恩准和主任的提携。郑主任还晓以大义，计较利害得失，指出：“姚校长对你以前的一些言行，特别是这次发展国民党员之事，你瞒过校长，拉人加入国民党，更是不满意。是我为你陈情说明，姚校长才同意你再进联中教书。校长的为人处事，你是明白的；他的声望，你也知道。”经郑有涯这么一说，卢也有所会意，说：“刘寄超要我到联中活动，想凑足人数设个支部，但他对此事全无把握。”郑老师接着说：“你是普宁人，到底是站在乡派刘寄超一边，还是要来联中当教员。”卢听郑老师之言，即说：“好，好，我马上向县党部辞职，下学期到联中教书。我一辞职，就没有入党介绍人，填表不算数，他们不能审批。实际上就没有人参加，支部也就无法成立。”于是，郑告诉他，应及早离开潮阳回家乡，以免发生枝节。

谈话之后，卢离开潮阳回普宁老家，第三天才向刘寄超寄来辞职信，着重提到“原拟介绍联中教师加入我党，事欠慎重，恐有不

纯,累得记座,故此引咎辞职。”刘早已怀疑联中有共产党,倘卢拉的果掺“不纯”,混有异党,上司觉察,食罪不起,只得作罢。刘用心良苦,要在联中建立国民党支部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

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人们随时都会被戴上红帽子而遭迫害。刘怀疑联中有共产党员,多方搜集先父和郑有涯老师的“罪证。”1948年3月,原在职中任教的中共党员刘赋回潮阳,经常出入有涯的老家,其行踪暴露后,郑有涯即掩护他转移。刘寄超闻报后,即着令教育科长赵广明向姚校长查问刘赋前在联中任教是谁介绍的?刘寄超用心险恶,认为抓不到刘赋,也要揪出郑有涯,进而搞垮姚校长。当赵广明问刘赋是谁介绍时,先父只是回答他:“记不起,待查一查。”后与郑有涯商量覆知赵广明,说是:“当年我任校长时,是姚云帆帮助,曾介绍教员到联中,刘赋是他介绍的。”云帆既死,无法对证,以逝世的书记长之名堵活书记长之嘴。

联中是潮阳的最高学府,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国民党县党部却得不到联中的支持与合作;刘寄超虽然怀疑联中有共产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却是抓不到真凭实据;同时,参议长郑则士从南京召回其弟郑振文博士来潮阳建立青年党县委会之后,刘寄超又怀疑先父倒向地方势力,加重郑与刘分庭抗礼的筹码。于是,刘便演出一幕挟迫先父公开表态的闹剧。

1949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刘寄超窜到联中会客厅,对着姚校长高声说:“外间传说你加入他党,这对我党影响极坏,这是否事实?……你是委员,老前辈,你要登报声明。”姚校长说:“那是讹传,并无此事。”刘随即拿出一张自拟的文稿给姚校长,并警告说:“你要当心你的校长职位。”说罢即转身而去。

第二天,县党部办的《民报》刊登了《姚华尊郑重声明》,内容大意:“本人青年时代加入国民党,忠于党国,一心一德。现外谣传本

人参加他党,实无此事,特此辟谣。”下午,县党部派人拿着报纸的广告费收据向先父收款。先父非常生气,拒绝付款。对来人说:“我没有登广告,为何要向我收款。”来人低头回去。

过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学生放学后,刘寄超又到联中,面对先父吵闹道:“你登报声明,为何拒收广告费?”先父强硬驳回说:“广告稿是你写的;如果是我自己登报声明,有我的手稿吗?我没有登报声明,为何要我付广告费?”刘寄超面红耳赤地说:“你是什么意思?”先父强调:“我既没有加入他党,当然不脱党,不跨党,何必登报声明。”刘自知理亏,倒打一耙说:“你不承认登报声明,便是脱党。加入他党了。”先父勃然变色,指着刘寄超的鼻子说:“随你的便,脱党便脱党。我宣布退党。”一个多年党龄的老国民党员,就这样愤然宣布退出国民党。

先父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寄超闹翻宣布退党后,1949年下半年被免去联中校长职务。

1949年10月12日,第一支从南山赶来的解放军边纵部队进入潮阳县棉城,宣布潮城解放。12月,潮阳县军营会接受一中师生和群众的意见,任命先父重掌一中校长职务,并诚聘他为潮阳县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

建国前,先父因是资深国民党员,又是地方教育名流,因此,加在他头上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如“县参议员”、“戡乱委员”等等。本来这只是当时历史时期的产物,先父很少参加活动,挂名而已,1952年暑假参加潮安中等学校教师学习会时也把这些问题一一交代,但在建国后以“名衔”论罪的年代,这些“名誉”性的头衔却成为先父不可洗脱的罪名。于是,一个热心贡献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爱国、支持革命的知名民主人士,就变成了“旧官吏”,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撤去了一中校长职务,调潮阳二中当一名职员。

1958年6月,先父因年老体弱辞职回家。1962年4月6日病逝,享年68岁。

历史自有公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84年,潮阳县教育局对先父的问题进行复议调查。次年8月24日,中共潮阳县委组织部行文批复复议意见(潮委组落(85)93号文),为先父恢复了政治名誉。文件指出:“姚留学日本,毕业北大,从事教育工作,是潮阳教育界有声望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其解放前兼任伪党政职务,但思想倾向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有一定贡献。原免去一中校长职务和个人成份定为旧官吏不当。经部务会议讨论决定,恢复原职务,本人成份改为自由职业,享受在职干部死亡待遇,并建议棉城镇政府改变其家庭成份。”

以上论述就是先父一生经历的回忆。这也是老一辈老同志、老同事,他的学生和亲友思念的综合。所有这些思念记述着先父治业、处世、为人之道。从这些思念所展示的事实表明,先父不愧是教育界有贡献的知名教育家,不愧是一位坚持主义的,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支持进步事业的爱国民主人士。

1998年10月13日

吴颖传略

尔迟

吴颖(1924.12-1992.1),原名吴贤颖,小名吴少锋,曾用笔名东方未明、克钊、伍郢、石稜羽、石尤风、史求真等。生于揭阳县塔头乡仙宝洋村。幼聪敏、调皮、好动,喜读书,性格坚强。四周岁便入本乡小学;第三年起,就读于棉湖镇兴道学校。1936年就读于揭阳棉湖育才国文专科学校,1939年毕业。期间受到系统的国学训练,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后因他父亲壮年病逝,家道中落,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在家务农、自学。

1943年,因遇罕见大旱,饥荒,生活无着。当时是汕头沦陷时期,家乡有一些在汕头市开店的堂叔伯回家乡避难,局势稍安定后要回汕头,吴颖一家(连同母亲林御莲和大姐吴少君)随这些堂叔伯往汕头市谋生,由家乡族人堂叔担保租屋,得获在国平路福合埕摆摊零售成衣和零碎布料,后兼为顾客缝制衣服。因是沦陷时期,百业萧条,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业余爱好文艺,多阅文艺杂志及各种报纸文艺副刊。

1946年,吴颖开始用笔名向《汕报》的副刊《汕潮》投稿,发表第一篇小文章后,兴趣倍增,便继续投稿,逐渐成为当时《汕报》、《建国日报》、《光明日报》等副刊的热心投稿者。不断有各种体裁的小文章发表,短小说、散文、诗歌、杂论、寓言故事均有。因曾写

文章批评《光明日报》副刊的差错,当时该报的副总编刘玗看到批评意见,而且见这位作者平时文章也写得不错,有一定水平,刚好他在报界的熟人有人认识这位作者是吴颖,经过联系接触,刘玗便聘他为副刊编辑。这时大约是1948年春节过后,这是吴颖从事社会工作的第一个正式职业。

吴颖接编《光明日报》副刊之后,得到实际主持报社的副总编刘玗的支持,把每周副刊综合版改为《闪光》(杂文版)、《学习日》(习作园地)、《星期日》各一版,杂文版稿源较缺,便通过朋友组织稿源,自己也经常写杂文补缺,其他各版稿源,自己也多用各种笔名写文章。副刊办得颇有生气,且思想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经常刊用一些旁敲侧击讽刺国民党政治腐败、抨击时弊、宣传自由和斗争的文章。这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报社排字工人闹经济性罢工,吴颖和同事马戎因平时与排字工人常接触,了解他们的困难,就暗中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提出“以大米计薪”,这样就可以不受通货膨胀影响。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传开,便有其他报社的人传言《光明日报》内有异党活动。当时喻英奇为潮汕“剿总”,正在加紧实行白色恐怖,于是,《光明日报》副总编刘玗被喻英奇抓去了。吴颖和马戎得知消息后,不敢在编辑部编稿,也不敢回家,只好随身带着稿子,在一些朋友之间“流窜”编辑。后觉得这样不是办法,便找朋友联系“上山”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后经过朋友介绍联系,知道“山上”那边已同意入伍,便与马戎辗转到达塔头一带通过阔口园地下联络站,由联络站派人带到崩山顶找到共产党领导的北山游击队第八大队(边纵二支三团前身)入伍,任北山团第八大队三连文化教员。

在北山团,虽然是文化教员,也经常参加一些野外的军事活动,当时主要活动于崩山顶和金和石牛埔一带,有时也随部队出

击,夜间偷袭一些国民党剿共部队或地方民团部队的据点。由于经常随军活动,熟悉情况,笔头又能写。领导考虑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加强前线的宣传报道,不久被调任潮汕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外勤记者,仍常随军采访报道。

1949年7月,由于形势好转,国民党虽仍加紧组织剿共,但在各战场已不断败北,不断被歼,潮汕解放在即。吴颖被调派参加第二期潮汕干部学校文教系新闻班学习,主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新闻事业的重要性理论,同时也学习一些有关报纸新闻的业务知识。结业之后,仍回《团结报》,在资料室工作,并参加准备接管汕头市的新闻研究组。

1949年10月汕头市解放时随军进入汕头,参加军管会文教部新闻组的接管工作,被分配负责接管《光明日报》社和《建国日报》社。1950年初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吴颖本人提出要到中学教书,经当时的文教部长、《团结报》社长王亚夫同意,调汕头市聿怀中学,任政治辅导员,教政治、语文。1952年,调潮安第五中学(庵埠),任语文组长、教语文,同年下半年,调潮安第二中学(彩塘),任语文组长,教语文和历史。1953年,调潮安第一中学(金山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师。1954年由学校派往华南师范学院高中师资培训班进修。结业后回潮安一中,任文学、汉语、历史等科高中教师,直到1957年被扩大化划为右派。

吴颖一生喜爱购书藏书,50年代的中学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他省吃俭用,除约一半收入用于维持家庭生活外,其他全用来购书。在各中学教书期间,不断购进文史类书籍,并不断阅读钻研,做札记。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充实教学内容;一方面则是积极准备业余搞文学研究、文学评论。

从1953年开始,吴颖先生便开始向上海的《文艺月报》等刊物

投稿,1954年初,发表了第一篇文艺思想方面的论文《亦门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读〈诗与现实〉》(《文艺月报》1954年3月号),后被该刊吸收为特约通讯员。隔年又在该刊发表《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在北京的《文艺报》发表《关于“诗与现实”的批评》。这几篇文章,对阿垅(亦门)和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是辩证的说理的,但当时《文艺月报》等刊物以至全国的文艺思想意识形态,均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吴颖先生上述文章也免不了带有那样的味道。在当时看,当然是代表正确的革命的,现在看来却是须要有所反思。吴颖对此,在当时稍后全国性的对胡风的大批判中,便已有所认识。当1955年夏,全国性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时,他就已缄口不言,不再参与了。在后来与笔者谈起最早的这几篇文章时,他都带有点“悔其少作”之意。而且,他在此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涯中,都是自觉地批判和反对庸俗社会学的。

50年代中期,吴颖先生业余从事文学研究除上述两三篇文艺思想的论文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文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其他就是在《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刊物发表一些文艺短论。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大多数是结合语文教学的实际,在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界研究基础上,对中学教材所选的古典文学名篇进行深入的研究,发表于《语文学学习》、《旅行家》等刊物的《陶潜的〈桃花源记〉》、《〈木兰诗〉的思想性》、《马致远的〈汉宫秋〉》、《关于〈五人墓碑记〉》、《〈促织〉的思想性》等研究文章,大体都是属于这种类型。这类的研究,不仅有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还有促进中学教学,帮助教师们加深理解中学教材方面的价值。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针对当时一些著名词学评论家和古典文学史家对李煜词的思想内容评价

中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李煜词,尤其是后期的词,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的思想感情”,前后期的词都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后期的词的人民性更有着历史社会意义,应给以较高的评价,引起了全国性的一场关于李煜词讨论。北师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北大文研所、中大中文系、作协上海分会等都曾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参加者涉及全国大多数文学史家和古典文学名家。出现评价不一的多种观点。吴颖所提出的观点是北师大两次座谈会的主要“靶子”,最后与其他一些参加讨论的相近观点被出来为讨论定“调子”的毛星点名批评,指为“简单化和牵强附会”,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代表。最后以作家出版社出版《李煜词讨论集》结束这场约一年的讨论。吴颖后来仍坚持他的观点,在沉默了近30年之后,作了一篇《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长文,对毛星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评述,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该文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的《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同时,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刊物《文学遗产》也作了摘要介绍。这说明过了30年,吴颖的观点也并未过时。有关吴颖50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基本上都在80年代初收录于《韩山师专学报丛刊(1)》的《古典文学评论丛稿》中。

吴颖5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是鲁迅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专题:一是关于鲁迅论文艺的研究;一是《故事新编》研究。前项研究1956年便开始在《读书月报》、《作品》等刊物发表《略谈鲁迅文评的风格》、《略谈鲁迅对继承民族文学遗产的看法》等文,对鲁迅论文艺的某些侧面作了阐述。1957年初,已与一个省级人民出版社订好了《鲁迅论文艺问题》一书的出版合同,同年夏天已把十余万字的书稿交到出版社,并有一两家文学刊物拟先发其中如“鲁迅论杂文”等篇。结果因被错划右派而全部泡汤,书稿散佚,

底稿被毁。对此专题,吴颖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初中期,仍继续有所研究,写了《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评关于鲁迅杂文的几个流行观念》、《毛泽东论鲁迅与当代鲁学研究》等数篇有相当份量的文章。尤其是在购得1981新版的《鲁迅全集》后,系统摘了约30万字的鲁迅论文艺的精粹言论,分类编成了《鲁迅文论摘选类编》书稿,后来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因考虑要与《高尔基论文艺》等书配套,改书名为《鲁迅文论选》,于1985年出版。

另一专题《故事新编》研究,吴颖发表于1956年《文艺月报》的《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一文,针对当时冯雪峰、伊凡、李桑牧等同志认为《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寓言似的讽刺作品”等观点,提出批评,指出其庸俗社会学的实质;同时系统论证了《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它的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而不主要表现在某些直接抨击现实的“隐喻”的细节上。这实质上涉及对《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的评价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场讨论争鸣。吴颖稍后针对一些反批评的意见,又写了一篇“再论”。有关这次争鸣的主要文章,1957年都收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中。对此,袁良骏先生作于90年初的《当代鲁迅研究史》曾这样评述:“尽管伊凡、李桑牧都没有接受吴颖的这一正确批评,但是,不可否认,《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了。”1957年,吴颖已与一个省级出版社签订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出版合同,并已着手去查考作品有关的“古事”与“今事”,准备了资料,写了札记,并把八篇作品分成几个类型,准备写几篇专论,成书出版。后因被错划右派,资料也都星散了。十一届

中全会以后,《故事新编》研究中有关“油滑之处”的评论,仍有很大分歧,他又写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三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故事新编〉研究诸问题的第四次商榷》两文,从正反两方面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上述有关《故事新编》和鲁迅文艺思想的文章,基本都收入1983年韩山师专学报编辑部出版的“现代文学教学参考书”《鲁迅研究丛稿》。1987年,吴颖又与吴二持合作写了一篇《〈铸剑〉与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参加广东的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后觉得“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单与《铸剑》一篇联系,似不恰当,又合作补写了《铸剑》的复仇精神,成了《〈铸剑〉新论》单独发表;而把“历史文学的机制”抽出来合作扩写为《〈故事新编〉与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约三万字的长文,作为对《故事新编》的“五论”。后来该文分为三篇分别发表,即:《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心态及其对作品的自评》、《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和《〈故事新编〉与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80年代末,吴颖又写了《〈补天〉新论》,并把上述文章合编成《〈故事新编〉一家言》书稿。广东鲁迅学会准备作为首批“广东鲁迅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至今因缺乏经费未能实现。先生逝世后,《〈补天〉新论》一文由吴二持代为整理成《人类初始的辉煌——〈补天〉新论》和《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两文分别发表。

以上是有关吴颖50年代文学研究的概况及有关专题到80年代的延续研究的情况。

1957年吴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旋即被遣送大坑农场(后转铁铺梅州板农场)劳动教养。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非人的折磨,尤其是精神折磨,非言可表。特别是自然灾害期间,几乎终日忍受着饥饿和精神折磨的双重熬煎。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求生意志力,不仅

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而且在60年代初,他每天出工劳动之余,个人开始学起了中医中草药。在当时农场挣工分工值极低,每年大约只有200元总收入的经济状况下,省吃俭用,逐渐购买了一批医学和中草药的书籍。钻研中国医药学,在当时来说,既是他手中的笔被剥夺之后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写思想汇报外唯一可消磨时光以求精神有所寄托之所在。因为这个方面毛主席有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因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学习探索。当然,也包括准备学习一种实际的应用知识,可以作为将来乃至晚年的求生本领或手段。他一贯富有探索精神,经过三数年的学习探索,便逐渐地可以为一些朋友熟人开方治病,他专门探索的是奇难杂症等僻病怪病,或一般医院老治不好的病,特别对哮喘病有他的专门探索和拿手药物。慢慢地医好了一些亲友介绍来看病的人。后来便逐渐地自制中成药,大体是自采的草药,加上些购买的中药,从配药研制到和药锤炼等,全部一手操作。他为人看病开方几乎全是义务,倘用药,便只酌收一点工本费。那些被医好的朴素的农民,感激在心里,逢年过节便送一点好吃的东西,以表示他们的感谢。他自制的治哮喘药效验最好,所治病也以哮喘为多;而其他杂症亦多潜心探索诊治之。大约在70年代初,有一次,梅州板邻里有一农民的三岁小孩因尿毒症送公社医院,经医院诊断,已明显表示“无救”。下午背回家之后,却并未断气,只是腹部胀得圆鼓鼓的。小孩的祖父(是吴的朋友,也略懂医道)来找他商量,两个人把这小孩“死马当活马治”,共同探索,尝试了多种药物外敷穴道的刺激方法,折腾了一整夜,至次日凌晨,小孩的一泡尿竟奇迹般地尿出来,从死神的手里夺回了一条小生命。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过得还颇充实,因为找到了一点能够自我实现的安慰。直到1976年摘掉右派帽子,搬回潮州待业之

后,仍然有不少经过亲友介绍找上门来求医的人。1979年重新工作和重新拿起笔之后,就再无暇为人看病了。1980年迁往韩山师专的时候,才处理掉两大筐数百瓶已烂掉或半烂掉的中成药。

吴颖一生嗜书如命,50年代初中期蒐集购买了大量书籍,到被错划右派之时,已拥有包括线装近万种的一万多册藏书。后来这些藏书两毁于“兵”(“红卫兵”和“民兵指挥部”),已所剩无几,加上因生活、疾病等,卖掉一些(包括当废旧纸卖)作为救饥救命之资,几乎荡然无存。然而,既已摘帽并可以回潮州租屋居住,等待“照顾安排”工作,已经看到一线希望,精神状态也就不同。1978年春节,他曾作一首《念奴娇——戊午早春书怀》云:“东风万里。又江南草绿春回大地。翘首云天神正往:健隼扶摇展翅。琐琐城狐,区区社鼠,捣鬼将何计?庆父即除,乾坤一派生气。飞扬应记当年,九天抚髻,岂乏凌云意?褊狭王伦难共处,转眼剩言流水!沧海珠沉,琅嬛简散,半枰成隔世。这回不算,从零也要开始。”这首词,正写出他那重新燃起希望的精神状态。

1978年冬,吴颖被“照顾安排”回潮安一中,在图书馆工作,负责整理图书馆中被“文革”弄得乱七八糟而尘封的古籍。当时国内已在进行有关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之后又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想重新拿起业余的笔,但是原来苦心蒐集的资料已经荡然无存,正在踌躇的时候,却好接触了不少“文革”中“评红热”的资料,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阴谋红学”,使他心底涌起了憎恶之感。于是重读了《红楼梦》及有关的资料,开始研究起《红楼梦》来了。当时还写了一首《论〈红〉评绝句》:“诸家同赞‘护官符’,湍瀑喧豗掩众姝。千古典型哀宝黛:人间买椟竟还珠。”先生研究《红楼梦》,是从批判庸俗社会学入手的,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写于1979年初,发表于《学术研究》1979年第3

期,题为《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了《关于〈红楼梦〉评论中的一种理论倾向》、《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社会学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还写了一篇文章参加《文学评论》组织的对上述问题的争论。这一组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文章,见解新颖,文笔犀利,像连珠炮一样,发表于《学术研究》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刊物之后;他才静下心来研究《红楼梦》本身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陆续写出了《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论薛宝钗性格》、《论花袭人性格》一组颇有份量的《红楼梦》人物论文章。前两篇各长达四万多字,后两篇也都近三万字,对这几个主要人物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又写了《〈红楼梦〉美学风格论纲》、《当代红学史论三题》等理论文章,分别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学刊》、《汕头大学学报》等刊物。后来上述文章大多数结集为《红楼梦人物新析》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

1980年秋,吴颖调到韩山师专主持《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编辑工作,同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隔年评上编辑职称。《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在他苦心经营之下,办得颇有特色,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上述红学文章也多是这时期写成的。这一时期,吴颖还与黄志鸿、李彦山合作,撰写《〈红楼梦〉人物谈》系列文章,陆续在各刊物发表。另外,与许崇群合作研究丘逢甲在潮汕事迹作品及其《岭云海日楼诗钞》,连续在《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

1984年8月,吴颖调到新办的汕头大学,筹办《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他单枪匹马,从无到有,苦心经营。1985年出刊二

期。1986年办成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季刊,并征得领导同意,开辟《红学万家》专栏,在《编者小启》中声明意在“为思想比较解放的各种‘家数’的红学工作者提供一点篇幅,在南方开个小小的红学窗口。……完全公开,准备兼收并蓄,不但‘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也欢迎各种不同调子的‘鸣’声,尤欢迎中青年红学工作者的具有新走向、新路子、新角度、新见解的‘善鸣’的‘新声’。……内容以研究《红楼梦》本身和讨论较重要的红学问题为主……。”这一专栏坚持办了四年多,发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转载率一直很高。1987年,吴颖评为副编审,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常务副主编。《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在吴颖的实际主持之下,办得有特色,有份量。

在办好学报之余,吴颖继续从事《红楼梦》研究。陆续写了《论宏观红学》、《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兼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本篇与吴二持合作)、《批判者的悲剧——八、九十年代之交红学理论走向述论》等一批颇有份量的红学研究论文。此外,他还与王政合作撰写有关《红楼梦审美史论》系列论文。吴颖的红学研究及其主持的“红学百家”专栏,在国内尤其是红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后来吴颖还准备把上述主要文章结集为第二本红学专著《当代红学史论一家言》出版,但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出版。

1989年底,他在离休返聘期间,主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扩大《岭东人文》专栏,为配合学校的学科建设,加强潮汕地区的文化文献研究,增加《岭东人文》专栏篇幅,试图“使之成为研究岭东的文史、文献以及文化的学术窗口,使潮汕地区内外这方面的真正有水平的学术文章有一个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园地”(引自

“编者的话”)。为此,他努力组织稿件,鼓励争鸣,使这个“专栏”从过去零零落落发展到占有学报的相当份量,使潮汕地方文献文化研究从基本空白逐渐起步。尤其是在关于潮汕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他曾书面向汕头市有关领导提出建议,争取领导重视,得到市领导的支持。市领导曾就有关建立机构等问题多次召集座谈。另一方面,1990年6月,他在市党报《汕头日报》上公开撰文,呼吁“抢救潮汕文献”。指出“弘扬潮人文化,第一步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潮汕文献的整理出版”,“潮汕解放已经40年了,但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是空白”。因此,危言耸听地用上“抢救潮汕文献”的提法,似乎不算过份。呼吁有关部门迅速组织整理出版潮汕文献。文章发表后,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大力响应,报纸连续刊载了一组响应支持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抢救潮汕文献的必要性重要性,进一步予以论证,也提出了各自的认识和具体意见。汕头市出版的主要用于对外交流的刊物《潮人》杂志也积极响应,约请吴颖代为组织一组有关潮汕文献和文化研究的笔谈文章。同时,他自己也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与吴二持合作写了《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一文,参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章收入该讨论会论文集,转载于《香港潮州商会七十周年纪念特刊》;又准备整理校点潮汕历代诗选集《潮汕诗萃》等。应该说,吴颖还未来得及对潮汕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做更多的工作。他的迅速整理出版潮汕文献的愿望经于未能成为现实,任他富有历史眼光的建议和呼吁,却为潮汕文献整理乃至潮汕文化研究做了某种拓荒铺路的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尔后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与他的这一建议与呼吁是不无关系的。

吴颖在做编辑工作和搞学术研究之余,杂文创作也有相当的

成就。仅在右派改正以后,他的杂文创作就相当丰富,总共约七、八十篇。大多是应地方报纸刊物之约而写,发表于各地方报刊,有些则发于国内比较开放的刊物,如《开放时代》等,也有部分发表于国家一级刊物如《红旗》、《瞭望》等。其中有部分是结合《红楼梦》研究所写的杂谈,更多的则是联系社会现实,有感而发。所有杂文作品,差不多都是有关世态人生,针砭时弊之作,议论尖锐深刻,文笔犀利老辣,可惜未能结集出版。

1992年1月22日约10时,吴颖正在看电视,突然昏倒在座椅上,急送医院,医师诊断为脑溢血,经抢救医治无效,于同月27日晨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吴颖一生为人耿直而固执,工作认真。作为一个学术刊物编辑,他具有学识渊博,坚持质量,扶植新见,坚持公开学术争鸣的优秀学术品性;通过编辑工作,注意培养有前途有潜质的青年学人。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思维活跃,喜欢标新立异,提出新见解,而注意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进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反对人云亦云,反对打棍子、扣帽子。他逝世时,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挽以如下长联:“翰墨文章霸气灵气正气,书生报国热血热泪热肠。”黄廷杰和林宗棠两先生的悼念文章称其“不曾流血亦牺牲”和“在寂寞中追求”。这些,都是对他业绩的恰当的概括评价。

吴颖一生著述颇丰,除已出版两本专著共有近50万字外,尚有发表于各学术刊物的学术论文七、八十万字,加上杂文和短论等,约有百余万字。还有在解放前发表的已经散佚的各种体裁文章。他曾经被推选为全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广东省学报研究会理事,广东鲁迅研究会理事。关于其生平及著述简况,《红楼梦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中国艺术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广东社会科学手册》、《潮汕人物辞典·文史艺术分

册》等大型工具书都著录有专门辞条,加以介绍。

附:吴颖年表

吴颖,1924年农历11月10日生于揭阳(今揭西)县塔头乡(今东园区)仙宝洋村。原名吴贤颖,小名吴少锋。1929年入家乡小学读书,1931年就读于棉湖镇兴道学校。1936-1939年,就读于揭西县棉湖镇育才国文专科学校。1937年,因他父亲吴廷光中年病逝,1939年停学后,在家乡务农,自学。

1943年,随母亲林御莲及大姐吴少君举家移居汕头市,在国平路福合埕摆摊零售成衣、零碎布料。业余爱好文艺。

1946年起,开始用笔名向本市几家报纸的副刊投稿,陆续以东方未明、克钊等多个笔名发表过诗歌、散文、寓言故事、杂文、短篇小说等各种体裁文章。

1948年初,经朋友介绍,受聘于汕头市《光明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期间经常发表各种体裁文艺作品。

1948年10月,由于《光明日报》副刊编辑思想倾向进步,致主管的副总编被喻英奇逮捕,白色恐怖笼罩潮汕,形势紧张,随托朋友联系“上山”入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大北山游击队,任北山团第八大队(边纵二支三团前身)三连文化教员。

1949年3月,调到二支党报《团结报》,任外勤记者;同年7月至9月,参加边纵二支第二期潮汕干部学校文教系新闻班学习;结业后回《团结报》,在资料室工作,并参加准备接管汕头市的新闻研究组。

1949年10月,汕头市解放,随军进入汕头市,参加军管会文教

部新闻组的接管工作,分配负责接管光明日报社和建国日报社。1950年,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本人提出要求,经领导同意,调往中学教书,前后执教于汕头市聿怀中学、澄海上蓬中学、潮安第五中学、潮安第二中学,担任语文、政治、历史教师和教研组长、政治辅导员等。业余多购买和阅读文史书籍。

1953年,调潮安第一中学,担任初中语文、历史等科教师。同年与澄海乌汀人李静结婚。

1954年,由潮安一中派往华南师院高中教师培训班语文班进修,结业后回潮安一中,任高中文学、汉语、历史教师。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学术论文。

1955年,继续执教。并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艺月报》、《语文学习》、《美术》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

1956年,继续执教。并在《文艺月报》、《人民文学》、《语文学习》、《读书月报》、《作品》等刊物发表《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等学术论文近十篇。

1957年,继续执教。并在《旅行家》、《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等刊物上发表《〈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等论文多篇。有三篇论文被收入《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出版)、《〈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两本论文集。

1957年秋,被错划右派,先后下放到大坑农场、铁铺梅州板农场劳动,直至1976年秋。业余从事中医中草药探索。

1960年,家庭生活缺乏支撑,举家被“战疏”回原籍。

1963年,原配妻子李静提出,经法院判决离婚。

1971年,母亲在家乡病逝,草草营葬于家乡之案山。

1976年9月,右派“摘帽”后,回潮州待业。

1978年,被“照顾”安排在潮安一中图书馆,整理图书馆中“文革”时期尘封的古籍,加以分类上架编目。

1979年,右派“改正”,继续在图书馆工作,开始业余研究《红楼梦》,在《学术研究》发表《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这一年,家人被“落实”回潮州,离散二十余年的家庭至此稍为恢复。

1980年9月,调韩山师专担任《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编辑工作。这一年,参加作协广东分会。在《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关于〈红楼梦〉评论的一种理论倾向》,及在其他报刊发表论文和杂文近十篇。

1981年,评上编辑职称。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刊物发表《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等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多篇,杂文十多篇;参加在济南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红学讨论会,并参加红学会。收集5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文章十多篇,结集为《古典文学评论丛稿》,作为《韩山师专学报丛刊(1)》出版。

1982年,发表《当代红学史论三题》等论文多篇,杂文数篇。

1983年,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刊发表《论薛宝钗性格》等论文数篇。开始与黄志鸿、李彦山合作撰写《〈红楼梦〉人物谈》系列文章,此后陆续在各刊物发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红学讨论会。

1984年,与许崇群合作发表丘逢甲研究论文数篇;发表杂文多篇。同年9月,调汕头大学筹办文科学报,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负责人。

1985年,出版《鲁迅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学刊》、《汕头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林黛玉

形象的历史意义》、《论花袭人性格》、《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有份量论文多篇。参加在贵阳召开的全国第五次红学讨论会,被推选为中国红学会第二届理事。被汕头作家协会聘为顾问。

1986年,在《齐鲁学刊》、《汕头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毛泽东论鲁迅与当代鲁学研究》等论文多篇。参加广东省学报研讨会,被选为广东学报研究会第一届理事。

1987年,评上副编审职称,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常务副主编。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人物新析》一书;发表《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论文多篇。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广东鲁迅研究学术研究会,并加入广东鲁迅研究学会。

1988年,发表《当代红学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吴二持合作)等论文多篇。在《红旗》、《瞭望》、《广州研究》等刊物发表杂文与短论十多篇。这年4月,办理离休,旋被返聘,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顾问、副编审,主持学报《岭南人文》、《红学百家》专栏。

1989年1月,与徐淑龄结婚。这年,在《编辑学刊》、《汕头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在《开放时代》及地方报刊发表短论和杂文多篇。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广东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被推选为广东鲁迅学会第二届理事。

1990年,完全离休,不再担任学报工作。在《广东鲁迅研究》和地方报刊发表论文和杂文十多篇。在《汕头日报》发表《抢救潮汕文献》短论,首次公开提出系统整理出版现存潮汕文献问题,引起重视。

1991年,在《海南师院学报》等刊物发表《批判者的悲剧——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红学理论走向述论》等论文和鲁迅研究、潮汕文化研究论文多篇(部分与吴二持合作);发表杂文、短论十多篇。

1992年1月因患脑溢血,抢救医治无效而逝世。这年及以后一两年陆续发表的遗文还有《〈补天〉新论》、《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等论文多篇(其中部分与吴二持合作)。

吴颖在世时和逝世后,先后有《红楼梦大辞典》等五、六种大型工具书收录他的生平和著述的专门辞条。